

# 我们国家的道路

著者：（南朝鲜）朴正熙 译者：陈琦伟等

华夏出版社



OUR NATION'S PATH

by

*Park Chung Hee*

Hollym Corporation, Publishers, Seoul, Korea, 1970

**我们国家的道路**

——社会复兴的思想

〔南朝鲜〕朴正熙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375印张 132千字 插页2

198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ISBN 7—80053—263—1/D·037

定价：50元

(内部发行)

(1966.12)

## 序 言

深夜，倦意袭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追忆着祖国历史的艰难历程。我想，我们的历史遗产落在我们的肩膀上是过于沉重了，好象使我们无法前进。自从1945年光复以后，我们的国家遭受了特殊的苦难，17年来，两届充斥着贪污腐化的政权制造了今日危机的基础，我们正陷于贫困和痛苦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思考着，难道就没有办法使国家复兴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民族的衰败面貌，同时，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的福利国家吗？难道就没有某种办法来完成一场“人的革命”，以便使我们的人民能够不再说谎，抛弃趋炎附势、游手好闲的恶习，重新成为勤勉的劳动者，来实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没有穷人的、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吗？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踏上一条复兴之路，尽管在我们的前头还会遇到种种痛苦、艰难和挫折。“至诚则金石为开”。

我懂得，一个病人不能仅靠一次所谓革命的外科手术来治愈；他的健康也不能仅仅靠切除病灶而达到。要防止旧病复发，就需要经久不变地讲究卫生和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

但是，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出路呢？应当有路，有某条路。

我常深夜迟迟不能入睡，思考着我们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草草记下不时产生的想法，按顺序整理出来，便写成了这本书。书中的叙述是粗糙的，描写也常常过于零散，但通观全篇，它相当忠实地表述了作者的思想。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反省过去历史赋予我们的种种恶习，抛弃从李朝继承下来的宗派意识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产生的奴性思想；坚定地建立健全的民族道德观念。没有一场人的革命，社会重建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特别是，我们必须结束农民的长期贫困，学习丹麦的榜样，把国家资源投入到创造繁荣的农业社会的方面去。

今年，我们开始执行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消除长期以来一个接着一个的贫困灾祸，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打好基础。一个自由社会如果没有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利，它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在执行经济计划中，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小限度的计划”来实现“汉江的奇迹”是取得超过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唯一途径。

北韓的共产主义傀儡集团已经在“千里马”（一匹日行400公里的马）的口号下开始实施一项强迫制订的发展计划。这是一个邪恶的计划，旨在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和铲除民主和自由。我们的基本信条和信念是，没有民主自由和创造精神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和进步。我们与其象兔子一样开始时跑得很快，但却半途停步，倒不如象乌龟一样缓慢但稳步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从引进

民主制度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要使它扎根于韩国现实的土壤中。我们必须努力建立韩国式的福利民主制的基础。必须掀起全国运动，(1)自由公民必须具备的健全的道德观念来训练人民。如果想要人民能够选举他们的代表，并在这块土地上以正确的方式行使民主，就应当向人民灌输自主精神。没有自主精神，“人民作主的政府”就不可能行得通。一位外国新闻记者谈到自由党政权下的韩国时说：“期待民主在韩国成功就像期待垃圾箱里开出玫瑰花一样。”而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把充满过去失败的垃圾箱当作肥料来滋养民主这朵美丽的玫瑰花。

革命政府已允诺恢复文官政权。革命军队为了尊重人民并带着把祖国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而举起了革命的火炬，他们内心中的唯一想法就是给祖国带来繁荣。因此，一俟文官政权恢复，他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让祖国重新处于以前那沾染着腐败和不义的一小撮贪婪无厌的政客的治疗之下。我们最大的希望莫过于能够看到一批新的、年轻而真诚的政治家登上舞台，坚定而负责地承担起管理国家的任务。

一场革命马上导致一场变革和进步。我们担心原有的病菌在旧病未完全治愈以前再次侵入手术后留下的伤疤之中。我们期待从更年轻的一代人中产生一批新的有能力、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以组成一个新型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人的革命”毕竟意味着是在民族领导精英中的一种改变。

当今这10年的世界历史“是一个落后民族苏醒的时代”，是一个这些国家地区进行“经济竞争”的时代。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当今时代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一个困难的抉择在期待着我们——是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得最佳利益，还是被拖回到民族灾难的巨大动乱之中。要么是重建，要么就是毁灭。在这个关头作出正确选择是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考验。

对我们的民族来说，一定有一条路——一条宽广而又开放的道路。

朴正熙

1962年2月

# 目 录

第一章	人的改造，一项民族任务	(1)
第一节	民族觉醒的必要性	(1)
	承认民族危机	(1)
	缺乏对人民的爱	(4)
	消除特权意识	(5)
	消除派性	(7)
	灌输民族自我意识的必要性	(10)
第二节	为民族而重建社会	(12)
	实现社会公正	(12)
	社会与经济平等	(15)
	保障个人经济生活	(18)
	人权和自由	(20)
	改善自治能力	(25)
	增强服务精神	(26)
第二章	对我们民族过去的沉思	(28)
第一节	李朝国民意识形态的形成	(28)
第二节	李朝社会结构的弊病	(35)
第三节	专制的封建主义和李朝的“两班”经济	(42)
第四节	李朝派系斗争中的不民主手段	(47)

第五节	李朝的有害遗产.....(54)	(54)
	附庸的地位——缺乏独立精神.....(56)	(56)
	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57)	(57)
	附庸地位——缺乏开创精神.....(59)	(59)
	缺乏进取精神.....(61)	(61)
	可恶的自私自利.....(62)	(62)
	荣誉感的缺乏.....(63)	(63)
	缺乏良好的判断力.....(65)	(65)
第六节	有价值的传统.....(66)	(66)
	地方自治的发展——地方会议与合作	
	俱乐部.....(69)	(69)
	克服国内危机的爱国传统——李将军、	
	志愿兵和东学农民起义.....(72)	(72)
	世态文学的繁荣.....(73)	(73)
	退溪和实用主义者.....(74)	(74)
第七节	对李朝衰败的反思.....(75)	(75)
	人民起义和外国殖民主义.....(75)	(75)
第八节	从崩溃到重建.....(84)	(84)
	李朝的垮台、韩国战争、4月19日	
	革命和5月16日革命.....(84)	(84)
第九节	为了现代化的韩国——我国国民	
	革命的任务.....(91)	(91)
第三章	朝鲜人民历代苦难记事.....(95)	(95)
	民族的苦难史.....(95)	(95)
	奴仆外交和对日外交契约的民族悲剧.....(97)	(97)
	俄国的“南下”方针和美朝关系的意义.....(100)	(100)



	日本在各国的默许下侵略朝鲜 .....	(106)
	万恶的38度线和朝鲜之命运 .....	(111)
	韩国战争和16个联合国成员的加入 .....	(115)
	新日美安全条约和韩国的外交地位 .....	(120)
	韩国的统一、共产主义在远东的侵略 和北韩傀儡政权 .....	(126)
<b>第四章</b>	<b>第二共和国的混乱</b>	
	——党的分裂和“软弱内阁” .....	(131)
	“四·一九”革命的流产——张政权的浮沉 ...	(131)
	第二共和国——一个有病的胚胎 .....	(136)
	民主党的家谱和特征——韩国民主党 的孪生后代：自由党和民主党 .....	(136)
	党的分裂与职位的争夺 .....	(140)
	“虚弱内阁”与职位的分配 .....	(143)
	社会动乱达到了顶峰 .....	(145)
	领导力量的缺乏 .....	(148)
	张勉政权的垮台 .....	(150)
<b>第五章</b>	<b>被耽误了的民主和韩国革命的性质 和任务</b> .....	(153)
	一个现代民主落后国家的危机 .....	(153)
	危机的实质 .....	(155)
	革命时期的民主——行政民主 .....	(160)
	行政改革和人民的自主精神 .....	(162)
<b>第六章</b>	<b>社会(国家)重建的观念和哲学</b> .....	(167)
	和平与自由——人类的希望 .....	(167)
	我们在社会重建中的基本价值观念 .....	(168)

国家秩序 .....	(170)
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小限度的计划 .....	(173)
收入的平等化和经济的公共利益 .....	(176)
消除小农和农村的复兴 .....	(180)
福利社会的合作制度 .....	(183)
民主的理想和文化及教育的新秩序 .....	(187)
英文原本附录：作者简历 .....	(193)

# 第一章 人的改造，一项民族任务

## 第一节 民族觉醒的必要性

### 承认民族危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我们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严峻关头，一个决定人民命运的关头——生或死，崛起或沉沦。这个危机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它包括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和困难以及我们面临的灾难性的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回避迫在眉睫的危机，也不能像一个旁观者那样装作对此漠不关心。逃避主义和漠然处之，换言之即是无能和怯懦，这最终将把我们引向毁灭。只有一种选择，要么让危机把我们引向毁灭，要么迎着危机去斗争并征服它。在这个关头，我们的抉择维系着我们人民和民族的生存与灭亡。

我们的人民，今天面对的现实决不是轻松和容易对付的。我们目前的境遇更多的是灾难和困苦，而不是幸福和繁荣。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一样。从内部来看，前统治者长期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化，以及对百姓困苦的漠不关心和视而不见，使人民遭受的不幸更为加剧。从外部来看，我们正面临着共产主义侵略的不断威胁。自从1945年光复以后，16年已经过

去了。那种对民族光复的欢欣鼓舞的热情已经象晨露一样乾掉了，面对的则是共产帝国主义对北韓的强占，以及自相残杀的韩国战争留下的各种悲剧。光复成了一场虚幻的梦，一次辛酸的嘲弄。在这个时刻，谁能想象得到，那民族解放的强烈热情会像一种短促而毫无用处的激情一样消耗掉，而对国家的统一或民主制度的建立毫无作用！

无法知道在重新统一以前，目前这种领土分割和民族分裂状态还会引起多少自相残杀的流血。谁敢说不会再发生象韩国战争中那样的共产主义对南方的入侵呢？谁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共产主义者已经放弃了对南方的野心呢？只要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卫星国的最高统治者、北韓傀儡的主子坚持征服全球的计划，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设想，另一次像韩国战争那样的进攻将不会发生。恰恰相反，就在今天，共产主义者正在继续进行秘密的、间接的侵略。大批间谍向南方渗透，恶毒的，造谣中伤的煽动宣传，作为扰乱南韩计划的一部分，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以割裂我们的人民和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

共产主义者自称，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为爱国献身的烈士。而千真万确的是，一只羊圈里的狼！甚至他们那些别出心裁的口号，如“国家统一”和“中立联合”都不过是些花言巧语，目的在于通过共产主义化来实现他们罪恶的统一计划。共产主义者正在中立联合这根弦上嘈杂地乱弹琴，但他们并非真的想要一个真正的中立联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那种中立联合最终会导致共产主义化。共产主义者是有经验的骗子。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受他们甜蜜字眼的蒙蔽。共产主义者一个典型作法是，即使暗地里疯狂备战，

表面上还是大谈和平。

当前，我们的人民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煽动性挑战，以及听起来象是沿街小贩叫卖的骚扰和宣传。我们必须准备回击这种挑战、骚扰和宣传，来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使命。

然而，我们的民族危机并不限于共产主义者的挑衅。国内也有不少的煽动因素。不能掩饰这样的事实，自大韩民国建立16年来，国家的基础仍不稳固，人民的前途是暗淡和令人沮丧的。

人民对于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的那种最初的欢欣之情，如同我们以前对于民族解放的热情一样，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幻灭和失望，这是由于前统治者的政治背叛，各政党堕落成腐败的宗派集团，国民政府有名无实，只知道贪污腐化和欺人炫耀的缘故。

大量外援被滥用；失业不断增加；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欺压人民；宪法秩序被受操纵的选举搞得混乱不堪；亲共派和中立分子在四月革命后开始响应北韩共产主义傀儡的号召；遍布全国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简直难以形容。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党统治下的10年和民主党统治下的1年确实是一连串可怕的恶梦。

国内的混乱和无秩序，连同共产主义的煽动挑战已使国家临近毁灭的边缘。既然如此，任何一个还多少对民族未来有一点关心的人怎么能象一个旁观者那样无动于衷呢？5月16日军事革命确实是一次把民族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的历史性行动。

然而，我们的“民族危机”并不能仅仅依靠5月16日革命

而得到解决，这次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实际上，革命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把这次革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次国家革命，一次人民的革命。

### **缺乏对人民的爱**

现在，革命刚刚开始。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把军事革命发展成为一次国家革命，一次人民的革命，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今天必须正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确，制造这场危机的是外部的共产主义者和内部的统治者。然而，我们不应当把一切指责都归咎于他们而自己则心安理得。如果我们以为仅仅通过仇恨共产主义和把前统治者绳之以法，就能度过这场民族危机，并完成这场革命的话，那简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是，我应强调现在应当是全体人民进行一次重要的自我反省的时刻。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战胜共产主义的挑战，为了使我们的领导者不再重复过去那种管理不善和腐败的错误，时代正呼唤着一次伟大的民族觉醒。民族觉醒是革命的起点。

我们可以在“缺乏民族意识”，一种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这种民族意识的极端缺乏中找到已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民族危机的原因。由于缺乏民族意识，人民之间就没有相互的爱，就没有人关心民族利益。由于缺乏民族意识，共产主义者才能够搞民族分裂，政客们和大众才能够完全不顾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追求个人私利和好处。我们知道，任何政治冲突都是由于追逐个人私利而引发的。我们也从未听说过私人之间发生的诽谤和阴谋不是由于盲目追逐个人私利而激发的。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怎么这样热衷于个人私利，同时，

那些狭隘的宗派集团怎么能对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如此视而不见和漠不关心。

我们是同一肤色，同一个民族的人们；但我们的自私和对小宗派的忠诚却异常热烈，我们对整个民族的关心却极为淡漠。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凌驾于民族和国家的兴隆繁荣之上，投票和选举，为了个人和党派利益而轻易地廉价牺牲。对过去抗日的战士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冷漠、毫不关心，而对统治者却绝对服从并加以令人作呕的奉承。这种可耻的民族性格依然纠缠着我们，同样有些人对当代的统治者是那样地满口尊敬与赞扬，但却不知道那些为国捐躯的爱国者和独立战士的名字。于是，可以不惜巨资为活着的统治者建立铜像，却没有一个为死去的爱国者树碑立传的坟墓。这样一种扭曲的民族性格萎缩的爱国感情，怎么能有助于健康的民族性格的生长？怎么能在人民中产生相互间真正的兄弟般的爱呢？

现在是每一个人扪心反省我们耻辱的过去的时候了，是决心把自己塑造成爱戴和忠诚于祖国的国民的时候了。一切隐藏在内心的反国家、不爱国的毒素都必须根除，用我们对祖国强烈的爱的火把它们烧光。当干涸的爱国主义的清泉再次喷涌而出，当枯萎的民族意识恢复了以往的活力时，这块土地将出现光明，这就是国民革命的第一支火炬，这就是人民革命的第一支火炬。

### **消除特权意识**

“特权意识”，是阻挠我们人民共同幸福、繁荣和民族统一的最严重障碍之一。特权意识和特殊地位的意识有多种表现方式；例如，财富意识（“我比你有钱”）；地位意识（“我比你有

更高的社会地位”);学术上的势利眼(“比起你,我毕业于更好的学府”);家庭背景(“我的一位先辈是皇家大臣”或“我的兄长是某政府部长下面的某个局长”)和党派集团主义(“由于你不属于我那个党、我那个俱乐部、我那个教派,我视你为我的主要敌人”)。事实上,这些偏见和情绪占据了我們整个思想意识。要全部列出那些众多的妨碍公平选举进行的干扰移植现代民主制度的亲属关系、宗派团体和宗亲集团是不可能的;要全部列出那些煽起地区间的敌视与仇恨,鼓吹民族分裂和破坏个人之间关系的遍布于各道的无其数的组织是不可能的;要全部列出那些背离促进友谊和学术研究的正确目标,挑动宗派争斗,造成学术垄断的无数学术协会和俱乐部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兄弟会组织一旦是建立在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如学派联系,来自同一个道,家庭关系等等),它就会把自己改变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造成排他性的环境,制造朋友和敌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除非他属于我们同一个母校,来自同一个道,同一个党派。由于你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仇恨你的妻子和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这就是韩国的生活现实。毫不过分地说,这里没有真正的学生协会,没有真正的道兄弟会,没有真正的学术团体,没有真正的党派会议。相反,所有这些不同的组织都想损害我们良好的风俗习惯,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

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学院、大学和我们知识分子及学术活动中心盛行的内部争吵吧!校园几乎已不是学习和研究的场所,而成了教师之间政治斗争的舞台。校园里弥漫着宗派集团的抗争和冷酷的仇恨;在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平等基础



上，培育真正的学问的正确使命却遭到完全的忽视。在四月革命时期，那些学术机构作为“民族意识的支柱”受到全体人民绝对信任，后来却完全背叛了人民的期望。甚至在同一个学校里，教师们分成“国内派”和“国外派”，学生也根据从中学沿袭下来的派别四分五裂，损害了健康的学术精神，阻碍了学术进步。

正式说来，那些不同的教派和集团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教区的对抗，宗派之间的敌对与争吵无处不有。然而，其中最丑恶可耻的要算是我们的佛教徒中的已婚者和独身者的公开争吵。如果这种争吵仅仅产生于不同的教义，那么还算不得什么，而事实上，这种冲突在实质上主要是为了金钱。宗教界本应是大众感情的圣殿，是大众伦理与道德的源泉，现在却腐败流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干扰良好的一般的社会秩序，并为一批伪宗教的迅速漫延，为从轻信的信徒和追随者那里骗取金钱、勒索财产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承认，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迷恋那种宗派性、那种“派别归属感”的产物。如果我们都懂得，我们属于一个种族，一个民族，那就不会让这种等级意识和特权思想有存在的余地。在友谊亲近、在学术成就的水平和意识形态领域各方面，可以有程度不同的区别，但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有特权意识和等级优越感。

## 消除派性

这种特权意识是造成基本社会秩序混乱的一个原因，是自由民主制度健康发展的一个最险恶的障碍。它是使我们的国家地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在我们的头脑里存在特权

意识，我们就不能指望摆脱掉业已存在的排他主义和派性。除非我们把这种特权意识从头脑里彻底根除掉，否则，政党的创建和议会制度的恢复将难免重蹈过去那种大错的覆辙。在这种形势下，期望一个政党把坚持任何具体的理想和政治纲领作为它们行动的基本指导思想，那是白日做梦。相反，它们不久就会分裂成新派和旧派，初级集团和高级集团，湖南、岭南集团和南方、北方集团，而每一个集团都追逐自己的私利，设法实现自己的野心，却忽视了一个政党本身的正当使命。很明显，这是我们整个民族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过去，国家一切政策都被党派利益篡改和歪曲了，只有那些有利于执政党私利的政策才被强迫执行。当决定国策的标准并不符合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迎合了个别党派集团的利益时，要想让真正的民主制度生根或让真正的民主理想得到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这些政党不是以政策和纲领相互竞争，而完全可以这样说，它们沉溺于阴暗的诡计之中，相互诽谤和反控诉之中，以及玩弄不正当的幕后政治花招之中。

政党成员都是马基雅弗里的信徒，国民大会不过是玩弄政治阴谋和诡计的合法舞台。立法院与市场没什么区别，“议员”仅仅是政治商人和掮客的代名词而已。一个政客戴上羊的面具，在选举时来到这里，一旦被选中就抛弃假面具，露出狼的真面目；一只狼背叛了它的同类是无所谓的。

议员们仅仅是那些口袋里装满了就业申请的职业掮客以及为私人商业利益服务的那些人中一个特殊的、有特权的阶层。指望在这样的政治混乱中逐渐形成一种真正的政党系统和民主制度，那真是痴心妄想。

我们无须引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例子来使人懂得，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在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政党制度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只要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被迫采用议会体制，那就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党派政治，这是自由民主制度区别于封建专制和现代共产主义独裁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只要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保持一个和只有一个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的人民就能指望取得繁荣和富裕，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准备阶段来创造健康的政党——人民的政党，民族的政党，它们在进行相互批评和真诚的政策路线和纲领的竞争的同时，也能遵守他们自己说过的话。

在大韩民国建立以后，当时当选总统的李承晚立即授意其追随者和军官组织了所谓自由党。以“劳动群众”的唯一政党自称的自由党，实际不过是李承晚的御用工具，它无视民族利益，也得不到基层百姓的支持。自由党以不义和违法的手段，设法使该党党魁的个人权力维持下去，直接违反国民意愿，终于使它自己降低到了权力派系的地位。自由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政党的最突出典型，它在全世界公民选举中创下了最不名誉的记录。

民主党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作为已宣告解散的“韩国民主党”的直接分支——民主党，在学生的四月革命中取得政权。刚刚执政，民主党立即分裂成“新”和“旧”两派。民主党整个历史的表征就是最痛苦的派系倾轧。两派在对抗日子里所发生的分裂已在大选中开始显露，并逐渐变得紧张起来，终于到1960年3月15日举行的选举中在总统提名问题上爆发。裂痕已无可弥补，不久就导致了它的最后毁灭。

自由党执政时，民主党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反映

了人民对自由党独裁统治的普遍仇视与怨恨。但是，当自由党政权由于四月革命而摇摇欲倒时，民主党丑恶的内部派系争斗终于爆发了，并使其中许多情节公之于世。这种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主党与前任的自由党并无二致，两者都是私利集团，由于派系争斗而进一步分裂。一切宗派集团迟早都会与非正义结成联盟，民主党也不例外。民主党上台还不足一年，立刻发现自己受雇于营私发财者们，他们正在征敛和分配“政治资本”，进行权势买卖，帮助亲共分子和分子；由此导致无政府主义，再结合民主党政权本身的腐败和无能，终于把国家驱向崩溃和毁灭的边缘。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过去的执政党没有抛弃私利集团的属性从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国家政党的直接后果。

### **灌输民族自我意识的必要性**

错误并非总是与制度本身有关；它同那些制定和执行这种制度的个人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在每一个组织和政党内，它的构成成分都是个人。同样，每一种共同命运的基本单位也是个人。因此，不管这种制度如何被修改，它的机构是怎样构成的，只要具体执行这种制度的个人保持不变，它就会完全重复老的一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呼吁进行“人的改造”和极力主张必须有一个“民族觉醒”。

要想完全消除这些令人厌恶的品质，如“缺乏对人民的热爱”、“特权意识”、“宗派主义”以及所有那些在我们的历史遗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将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而且，这些可悲的民族性格绝非与我们历史上的奴隶主义没有联系，如两班(贵族)种姓等级制度和臭名昭著的派系

斗争“四色党争”。我们当前这些依赖他人、屈从以及盲目服从统治者的民族性格，都来源于持续5个世纪的李氏王朝。我们的宗派主义、排外主义、和煽动民族分裂的特权意识，所有这些都是从李氏王朝的封建种姓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直接派生出来的。“四色党争”并非起因于不同的政策，而是为了争夺有权势的宫廷机关而发动的一场剧烈的争斗和逐鹿。

在李氏王朝统治下的无休止的宗派争斗，招致了由丰臣秀吉策划的日本入侵的民族灾难，造成从19世纪末叶前后开始直至1910年我们的国家被日本最后吞并的一场悲剧。我们是多么愚蠢啊！我们完全了解过去民族悲剧的主要起因，而今再次陷入以往的那种宗派争斗的罗网，再投进那无休止的党派争吵的巨大动乱之中。

我们最感到担心的应当是这种潜藏于我们个人意识底层的邪恶品质。因此，人的改造是一场人的内在意识的革命，它意味着有资格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的品质的形成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建立人的自我”的问题。在没有建立自我的个人当中，在只有盲目服从和封建等级关系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将再度成为特权意识、附庸主义和卑躬屈膝主义的奴仆。哪里没有建立自我而只有父与子、主与仆以及成人和孩子的关系，哪里就不可能有平等，不可能有人权。

在这样的封建关系中，没有平等或人权的存在余地。没有自我的建立，你就不可能享受自己的人权；没有自己的人权，一个人怎么能考虑其它方面的东西呢？没有一个自我的建立，一个人就不可能有作为国家统一体的

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他享受人民的爱。一个人

将获得属于国家统一体的坚定的自我觉悟，



主义和卑躬屈膝主义是多么严重地腐蚀着他自己，是多么严重地损害着人民。

西方在已经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基础上取得了现代进步。没有建立起个性的个人，就不可能有现代化，不可能有民主。自我的建立首先是了解自己。一个人只有在了解了自己之后，才会懂得其他人，才会理解他归属的那个国家统一体。一个人只有信任自己，才会信任他人。对他人的信任根本不同于对他人的依赖。二者区别之大，有如封建时代与现代的区别。我们只有信任他人，理解他人，才可能达成妥协与合作。

自我的建立，意味着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建立。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一个人就无法避免屈从和受制于他人。在这种情况下的顺从，即令表面上体面和文雅，也会阻碍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一个人在其私生活中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在作出判断，进行选举和参与不同的政治活动中也应当如此。

依赖他人和奴隶主义是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证明。出卖选票，行贿受贿和过去一切被操纵、不正常的活动，盖源于没有建立起自我。一个拥有坚定的自我和自我信任的人，不论诱饵多么吸引人，也不会被卷入非正义和违法活动中。

当今，我们的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自我。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根除任何形式的腐败和非正义。

## 第二节 为民族而重建社会

### 实现社会公正

确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还没有建立起衡量正确与

错误的标准，或衡量正当和不正当的标准。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把健全者从患病者中区别出来。在缺乏客观标准和客观尺度的情况下，一个人往往把对自己或对自己的集团有利的东西视为正确和正当，而把对自己或对自己的集体不利的东西视为错误和不正当。这种情况盛行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对社会公正麻木不仁的状态。每一件事都根据个人自己的标准，按照他的自私的观点作出判断，其必然的结果便是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阶层都产生观念与利益的冲突、宗派主义和分裂。因此，个人之间相互敌对，组织和集团之间相互对抗，阴谋和诽谤猖獗，最终诉诸残暴和武力。

我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别人干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自己的事业是完全正当的，是符合民族利益和兴趣的；他人的每一个企业都是非法的和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最高的学术和科学价值，而所有其他人的学术工作都是毫无价值的——这样一种片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方法正是社会混乱和动荡的心理原因。

一个政党有这种思想方法就会导致如下信念，即它自己的政治信条和纲领是特别符合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而其它一切政党的信条和纲领都是彻头彻尾反对国家和反对人民的。这种思想方法还可以导致这样的极端意识，即同样的事情，我做可以，你干就不行，或者说自由只能归于他，而不属于其他所有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危险的观念盛行起来，不管他人死活，不管民族命运的盛衰，只要他自己富有，他的家庭生活奢侈之中，他的那个集团优于其它集团，那么就一切都好。

逃避服兵役的被认为是“精明的小伙子”，而履行义务的人却被视为傻瓜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那些不受贿的诚实的高级官员遭受冷遇并被官僚们视为异教徒。丑闻和牟取暴利的行为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那些没有干过或犯过这类罪恶的人反倒受到蔑视和嘲笑。

这是一个拳头比法律更强有力的世界，是一个只有出身和金钱才有意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权力、没有政治联系的穷人被无情地排除的社会，是把谬误当作理性，只有违法和非正义才能行得通的社会。一切都被颠倒了；这是一个价值颠倒的社会。

显然，这种颠倒不能无限期地留在这个国家里。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必须推翻，被颠倒的应再颠倒过来。社会正义必须恢复，社会必须重建，使私人的和公众的正确与谬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今天，我们必须施行一次重要的外科手术，以清除一切仍充斥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余毒。社会公正必须恢复，必须重新建立客观的价值标准。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非正义和非法的余毒，重新建立客观的价值标准。必须建立共同的思想、判断和行为准则，使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在相互信任和爱之中。政府官员必须重新遵守为公民服务的道德准则，企业家和工业家必须全力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在一切交易和交往中必须重新奉行诚实的品德。

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生存的权利。但是，维护个人权利而损害他人的权利，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是不能得到宽恕的，至少在一个人权和自由受到保障的社会里是不能得到宽恕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符合这一准则，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只有当个人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协调一致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的社会正义。

然而，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往往是不一致大于一致。调整这种不一致的是“公平原则”，即社会正义。当整体利益与某个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通过个人的自我牺牲和自我抑制来努力寻求一致。这种为了整体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和自我抑制不过是一种普通的道理，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它构成了“民族良心”。只有恢复了这种普通道理，让这种民族良心复苏，我们才能够实现社会公正，让全体人民享受繁荣的生活。

### **社会与经济平等**

“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尽管有这样的格言表达了人们善良的意愿，但是，在我们近乎前现代和封建主义的等级社会里，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平等。现代民主如果没有人与人的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就无异于一个毫无用处的抽象概念，像一个被戳破了的橡皮气球。

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一种鄙视和蔑视他人的倾向。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源于特权意识，这在我们的道德关系上是特别明显的。民间有一种说法，“俯视斜坡，但不要看不起人。”人蔑视人，兄弟之间也互相看不起，这种现象在一个民主的平等社会里是不能容许的。人们在与熟人和亲属交往时必须遵守规矩和礼貌，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或富有程度就看不起或歧视他人，是一种既失规矩又不讲礼貌的行为。那不过是人的特权意识和在人与人之间缺乏平等原则的一种反映。出于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富有程度就瞧不

起或歧视他人，这是民族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在道德、精神或其他任何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清楚地证明，一个人必须经受现代民主精神净化之火的洗礼。

精神和道德平等是人际关系中一切平等的基础，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关切的和我们努力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实际可行的平等。

我们的宪法保证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平等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就职于政府部门的权利。然而，完全的平等仅仅体现在我们的选举权上，即每一个成年公民，不管其在财富、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有何差别，都有投一张选票的权利。在自由党统治时期，甚至这个基本的权利也常常受到压制或被暴力或利诱抢走。不过，如果每一个有关的个人都受到充分的教育，那么平等的选举权就能得到保证。

然而，被选举权和就职于政府部门的权利都并非顺理成章地容易得到解决的。当然，这种权利受到法律保障，但实际履行这些权利，例如竞选，却更多地依赖于财力，而不是一个人的意愿。过去有一些例子表明，政府当局公开干扰、阻挠候选人的登记，因而在实际上剥夺了人们成为候选人的权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有钱人能够实现他们被选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权利，而穷人都不能；对于得到政府支持的人来说，很容易竞选政府公职，而反对派的候选人甚至常常不能在不招致个人危险的情况下提出登记申请。于是，实现我们基本的政治权利受到阻碍，或者被制止，甚至只是根据一个人富有还是贫穷，就决定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今后，我们必须消除一切侵犯我们基本平等权利的因素，并要在名义

上和实际上坚定地建立政治平等。

对实现平等权利的经济方面的限制并不局限于参与政府，法律诉讼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地位的制约。履行法律权利一方面受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的技术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法律诉讼费用的严重限制。法学上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变得毫无用处。一个更为现实的说法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也可能根据一个人的收入而不平等。”

在我们探讨平等的基本概念以前，应当首先解决经济平等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平等，并非意味着财产的公有制，或财产的平等分配，而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换言之，它意味着，平等提供就业机会，个人最低收入应当统一增加到最低需要的水平，人民的最低生活标准应当得到保障。除非实现这些目标，除非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真正的福利社会，否则，自由民主在我们的国家将再次处于严重的危难之中。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当保证就业机会和医疗卫生的平等。在我们的国家里，贫困、饥饿和低收入是建立现代自由民主的最严重的障碍。共产主义者的攻击正是指向自由社会中的这种缺陷。为此，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都被迫从放任主义转向计划，从个人主义的社会转向福利国家。今天，自由民主制度必须同自己内部的敌人作斗争，否则就会面临被共产主义征服的危险。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天的革命政府才特别强调它的经济政策，才把主要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中。正是为了从这块土地上消除贫困与饥饿，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实现经济平等，革命政府才以巨大的代价积极地推行国民建设服务计划。

在国民经济现有结构中完成众多大规模的发展项目如同一场政治革命或一场人的革命一样，对我们基本的社会改革来说是最根本的。只有当我们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平等，其他一切平等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实现。我们必须勇敢地打破前现代社会的那种歧视和不平等的锁链，重新建设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取得国家的繁荣与幸福。

### 保障个人经济生活

由于经济问题是我們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由于它们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专题讨论。

我们国家今天面临的最紧迫的危机之一是，必须从贫困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许多爱国者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栖身之地，没有足够的食物，徘徊在那种动物生存的最低水平上。我们人民中的一部分尚未从贫困和不安全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们民族面临的最大的不幸之一。

“满足于个人独享舒适”，或“满足于特权阶级独享奢华”——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里，这类思想不能够，也绝不允许存在。只有当其他的人也生活在舒适之中，只有当其他人也富有时，一个人的生活和财产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当其他的人饥寒交迫，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财产也就处于危难之中。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事实，即我们今天个人的经济生活，在严格的意义上并非是个人的，而必然是社会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

因此，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即个人过着温暖舒适的生

活就足够了，不管他人是否忍饥挨饿或衣不蔽体，是一种反人民的态度，必须受到谴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合法成员；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一个人在收入和花费方面可以自由地舒舒服服生活，这是一种愚蠢的幻想和危险的态度。即使在经济活动上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也必须时时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共同命运，不断提高和履行经济爱国主义。

一个人对民族共同命运的意识和他的经济爱国主义应当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现出来。让我们从统计数字上回顾一下我们经济贫乏的深度和广度，这种贫乏使政府把精力集中在当前的经济重建上。

据1960年提交美国政府的韩国经济改革计划备忘录估计，韩国全部劳动力为9004000人，失业总数为1300000人。后来的另一项由革命政府为制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而准备的调查报告，估计在1960年底，即五年计划的基期年的失业总数为2500000人。似乎可以肯定，按最乐观的估计，韩国的失业总数也在一百万人以上。（5月16日军事革命以后，由于实行国家重建服务计划和有效的就业政策，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

很明显，由于有这样大量的失业，我们的人均收入是极其低的。根据所谓“南山报告”的统计，从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韩国人均收入仅70美元，其中67美元是人民自己的生产性收入，剩下的3元来自外援。这种远低于100美元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肯定是居于最低水平的。占全部人口70%的农民的贫困是特别明显的，根据1961年的农业年鉴，农民的平均家庭收入为418700韩国圆，而每年的平均开支约为453500圆，

——一年净负34800圆。

这种收支上的不平衡是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高利贷债务节节上升的根本原因。这样低的国民收入水平、农民的家庭收支赤字以及如此之高的失业率，把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贫穷与匮乏的程度生动地描绘出来了。这也是过去的自由党和民主党政权遗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

这种极端的贫困是偷窃、抢劫、谋杀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犯罪的直接原因；它为共产主义的渗透开辟了途径和渠道，它构成了对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最大威胁。

由于这些原因，现代民主制度强调经济政策，尽力给个人的经济生活以安定，并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一段时间，不干涉政策曾经是保障人们经济活动最大限度自由的唯一途径；但后来人们认识到，这种政策容易扩大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制造大量失业。因此，人们感到有必要把自由主义与计划结合起来，国家要直接地、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以保障个人的经济福利。

由于实现国家繁荣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个人的经济福利，因而要求政府有力地加强它的管理特权。国家建设服务计划和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都是革命政府努力完成经济重建和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向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增加国民收入和保证个人的最低经济生活。我们在今后必须尽最大努力完成工业重建，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失业津贴、失业保险、就业机构和加以控制的劳动市场。

## 人权和自由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须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

会中，每一个人在生存、思想、言论以及参加政治活动方面都享有充分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在这个社会中，国家有责任通过建立各种公共机构和社会设施来为民众提供——人民有权要求——生存和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本保证。这个社会必须能让每一个人维护其生存的权利和同其他人平等的权利，而且这种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应该得到全完的保证，以使每一个人获得其所关心的真实的物质利益。除非物质利益能获得满足，否则对权利的保证只能是一句空话。

然而，个人的生存权利并非无限制的和无条件的，当某人游手好闲，不愿工作而又要求得到政府和其同胞们的保护和帮助时，这种要求是对他生存权利的滥用。游手好闲，向别人乞求援助，这种无耻的行为，是对天赋生存权利和追求幸福权利的严重亵渎。

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努力去建立一些福利慈善机构，以使人民的生存权利——基本人权之一——得到保证。

我们还必须保证每个人和任何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想和说话。既然个人享有按自己的意愿去思想，去发表言论的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应取得这一权利。我们有权利，有自由去思考并发表各种观点和言论，而且同时，有权自由地批评和讨论别人的观点和意见。但是，我们也应当记住，别人也同样有权批评和讨论我们的观点和意见。

社会环境和法律应当充分保障人类的这项基本权利——思想和言论自由。既然这项权利必须由法律加以保障，因此对政府各类措施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的权利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公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是现代自由民主的核心。这样的权利必须由法律加以保证，而

且这种法律的保证必须是真正有效的。

然而，思想和言论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从道德和法制观点来看，不道德的、放纵的思想和言论，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和言论，是不应宽恕和容忍的，因为这些有害的思想言论只能给社会带来不幸，而不是进步，并将最终危及民族的存在和生存。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危险性，譬如说，伪装拥护民主的共产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他们的宣传和煽动。在正常情况下，思想和言论自由充分得到保证和尊重，但是，当这种自由威胁到全民族的利益，并将破坏这项自由赖以存在的法律秩序和社会事业机构时，就不能容忍这种对自由的滥用了。

无论如何，将来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须加以切实而积极的保障。这种保障对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同等的和完整的，决不应考虑不同的阶层、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多寡。农夫和学者、政治家和商人，以及任何人，在享有这种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样，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领域中各种观点的相互交流，最终将合成为公众舆论。

当这样的舆论形成并成为政府各种措施的依据，它便保证能顺畅和有效地被贯彻。新的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进行变化和发展，将会产生新的习惯和传统。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也有一部可同世上任何国家媲美的宪法。这部宪法给我们提供的基本权利也不亚于世上任何国家的宪法。只要宪法明确地记载了我们的基本权利，而且政府为这些权利的行使提供了保障，那么政治家们、法律工作者们以及全体人民最大限度地享有他们的基本权利，便不容置疑了。因为人们确信这些权利是他



们自己的。如果全体人民都对此深信不疑，那么，这种信念将成为人权在我国得到尊重的最好保证。

另外，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去发现和认清我们的权利。沉睡的权利总究不是权利。就一定程度说，发现和认清我们的权利与良知并无冲突，也无害于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致力于去发掘我们自己的权利。当这样的努力作出了成效，被发现的新的权利就将会逐渐扩展到全民族，而最终将给整个国家带来繁荣和幸福。

我们维护自由的权利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之一。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希望并试图按他本人的愿望去做任何事情。自由是人的本性，人是自由的主人。当你独处时，不存在自由与否的问题。而只有当你同他人或社会团体组织发生关系时，才会产生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自由的重要意义只能表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中。

我们民族也属于那类在历史上未曾享受过真正自由的民族。在李氏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统治中，我们的社会被严格地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由于统治者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没有自由这个概念；而被统治者则不可能享受自由，因为只允许他们凄苦地服役和服从。统治者迷恋于权力，而被统治者所关心的只是活下去。在以往任何时代或社会中都不存在这种自由的人与人的关系。虽然当时偶尔也发生反政府的民众起义，但是这些起义不是以现代民主观念作为指导的，而是由朦朦胧胧的自由意识所激起的。

在我国，自由的建立开始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1919年3月1日的独立运动是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独立的斗争，这场运动是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阐述

的民主自决原则所激起的。3月1日独立运动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民族自由，而非个人自由。正常的次序应当是，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发展民族和种族的自由，但也许由于我们民族现代史的特点，这个次序被颠倒了。无论历史环境如何，真正的自由应源于个人自由，源于个人的自我觉醒。

由于1945年的光复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被给予的，因此，它的直接产物是一种过份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自由的实现并非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如同一股汹涌的巨浪从外部涌向我们，这股自由浪潮冲昏并吞噬了我们。

如今大韩民国早已建立，我们的宪法也已颁布，但是它的条款都是些不能实现的空话。政府不是致力于使这些条文得以具体实现，而是在许多场合试图搁置不闻不问，甚至压制它。在自由党人的政权下，人民生活的最一致的愿望是想从政府的压制下拯救自由。

其间，在国内，贫困、饥饿和失业这类经济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而外部，共产帝国主义的入侵也使民族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使民主党人获得政权的四月革命又使无节制的自由重新泛滥。更确切地说，它使整个社会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暴乱和群众示威比比皆是，践踏着基本人权和自由，迎合了北韩共党宣传的那些亲共和中立派的意见，形成了一股浪潮，一下子把整个社会抛入了混乱无序的漩涡中。

曾经被政府所践踏的这个自由，现在为人民自己所蹂躏。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自由为个人所践踏，社团的自由也为社团本身所糟蹋，甚至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也受到了威胁。如果说4月革命意味着从政府的滥用权力中拯救出了

人民的自由，那么5月16日的革命则从社会混乱无秩序状态中救出了自由。

人类的生活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实现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个人的欢乐和繁荣。但个人的自由依赖于民族的自由，个人的繁荣和富裕有赖于民族的繁荣和富裕。正是在自由这个概念和使其实现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发现个人和人民。也正是在自由中，我们实现自我，表达出我们对人们的爱。

### **改善自治能力**

但是自由并非无限制的，也非某种被特许的东西。这些都是自由的大敌。自由有其自己特定的界限，并且同责任共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自由超越了界限，它就不再是自由，而只是幻想和一种特许的东西，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秩序的动乱。自由一旦逾越界限，就否定了它自己。

自由有了界限才能保护它自己。对自由真正的发现和认识是对其界限的发现和认识，只有尊重这个界限，我们才能有希望实现自由。自由管理自由本身，这是自治观念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作为个人来说，我们必定不希望受到政府或其他外部机构的统治与管束，但我们必须能自己管束自己，自己统治自己。如果我们只是被驱策而行动，只是被命令才有所作为，那就是无自治和自由可言，而只是奴才行为和驯服。这两者同幻想和被特许的自由一样，都是自由的大敌。

自治是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限制，甚至是自我牺牲。从根本上说，自治是在尊重自由的界限情况下实现自由。从而，自由或许只能在自治中获得实现。没有自治，也就没有个

人或社团的真正自由。全民族的自由无非是个人自由的总和。

这种自治精神表现在政治形式中，就是地方自治。但如果没有每一个个人自治的实践，地方自治是不可能的。因为地方自治的起点必须是个人自治。地方自治是一种民主政治体制，它使中央集权导向非中央集权。地方自治制度的产生，是试图为了地方繁荣的利益而从中央集权的标准化行政体制中分离出来。然而其关键不在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而在于使这种制度得以运转的能力。在提高地方自治能力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提高我们作为个人来说调节和管理自己的能力。没有正常而健全的地方自治的发展，要实现自由民主是不可能的。

### **增强服务精神**

自由要求具有服务精神。一个人越是懂得自由的界限，就越是能够遵守这个界限，自由对具备服务精神的要求也就越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来源于具有服务精神。自由越多，对具有服务精神的要求也就越多。

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会象我们民族这样缺乏服务精神。如果一个人能够充分考虑人民和民族的共同目标，他就不会对公众利益视而不见，而只考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他生活的美满是同全民族的繁荣昌盛连在一起的，他才会去追求那些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个人利益，他才可能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个人利益。我们知道，有许多爱国主义先辈们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利益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虽然死了，但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然而，一般来说，如果要唤醒我们人民的服务精神，还需要大大地自我觉醒。过去，我们的人民一直非常而且特别缺乏这种精神。他们一心一意地追逐私利和个人的名誉、地位，服务精神从无立足之地。迷恋于个人私利导致了阴谋和诽谤的产生，而这些东西则为小集团纷争播下了种子。

怀着对人民和同胞们的爱，人们将愿意在为为人民服务中牺牲自己的利益。作为一名社会公仆，他应当尽力实现其服务精神。警察应当根据他的职责为人民和国家服务。农民和工人都应当在其职业范围内为人民服务。尤其是一名公仆应当成为人民的真正的公仆，而当每一位公仆都能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时，公民服务的高尚道德标准将会在我国牢固地建立起来。

服务需要自我牺牲。服务精神愈强烈，要求自我牺牲愈大。当人们只致力于其个人私利时，服务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扬。个人的名利地位固然重要，但全体人民的利益更重要。正是由于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我们的人民养成了欺骗、目无法纪和不讲道义的习惯。缺乏服务精神，也是导致冒牌商标和冒牌机器如洪水一般泛滥成灾的原因。

没有对人民的热情，服务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民主、自由的热爱，服务精神是无法实现的。只有服务精神才能拯救我们的人民，为全体人民赢得自由和民主，并给我们带来繁荣和幸福。

## 第二章 对我们民族过去的沉思

### 第一节 李朝国民意识形态的形成

人们通常认为李朝时代是指统治朝鲜半岛“五个世纪”、近六百年的李氏王室，它具有独特的特征。尽管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并且饱经沧桑，但这种特征性的倾向，甚至在朝鲜王国垮台以后，继续在决定民族命运的未来进程中产生有力的影响。尤其是“两班”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不断的派别斗争，宗派性的“四色党争”成为一种长期的似乎不可医治的疾病。其产生的有害副作用，对韩国近代，甚至现代历史进程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回顾李朝 5 百年的历史，追溯它的历史潜流，不会是完全无益的，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决定自己未来的历史提供可靠和宝贵的指导方针。

为方便起见，可以将李朝的历史分成二个时代。前一个时代，李成桂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以后，国家制度得到了巩固。李将军在率领其军队离开威化岛边境要塞驻地后向首都进军。后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日本和西方势力对李太王统治下的隐遁王国(Hermit Kingdom)的大肆侵略。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看，李朝的前半期代表着继承祖宗之法，它

对高丽王朝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只作了细微的修改，没有作出对社会制度进行基本改革的任何尝试。

1392年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的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朝鲜王朝。李将军不仅是位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他曾成功地制止北方满洲人的入侵，并将日本侵略者从朝鲜半岛的南岸赶了出去，而且他还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他对公众的情感和高丽王朝末期国际政治的转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李成桂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官员们实行了一项土地改革，以满足普通农民的要求。他们收集并焚毁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土地契约、文件，并承诺对政府官员和农民的土地同样进行重新分配。在太祖统治期间，新建了都评议司，在首都开办了救济协会和殡葬事务所，并且自各道派遣公共救济员为贫困的大众提供医疗服务，为死者提供殡葬服务。在采取这些公共救济措施的同时，一项广泛的土地改革在李朝的早期得到了贯彻，其目的在于剥夺高丽王朝那些媚上者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土地。

在朝鲜王国早期所实行的内部与外部政策的显著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土地改革。
2. 对中国明朝皇帝采取事大主义政策。
3. 接受儒家哲学，将其作为统治的基本准则并放弃佛教教义。
4. 改革政府体制以加强官僚统治。
5. 建立封建等级制度。

这五项政策成为建立李朝社会——经济基石。

为了土地改革的问题，在威化岛政变4年以后，在保守派与赵浚领导的改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390年改革派获得了优势，在第二年就颁布了土地分配法。这一措施主要是用作政治的权宜之计以恢复社会秩序，而并非完全实现赵浚和其他一些改革者的理想。这些改革者只是模仿中国周朝和唐朝的制度，对土地进行平均的再分配。虽然改革没有为土地所有制带来根本的变化，但它却改变了高丽王朝的土地占有世袭制，剥夺了土地所有者的田地，使土地所有者阶层完全发生了更替，并为新的领导精英的出现提供经济基础。而且，改革的结果，建立了土地国有制，代替了传统的采邑制，从而巩固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

与高丽时代直接的征税制度相对比，税款是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收的。为了加强新的统治阶级的控制，大多数农田是在政府官员、为军事政变立功的王室家臣、王室寺院的居住者和主要官员中间再分配。新的土地所有者阶层有权向农民收租和征劳役。因为土地所有权是世袭的，新的土地所有者及其后裔没有必要去耕种土地或直接参加生产活动，这非常适合新采纳的儒家统治伦理。

李朝的官员，与高丽佛教王国不同，是由儒家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首都从开城迁往汉城之后，太祖李成桂向强大的中国明朝皇帝采取事大主义政策，甘愿从那里受封“朝鲜国”的称号，同时，他赞同儒家教义，抛弃作为国教的佛教，以迎合明朝的口味。封建等级制度以及依据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新的官僚机构，是新生的朝鲜王国的主要支柱。

李成桂从威化岛调军队进驻首都开城进行政变时，没有为按照民族主义路线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梦想所激动，也没有



为对讨好中国封建君主的传统政策的不满所动。当统一的新罗自愿地向唐朝寻求附庸地位的时候，唐朝已经兴起了。尽管“曙光庙神话”根本不可信（在这个神话中，李成桂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有一天会当皇帝），但它却表明李成桂并没有为管理国家和实施仁政的新理想所激励，个人权欲才是真正的活力。事实上，他与对高丽王朝腐败统治不满的新生社会力量的合作，只不过是结成一个推倒垂死的高丽王朝的同盟。为了使新王朝得到国际保护，太祖自愿寻求与强大的中国明朝建立主仆关系，采用了明朝的年号。他曾骄傲地指出，“如果明朝皇帝令朝鲜每3年进贡一次，朝鲜将竭尽全力每年进贡3次，并且每年都这样做。”

纵观李朝的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和睦邻友好。事大主义意味着对强大的中国明朝的屈从。“睦邻政策”要求维持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在太祖举行加冕典礼之前，他已经实行了亲朋的政策，在登上王位以后，他向明朝皇帝请准他的国王称号和朝鲜国号。他非常感激地从明朝皇帝那里得到了金国玺。在李朝的整个时期，对明朝一直坚持不渝地实行事大主义，在明朝灭亡后，便对它的继承者满清帝国实行事大主义。外交关系包括每年向明朝进贡和接受明朝皇帝的礼物，每年派遣进贡的使臣和特使。这样就加速了从中国引进不同文化制度的步伐。其中最重要的是朱熹的儒家思想，朱熹革新了儒家的教育制度，他的新思想在朝鲜处于支配地位，这助长了朝鲜王朝官场中的阿谀奉承风气。

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高句丽在现在的满洲曾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广阔的疆域。高句丽人民拥有进步的文化。他们在战争中是如此地具有“侵略

性”，以致曾被中国史家称为“性情骁勇”的民族。然而，在高丽王朝时期倡导一项更军事化的民族主义政策并主张国王称帝和入侵北方的尹瓘及其同僚，却被以金富轼为首的屈从派所击败。

金富轼镇压了平壤附近的妙清叛乱后，写了著名的《三国史记》一书。奴颜卑膝的金富轼对于祖国高丽持有这样的历史观点，以至于主张（用后来的历史家丹斋的话来说）：（1）高丽的领土沿着大同江或汉江为界进行划分，（2）废除高丽的所有风俗、习惯、传统和制度，以儒家相应的一套取而代之，（3）限制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鼓励奴颜卑膝的外交特使向外国朝廷磕头朝拜，并且要保持那个“具有规矩、谨慎精神的王国”名誉，金富轼对毁灭我国古代史负有责任，特别是毁灭高句丽的勇士精神和新罗的“花郎”精神（编者注：新罗时期，国王从贵族中选拔美貌少年，平时修身养道，锻炼身体，接受忠君报国的思想教育。战时，则要求勇于牺牲，为国王献身），从而损害了他被称为最古老的人民历史记述者的荣誉。历史学家申采浩（笔名丹斋）为此感到痛惜，认为这是“朝鲜5百年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

于是在高丽王朝统治时期，屈从、讨好的姿态牢固地确立起来了。“皇帝”、“皇宫”之类的词语从我们的词汇里删掉了。祈祷时唱的歌曲和圣歌中的“皇帝”和“唯一的君主”等这样的字眼被禁止使用，怕引起遥远的中国君主的不悦。当时除了象《三国史记》这样伪造的历史以外，其他所有历史文献必须抛弃或隐藏起来。

李成桂是通过政变获得政权的，但那时要采用皇帝的称号或寻求一种过于独立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危险的。古代

编年史保留下来的部分必须保持秘密。郑道传在编撰《高丽史》的时候，忠实地沿用了《三国史记》的模式。

于是所有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永远地丧失了，这些文献对于国家新的领导准则的形成是必需的。我国历代王朝对当时各自的中国宗主所扮演的附庸角色，极大地破坏了下一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独立精神的培养。这一伪造的历史最后被日本历史学者用来为日本对我国实行的殖民统治辩护。

在回顾李朝的历史时，我们的目的不是侧重于辱骂那些没有胆量，不敢采用皇帝称号。而只是满足于地位低下的国王称号的历代君主，而是要确定李朝的自我贬低在何种程度上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在引入儒家学说这一敬畏“天朝”的根据的过程中，国家主权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损害。

太祖是通过被培养而信奉佛教的，但他看到了高丽王朝末叶的“佛祸”，国家财政空虚，大多数人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因为大多数农田和财富属佛教的寺庙和神殿所有。他在急于根除“前王朝的罪恶”时，除了接受儒家制度和思想以外，没有任何可依赖的东西。在缔造李朝的过程中，对太祖帮助最大的是赵浚、郑道传和其他一些儒家学者，他们全都坚决主张采取反佛教的政策，并主张根据儒家思想重建文化制度，没收佛教寺庙所属土地，归国家所有。

有许多迹象表明，李朝毫不怀疑、不加任何批评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尤其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诸如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各种繁文缛节，尽管这些人为的形式在稍后的年代里才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朝鲜的文化之中。很明显，排他的、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鼓励盲目地照抄儒家学

说，而排斥其他学派的思想。“夫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认为是绝对真理，不容怀疑和批评，在家庭中，绝对的君主主义，封建主义和家长观念都以“夫子的教导”为其辩护。

封建当局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未经王室许可的各种私人活动，甚至在文化与经济领域内也是这样。语言学的研究就是根据王室的提议开始进行的。这导致了谚文，即朝鲜字母表的发明。建立在儒家君主独裁思想基础上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无疑将使经济陷入困境，使大众的思想愚昧落后。他们事实上被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没有树立起所有权概念或权利意识。他们只是被要求盲目地服从。在“国家超越社会”的奇特的东方条件下，不可能发展象西方的民主之类的“异端”思想。这就是典型的亚洲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并且甚至在无法形容的穷贫和极端受压迫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自我满足”的奴性。

除了首次为地方乡绅社会地位的上升打开了道路之外，李朝与旧王朝在中央集权和独裁这些基本性质上并无多大差别，这一社会是由世袭的王室亲属组成的统治阶级和宫廷学者们支撑着。统治者的精华包括学者和精通繁杂的儒家学说的朝廷官员。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仅仅被作为在朝廷中骗取晋升的手段，而对真理的追求却是次要的。在李朝社会中，所有的年轻人主要热衷于政府的官职，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和社会名望。对他们来说，对儒家学说的研究除了作为帮助他们通过文职人员考试的手段之外，几乎没有意义。“强权即公理”的思想最终助长了官场上普遍的腐败风气。向农民的勒索是如此地过分与残忍，以致“他们可以毫无限制地从人民那里索取东西”。在停滞不前的李朝社会中，在统治阶层的官员与学

者中间不断地发生宗派斗争。现在回顾一下，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李朝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潜在能量有外部出路的话，如海外远征或对满洲部落的镇压，他们也许就能克服内部的惰性和封闭社会的停滞不前。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与长期的争斗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李朝的缔造者及其追随者缺乏一种新的哲学，并且缺乏对高丽腐败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勇气。由于存在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即从强大的明朝皇帝那里获得承认，所以他们被迫接受附庸的地位，采纳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准则。而传统的等级制度和高丽王朝时的官僚主义则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下来，仅在表面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李朝国家基础的基本政策并不比前一朝代更进步或更富有民族性。正是在这种进步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在当代的黎明时分（它自身垮台和崩溃的前夕），李朝由于发生以东学农民革命为高潮的一系列的民众叛乱而摇摇欲坠。

实质上，李成桂的政变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只是以李氏家族取代王氏家族的统治而已，并没有使高丽王朝的中世纪社会结构发生基本的改变。相反，李朝对朱熹的因袭和刻板的崇拜，对于讲究排场的儒家繁文缛节的重视，阻碍了它给其子孙留下任何完好的精神遗产或民族文化。于是，后来当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以后，便完全缺乏为迷惘和无助的人民指明方向的精神领袖，人民对民族解放的到来不知所措。

## 第二节 李朝社会结构的弊病

由于李朝是在没有任何指导性哲学和改革愿望的情况下

建立起来的，所以除了采取适应性的措施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以外，没有做别的事情。前政权的官僚等级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威化岛政变决不意味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权的激烈更替而已。以后几代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基本的变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接受儒家思想以取代佛教作为国教，并没有为统治阶级的构成带来任何实际的变化，只是高丽王朝的统治精英大部分由佛教学者所组成，而李朝的统治精英则从儒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吸收。

由于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崇尚的学说，太祖在郑道还传这样著名的儒家学者的帮助下，在首都着手建立了成均馆（按：李朝时期的最高教育机关），在地方建立了各级乡校。儒家教义被指定为国家教育和文职人员考核的基本课程。不久，这些学习儒家思想的学院得到了大片的农田，逐渐成为私人庄园。太祖进行的土地改革与高丽的佛教神殿成为封建庄园如出一辙。

李朝的儒家学者和官吏是个世代能够得到朝廷职位的特权阶层，他们剥削农民的劳动，过着安逸奢侈的生活。李朝社会大致由二个主要阶级构成：一是务农的平民和农奴、手工业者、商人和奴婢；另一个是所谓的两班阶级。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上一辈是否在政府内获得过一官半职，而他的社会地位又作为世袭的特权传给子孙。这一社会等级制度也许可以用孟子的信条来辩护，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儒家思想在付诸实践时，是政府用来为根据世袭的社会等级和地位而实行差别待遇进行辩护的手段，也是延续亚洲

独特的独裁和阶级划分制度的最有力的手段。在以前的亚洲社会里，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学者被作为王室意志的工具，在君主统治与广大群众之间起中介作用。垂直的或主仆的关系可以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儒家的箴言来清楚地说明，这完全否定了人际关系中横向的和民主的观念。

儒家伦理由三个主要的支柱支撑着，即血缘关系，包括家庭和氏族的集合（后者是为了敬慕祖先，友爱和自卫）；地区性的兄弟会；以及统治阶层（包括王族、宫廷学者、庄园主和官员）。统治结构是由封建的家庭制度支撑着的君主专制制度。

李朝的君主制度是一个独裁的制度。它把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作为其最高的道德标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家长制的君主制度。其社会结构犹如一个金字塔，国王居于高处，王室亲属、贵族和朝廷官员，一系列依次构成统治阶层。在他们下面是更为广大的阶级——平民和农奴。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称为“中间等级”的中介阶层。它主要是为中央政府提供技术方面工作的人员。如译员、星占家、书籍管理员、抄写员、会计、警官。也存在一个同样是世袭的地方官员的特殊阶层，他们戴着形状奇特的马鬃帽子，与地方乡绅、地主相勾结，剥削当地的农民。最后，还有“军事”阶层，它和现代军队中的低级军官和军士起同样的作用。从广义上讲，这些地方官员、中介阶层和军士阶层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尽管其社会地位比两班贵族阶层要低。

所有的官员，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受赐土地，他们是作为世袭地主享有这些土地的，并被授与向佃户和农民征税的特权。从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等级是有些同样的特权享有物的异构群体，它根据血缘关系、职业、住所或土

地所有权来区分,并且世世代代保持一个特殊的社会地位,每个朝代都有其不同的一伙统治阶层。

因此,新罗王朝有开国功勋体系。以后的高丽王朝,除了地方封建贵族之外,统治阶层还来源于新罗王朝的旧贵族。然而新建的李朝在吸收新的统治阶层方面,并无前一个王朝那样的优势,因为高丽王朝的社会统治集团几乎完全被摧毁了。于是太祖被迫在地方小官吏的后代中选拔新的统治精英,为新出现的两班阶层创造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与此相联系,太祖进行了一些人口普查,以确定应缴纳各种税收和服兵役的平民人数以及服劳役的农奴人数。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服劳役而未在封建地主的登记册上登记的农奴就这样被提高到平民的地位,以此作为扩大可缴纳税款和服兵役的人口资源范围的办法。但是最终,李朝未能对建立在新罗王朝世袭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基本的改革。

一旦李朝新的等级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那些享有特权的阶级发现有必要用“血缘障碍”来保护自己以防止同血缘卑微的人通婚。尽管两班阶层被允许娶农奴出身的女子为妾,但其子女不能进入两班阶层,而只是被归入中间阶层从事技术工作。同样,任何人只要其父母当中有一个人为农奴,那他就自然地降低到农奴的地位。

因而李朝永久地细分为4个不同的等级:两班、中间阶层、平民和农奴。等级之间的界限是很严格的,一个等级较低的人想在一个等级较高的人面前维护自身的利益是不可想象的。对他来说只有盲目地、毫不犹豫地服从。这助长了“官为贵、民为贱”的恶劣社会风气,并且猎取官位成了每一个想往



上爬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

中间阶层的技术人员和地方官吏，利用两班阶层所给予的一点小小的权力，对人民为非作歹。这一可恶的习俗阻碍了地方自治权这一现代民主基础的发展。职业阶层以下是卑贱的手工业者和艺人，他们的名字通常带着成伊这个词尾（按：这个词尾表示这个人是从事奴仆交易的），以表明其职业的卑下。这种对职员和技术熟练工匠的蔑视态度，成了以后年代里朝鲜技术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流浪的皮中（Pak—chongs，意为碰不得的特殊阶层的人）或屠夫。他们被强制戴上一种特殊的表明其职业的帽子。同样，黄铜器、革席，皮革制品的制作者不允许同一般的平民相混杂。

但是，等级歧视最重要的后果是排斥一般平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事宜，助长了典型东方式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这阻碍了大众的爱国主义或民族感情的发展。由于完全被剥夺了自由和社会平等，广大平民只好听天由命，缺乏通过其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摆脱悲惨和贫困境地的强烈愿望和能力。

李朝社会完全不存在形成社会团结意识或民族共同命运意识的因素。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是官职或是权力。少了它，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从而大众极端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

在李朝的大众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

一位渔夫、面对愈来愈强的暴风雨惊恐万状，  
于是便卖掉小船，购进小马，  
这讨厌的东西，比海浪更麻烦，

哎呀，我既不要船也不要马，  
还是回去耕地吧，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这首打油诗告诉我们一个农夫的悲哀故事。他试着打鱼，尔后又试着贩盐，但都轻易地失去了勇气，两件事都放弃不干，顺从地重操旧业。这流传很广的词句，生动地表明了那时的人民是多么胆怯，意志是多么薄弱，主动性和开拓精神是多么的缺乏。

《春香传》这一当时最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品描绘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尽管是名妓的女儿，但到死一直遵从封建的贞操观。她的情人李梦龙却是“两班”的后代，他为了地位和官职而牺牲了他的情人，表现了他那个阶层的懦弱，但最终他凭借自己的暗行御使权威，在巡察途中，将他的情人从监狱中救了出来。这个故事表明了李朝社会的病态，公众根本没有反抗独裁主义的精神。从较为健康的方面来看，春香用这句话拒绝了逼她为妾的恶棍卞学道：“难道只有两班家庭才坚守贞节和美德，因为它太神圣了，卑贱的名妓家庭就不能坚守？”这证词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她已意识到人们在根本上是平等的，尽管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存在着差异。

李朝的大众文学繁荣了近250年。从肃宗的统治开始，中间阶层和地方官员由于壬辰年(日本人)入侵，已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到在这一朝代行将结束时出现的作品，具有想入非非、色情和其他一些明显的享乐主义和颓废的倾向。

强加于平民的严格的等级歧视和敲榨勒索趋向于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和苟安偷生的意识，这种意识在享乐主义的诗歌中得到了表现：

花儿在她死去的十天前凋谢，  
趁红颜未老及时行乐。

“两手干净”的两班以及他们的专业人员和地位较低的地方官吏的道德败坏，已经预示着领导精英的最终腐败和整个王朝结构的最终崩溃。

在18世纪上半叶，土地所有制已极为混乱，并且由于朝廷官吏与儒家学者人数的剧增，简直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分配。正是在这段时期，为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激烈争吵，开始在两班贵族阶层成员中蔓延开来。日益增多的无地贵族被迫在乡间流浪，乞求食物和施舍。同时大部份肥沃的土地被少数有权势的宫廷贵族和富裕地主所占有，从而李朝的主要支柱——等级制度开始逐渐走向瓦解。

甚至两班阶层的经济基础也开始日益动摇，西方列强开始向我国伸出了魔爪。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在百姓中宣传博爱和人类平等的思想。工匠、商人和布商与一些朝廷官吏一起，开始形成一种民族资本。

但是，即使在情况大为好转的情形之下，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商人阶层想要取得更大进展的努力也受到了阻碍，这是因为：(1)传统的等级意识或自身的自卑感；(2)官僚政治限制的严重存在；(3)缺乏发展民族工业的基础条件，而民族工业的发展将有助于现代中产阶级的壮大；(4)在外国殖民和经济扩张的高潮到来之前，既有的民族资本来源不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甚至在1945年光复后，李朝可恶的余毒依然存在着，并在丑恶和血腥的权力斗争中再次爆发出来，有许多紧急的问

题，诸如工业发展和民权的扩大，却没有得到解决和注意。最为可恶的余毒也许是阻碍群众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发展壮大。

### 第三节 专制的封建主义和李朝的“两班”经济

主要从事农业的平民与农奴，被迫忍受着无法形容的低贱和苦难，根本享受不到自身的任何权利。作为李成桂建国首要任务的土地改革未能使大多数农民摆脱可追溯到新罗时期的地主——官僚阶层的专制暴政。他们的社会或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改善。

韩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变更的特征，包括李朝，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更，每个朝代都发现迫切需要将当时土地所有者阶层提高到统治中心的地位。拿李朝来说，这一过程是以所谓的“土地改革”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应竭力以土地所有权的现代方式去理解李朝的社会——经济结构，因为大多数东方社会的特征是农业占主导地位，李朝也不例外。

著名的东方专家卡拉尔A·威特伍格尔(Karal A·Wittvogel)教授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东方社会“水力”理论。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李朝的专制社会——经济结构，尽管他的主要研究是针对中国社会分工。他说：“中国社会起源于干旱的、几乎是贫瘠的黄河盆地。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水源(用于农业灌溉和控制洪水)，谁也就控制了政治权力。需要管理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国家，能够逐年加强其集权专制。

但是没有理由相信李朝是个“水力社会”，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通过对水的控制来加强其独特的东方式专制的，而

李朝建立的专制制度是伴随着儒家学说和制度一起直接从中国移植过来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李朝是个“陆地社会”，而可以认为它是建立在“水力经济”基础上的，它被威特伍格尔教授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

在李朝，“政治经济”的控制权掌握在地主——官僚阶层手中。他们保证忠于专制君主，作为回报，他们被赐与土地，还取得向土地耕种者收租的权利，而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这种关系与西方封建制度的形式存在根本的差异。西方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而“中国周朝的统治者却要求其贵族绝对和无条件地服从，分配给贵族的土地是非封建性的土地，就象付给现代公务员的工资一样。”威特伍格尔教授描绘水力资产是“不稳定资产”，而李朝的土地资产也属于“不稳定资产”。它受王室专制者的兴致和政治力量变化而变化。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土地改革的内容。

赵浚派起先坚持仿照周朝和唐朝模式对土地进行彻底的公平的再分配，将土地分给为国家服务的每个人，不管其等级或社会地位如何，严格地根据本人的功劳和职责的大小分配。经过4年无效的争吵之后，所发生的是恢复高丽王朝的“土地分配制度”。

李朝土地改革的主要差别在于宣布全部土地为国家所有，废除前一朝代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制度。

恭让王统治的第二年(1390年)土地贵族们为丧失他世袭的财产而痛哭流涕，因为所有公共和私人的土地契约全部被销毁。

根据高丽的土地分配制度，全国的农田分为公有和私有土地二类。前者直接为政府机关所拥有，收税的权力属于国

家，私有土地是在个人(朝廷官吏和其他官吏)之间分配，并进一步细分为有功贵族的土地、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土地和军人的土地，征税的权力分别属于各个土地所有者，但后者有义务向国家纳税，只有属于有功贵族的土地是例外。与早期高丽王朝的“田柴科制度”相对比，李朝私人农田的所有权是世袭的，这一变化是李朝末期大部分农田转变为大规模的私人财产或庄园的主要原因。

在李朝的土地分配制度下，要求地主也直接向国家交税，但禁止土地所有权的自由转让，在世宗统治期间，对土地进行了丈量，整顿了土地登记制度。在那些耕种私人土地的农奴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分散的自耕农，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地主又回到了他们的庄园定居，到了一定的时候，最初建立起来的名义上的国家土地所有权逐渐被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所替代，这又使土地所有权逐渐向大规模的私人财产和庄园转变。

在中宗至明宗统治期间，这一趋势再次发生逆转，当时国家已没有土地可赐给有资格获得土地的官吏。

在世宗统治期间，取消了世袭私人庄园和赐与终生保有的土地的制度。苦于私人收入的恶剧减少，贵族和官吏终于采取了贪污和挪用钱财的办法。在放荡、专制的燕山君统治下，腐败的、长期争斗的朝廷官吏公开地将国家的土地据为己有。

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始终在加剧。除缴纳普通税外，他们还要服兵役和劳役(或以布匹或以为奴来代替交税，最残酷的税收要算征收各地生产的贡品了;这被婉转地称为对“国防的贡献”，当路途遥远，或当农民因饥荒或其他自然灾害而无

力纳税时，就由地方官们代为缴纳，以后再向农民收取税款并加上高利。因此实际上成倍地增加了对农业人口的经济剥削。就在这期间，人们开始抱怨，“对农民的征收已到了极限”。迄今为止，在这种过度剥削的压力下，繁荣的农庄逐渐被忽视和荒废了。许多农民要么饿死，要么离乡出走。在明宗统治的第17个年头，发生了著名的林巨正人民起义。

在睿宗统治的第一年(1496年，按：原文误，应为1469年)贸易与工艺大臣杨松基是这样描绘农民的绝境的：“耕种终生占用的土地的人不仅必须向政府，而且还得向地主在每年夏天提供绿干草，秋天提供稻草。干草税实际上是对稻米的征税。比例是每一捆干草为一摩尔(mol，度量单位)稻米，就象现代流行的谚语所说的那样“天上要征税，地上也要征税”。大多数农民不得不靠橡果和草根过活。

另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是高利贷。两班地主不满足于土地收入，而且通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佃农。直接向国王负责征收稻米、布匹、地方产品和农奴税的中央政府供给机关，正是用向农民征税得来的收入进行高利贷活动的贵族。封建地主以高利贷向农民贷款，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财政大臣允彼山，甚至连国家的资金也被用作高利贷的款项来为官吏攫取私人收益。

到了李朝后期，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对贫苦不堪的农民敲骨吸髓，农民只好放弃所有的财产和资产，甚至将他们所耕土地的租佃权也让出去，以满足高利贷者的要求。

李朝的土地改革最终导致了农民大众的极度贫困，在19世纪初期，三个行政机关(农部、兵部和粮食部)一片混乱。国库空虚，饱受压榨的农民日益怨声载道，终于在哲宗统治期

间“百姓造反时代”达到了顶峰。

李朝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害的经济遗产，官僚主义的经济特权得到鼓励、经济和政治不分，政客们热衷追逐政治权力的“剩余价值”，私营商人在没有得到官僚们支持的情况下，不愿开办独立的企业，这种支持只有通过贿赂才能获得。

李朝最终的必然垮台还有其他许多原因：

1. 封建的、仅仅依靠向农民大众征税征役的自足经济受不了随着新时代的降临而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甚至在国家财政恶化时，即将土崩瓦解的专制政权也不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税收。

2. 朝廷甚至在财政日益亏缺的情况下，也不敢向贵族土地所有者阶层积累起来的非法财富征税。因为正是在这批贵族土地者的支持下，朝廷才能苟延残喘维持局面的。

3. 经常发生的宗派斗争以及外国的入侵使得发展海外贸易、手工业和其他行业所需要的、民族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封闭社会”只好在窒息中坐以待毙。

4. 既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也没有一个优秀的领导阶层来打破传统封建主义的陈腐模式，以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启蒙和进步。

如今，虽然传统封建社会专制的特权意识得到了修正，并且人们的生活也已现代化了，但我们农业的生产力仍处于原始状态。并且李朝的各种可恶的痕迹，包括长期的贫困和高利贷负担直到如今还残存着，尽管这期间曾有过外国殖民主义干涉的时代。同时，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新的领导力量以改革这一陈旧的经济结构，并且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即自光复以来，外援的流入是否象预想或期望的那样有助于改革



和重建我国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社会。

#### 第四节 李朝派系斗争中的不民主手段

李朝社会最糟糕的弊病可以归结为儒家官吏的清洗和派系斗争，即官场上为争权而开展的残酷内讧。这种宗派斗争不是公开的公平竞争，而是运用阴谋诡计、恐怖手段和其他非人道的卑鄙的办法。它显得完全缺乏宽容，对反对派和政治对手十分冷酷，毫不怜悯。它倾向于促进国家分裂和排除和平移交权力的可能性。以后，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进，它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才被有所察觉。这种宗派传统不允许以讨论、多数通过或互相妥协来确定一个共同商议的基础，宗派政治的心理变得根深蒂固。

诚然，派系斗争同儒家理论，特别是朱熹所阐述的那种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也跟将儒教立为国教以及“先师学院”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卷入争论里去的是一些儒家学者，但导致这么多仇恨和派别偏见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将朱熹的理论作为一个哲学体系来研究而引起的。他们热衷于争论礼仪和形式，这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非实质性问题。他们的真实原因是双方气量狭小及派系间的敌意，实在令人悲痛。

在人们发生争执和辩论的时候，假如我们说一件事是“对或错”，“对或错”本应表示一种观念的正确或不正确，但按照朝鲜语“是非”一词所表达的现代涵义，当问题涉及派别之间互相攻讦时，这个词只不过意味找岔子和热衷于人身攻击。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争执发展为血腥和可怕的权力斗争。

世祖篡位后对儒家学者和官吏的清洗以及派系斗争，实

实际上支配了以后整个李朝的历史。而这种倾向，紧接着在所谓“李朝黄金时代”的成宗统治的结束也立即产生了。在放荡的，也许是精神错乱的燕山君的暴虐统治下，这种倾向发展到了众所周知的程度。作为朝廷内的阴谋而发端于15世纪末的这种清洗，其恶劣影响传遍了全国并成为各地儒家之间的派系斗争。到17世纪末，这种清洗一直在扩大发展而未受到削弱，并且瓦解了统治阶层。

在此之前的高丽时期，官员之间也有政治斗争，但这些斗争局限在朝廷之内，主要是围绕着王室婚姻、继承权等问题而进行的。但李朝的清洗和派系斗争的规模扩大了，它超出了统治阶层官员和在野的反对者之间的关系。

李朝统治阶层之间的斗争可以分前后两个阶段：

1. 清洗——国王、他的官吏以及他们的派别之间的斗争。
2. 派系斗争——由具有强烈派性的儒家派别所组成的集团之间的斗争。

前者保持着宫廷斗争的性质；而后者则将李朝的整个官场都牵涉进去了。它是运用告发、阴谋和恐怖手段而进行的残酷的派系斗争的典型。

我曾在本书前面谈到派系斗争同新儒家学者的涌现有密切关系。首先戊午年燕山君统治的第4年或1498年的清洗是柳子光为首的当权派处决了金宗直派新兴的儒家学者金驹孙的门徒，这意味着旧的统治阶层以某种方式保存了力量，并在新政权下作为新的社会力量而出现。

此后的50年间，接连发生了戊年、甲子、己卯和乙巳4次清洗。这几次清洗的牺牲品是为朱熹思想奋斗的儒家学者。当新的王朝建立起来的时候，服从明朝的宗主权成了固定的

对外政策。当时的儒学被视为国家制度和思想模式，它渗透到了平民阶层，形成了新的儒家学者阶层。保守力量和进步力量的分裂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让我们来分析这些清洗的原因：

1. 戊午清洗发生于燕山君统治的第4年，当时编出了成宗实录，金弼孙记录了他的老师金宗直写的一首诗，诗中谴责世祖抢班夺权。这事被发现后，燕山君进行了一次清洗。

2. 甲子清洗发生于燕山君统治的第10年。燕山君悼念他的在一次派系斗争中被贬黜并遭杀害的母亲。他为母亲平了反，并诛灭了同此案有关的大臣。

3. 中宗政变(1506)和己卯清洗——为了反对燕山君臭名昭著的淫荡生活和他的暴虐，发生了一次推翻他的政变，中宗取而代之。中宗想清除以前的腐败现象，起用象赵光祖这样的儒学者。赵光祖和他的追随者提倡革命性的变革，引起了保守派的极大反感。他们的反对者最后控告赵光祖及其追随者“叛国”的罪名，许多人因此遭到了清洗或杀害。

4. 乙巳清洗——有许多儒学者死去，他们卷入了皇亲为争夺王位而发动的权力之斗。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形成李朝统治阶层核心的儒学者和官员，为了在国王之下取得政治权力而运用策略和阴谋。追求知识对于儒家的学生来说，首先意味着在朝廷中获取官职和权力。当时的朱熹理论不能称为纯粹的哲学思想。它更接近于论述统治人民和管理国家原则的官方思想，朱熹理论的伦理学内容几乎消失殆尽。

李朝的派系斗争中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在剥夺反对者的权力时，他们运用(1)诬告、(2)阴

谋、(3)煽动性的呼吁、暴乱和暗杀。这一切一点也不象欧洲中世纪骑士公开和公平的较量。他们是消极性的、无怜悯的和不饶人的，可以用残忍一词来概括。

东方官吏之间的竞争，是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平竞争和西欧封建主义的骑士精神截然不同的。它更容易令人想起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下官员之间的竞争。“必须密切注意这一统治阶层之内的竞争，其中盛行的一些习惯，阴谋非法逮捕、严刑拷打和其他极端主义手段”，威特伍格尔这样说道。在李朝社会中，官吏之间的争斗，是相互间的秘密控告。首先在土地改革以后，国家的经济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连政府中任职的官员都拿不到俸禄。一人专擅的权力结构的力量衰落了，争夺官位的儒家学者的人数增加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政府职位。其次，专横的官僚以牺牲私人产业活动为代价膨胀起来，社会没有获得“多边发展”，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无法从事其他活动或职业。

派系斗争的传统习惯，以后在裙带关系、猎夺职位、腐化堕落和对反对派的无情镇压中表现出来。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随着它从纯粹的清洗发展到大规模的派系斗争而愈演愈烈。派系斗争的温床是“先师学院”。

李朝初期，太祖将儒学定为国家哲学。“他任命教师来为他自己上经典课，以从中吸取统治国家的经验。在第3年他按照首席顾问的请求为济州岛委任了一名教授，在第6年他为孔子建立了一所学堂和一座圣祠。同时他为普通百姓建立了一所乡校，即明云乡校和英贤书院，分别给了它们大片的土地。”结果李朝培养了著名的哲学家和儒学思想家。先师圣祠和地方乡校的发展，为汉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在教育史上

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时期。特别是建于15世纪后半叶的成均馆，它是一所国家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也是通过对文职人员的考试来挑选官员的机构。书堂（编者按：朝鲜历史上的一种私立教育机关，相当于私塾）是官方系统以外的私人教育机构和组织。许多文职候选人员被培养出来，形成了对抗统治阶层的一个阶层。这些候选人对现存秩序心怀不满。

甚至在这些清洗之前，李朝社会中已经形成了儒家知识分子庞大的阶层。它的人数增加了，社会对这些“高级无业游民”的负担也相应地增大了。他们分为以下几派：

1. 特权阶层——既定的统治阶层，包括世祖的亲信、合作者和支持者。

2. 忠臣派——他们对世祖的篡权非常气愤，决定留在官场之外，因为他们不能侍奉两个国王。

3. 士林派以金宗直为首的有进取心的改良主义者，他提高了他们反对特权阶层或所谓的官方派的水平。

4. 正直派——他们反对官方派，对政府官职不感兴趣，只喜欢诚实的对话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将自己比作中国的“竹林七贤”。

这4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主要是特权阶层同改良派（朱熹派理论家）之间的斗争。“先师学院”的发展以及新、旧派势力之间的斗争，马上导致随后的清洗。

换句话说，先师学院培养出来的儒学家，在人数和本质上变得相当强大，足以形成一个党派。后来又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学院。在明宗以前已有29个先师学院。世祖时扩展到了124个。这些学院受到财政部和有影响的地方首领的补贴，并很快就拥有土地、奴隶、图书馆和庄园。他们变成了地主。

己巳清洗以后，特别是在宣祖的统治下(1568—1608)朝廷起用了许多士林派(朱熹派理论家)的人，改良主义的新派学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然而，当他们的统治权实际上建立起来之后，改良派内部新旧势力的对立尖锐起来了，并开始了权力斗争。当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能得到数目有限的职位，同样忠诚的10个候选人中只有一个政府职位，只有那些比较更受宠爱的人得到起用，那些遭到冷落的人则无事可干。内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与1961年4月19日民主党的分为“新”、“旧”两派，先后相映成趣职位的稀缺、野心、贪婪、个人之间的对抗——这一切都扩大了冲突，个人野心是长期斗争的原因所在。人事管理跟地方观念、裙带关系和自私的打算有密切的关系。长期斗争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东、西党人的出现，是派别斗争的开始，它源于对腐败的和不公平的人事管理的不满。金孝元和沈义谦在宣祖王朝的第8个年头为争夺人事长官而开始斗争。在李朝的官场结构中，人事长官负责所有的人事安排。当金孝元被推荐到这个职位时，沈义谦反对，这导致了以这两个对手为中心的派别斗争。金派自称为“东人”，沈派自称为“西人”。东人又进而分为北人、南人。北人分为小北派和大北派。西方派也分为林西派和沈西派。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但最终分成元老派，自称“老论”和少壮派自称“少论”。所谓的四大派(“四色”)正式产生了。在整个李朝的历史中，甚至直至今日，他们相互间展开斗争。他们的水准不需要什么突出的理想或箴言，出于个人之间的对抗和自私的利益，他们分成许多亚集团，制造阴谋和混乱。

17世纪末，伟大的儒家学者宋时烈也卷入了派系斗争。他为了为国王服丧时间长短的争论而失去了权力，最终被处

决。这种愚蠢的斗争说明派系斗争是多么残忍无情。有一本叫做《派系的含义和概括》的历史书这样评论道，我们的派系斗争是“少有地激烈的、顽固到底的和令人费解的”。

宣祖统治的第24年的3月，朝廷向日本派出了一些使者，了解日本是否有侵略朝鲜的意图。他们的报告互相截然不同。黄允吉正使属于“东人”，而金诚一副使出自“西人”。黄说：“丰臣秀吉双目虎视眈眈，充满野心，他肯定要侵略朝鲜”。而金报告说：“丰臣秀吉眼睛小小的，象老鼠眼睛那样发肿，他的外表平庸，不敢侵略朝鲜”，因而金劝说人们不必准备抗击入侵。甚至在这种国家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刻，派系斗争也起了这一毁灭性的作用。

日本入侵以后，派别斗争仍在继续，在肃宗的统治下，占统治地位的“西人”分裂为“老论”和“少论”两派。当讨论立国王的弟弟（以后的英祖）为世子时，“少论”派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结果“老论”派理论家四位大臣包括金昌集在内被以谋逆罪处死。

在尝到了派系斗争的恶果之后，英祖根据其著名的“取消派系政策”，决定起用一切有才能的人，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一派，并阻止任何一派占上风。从而国王巩固了权威。英祖将国家引向一个复兴时期，一个仿照世宗统治的黄金时代。但是外国列强开始对朝鲜感兴趣，天主教被引入我国并产生了新的混乱。同样地也引进了所谓的“独裁主义”政策，这是党派斗争的自然结果。广大人民只得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

李朝的国家结构受到了危害，地方官员的强暴和贪财愈演愈烈，农业经济凋敝了。随着洪景来起义的爆发，李朝社会进入了瓦解的时期。三个主要的政府财政支柱开始动摇，

在哲宗统治时期，农民起义四起。东学党大起义标志着李朝的最终垮台。

派系斗争可归因于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普遍失业，他们的人数随着先师学院和儒家学士的增加而增加。李朝的官吏阶层不得不加入激烈的权力斗争以自保，因为经济上的机会，也就是说李朝经济的基础——农田是有限的。

19世纪末来到朝鲜的莫利斯·库林（Morris Coulin）以他的西方人的观点评论道：“孤立封闭使创造力和才华束缚在家庭的围墙之内。高明的思想和观点只是麻烦和斗争的种子，这在派系的形成和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中得到了表现”。李王朝虽得以扩张，但其经济框架是个狭窄的封建主义体系。它从未想过要放眼国外，而只是满足于闭关锁国，不流动的水腐臭并散发臭气。这种臭气就是派系斗争、阴谋和宗派纠纷。

实用主义者星湖要求在农业中任用闲散的儒家官员。朴西溪也指出，从他观察中国南方贸易及关税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打破狭隘的陋习，扩大我们的视野，雇用悠闲自在的两班（绅士）在农业和国家支持的商业部门就职。

派系斗争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有害和令人惭愧的污点，这就是内部争吵的恶习，尤其是他们还用种种残酷无情的方式来反对敌对的宗派，拒绝妥协和忍让，并在以后的数年中阻塞了建立一个成功的议会制度以及发展我国政治的可能性。韩国光复以来17年民主试验的失败充分证实了上述情况。

## 第五节 李朝的有害遗产

我们的现代社会为建立民主而徒劳无益地奋斗了17年。



我们缺乏能够担当起在现代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这一重任的可靠的政治家。我们缺乏能够履行职责的领袖。政府雇员被贿赂蒙住了双眼，只追求个人利益。大众亦缺乏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工作的愿望，因为他们自私的个人主义已经根深蒂固。

近来“本地硬币”(Local Coin)一词很流行，这就承认了我们低下的地位。民族品质一直遭到贬低，国家有意地听任相互攻击和处于一片混乱。

这些恶习阻碍了将韩国建成一个完美幸福的国家。起初我们认为，只要直接引进西欧的民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民主这棵芬芳的树木在韩国这片不好客的土地上没有开花。我们未能成功地移植这棵新的树木。我们最后看到，需要种植本地的和本民族的树木。

巴基斯坦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在长达10年的英国式民主试验失败以后，革命领袖阿尤布·汗正在强调设计一个适合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以及生活现实的政治形式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民主不应从外国引进。应该从我们自己的书本中寻找。”他断言他的国家的民主，“根本的民主可以从伊斯兰教义中找到”。埃及的纳赛尔也有同样的倾向。

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清除李朝留给我们的可恶遗产来努力清除所有反民族和反革命的因素。

在进一步考虑李朝的可恶遗产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个落后国家的条件。希腊经济学家德里瓦尼斯教授(Professor Derivanis)在1957年于罗马举行的经济学家国际会议上，对于落后国家贫困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

1. 居民想尽可能少做工作。
2. 企业的平均能力低。

### 3. 国家管理水平低。

人民的恶习和不民主因素常常来源于他们的贫困。落后的人民一般是懒惰的。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懒惰，由于：（1）原始的生产方式，（2）人口过剩的压力，（3）未开发的自然资源，（4）资本的短缺。当落后国家想使自身现代化的时候，这些障碍加速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他们不会进行资本投资，他们的实际收入低并对生产性经济活动丧失了一切兴趣。

李朝末期，外国列强来敲我们的大门（随着他们的到来引进了资本主义），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容纳不了企业精神，国家对这种发展没有进行补贴和鼓励。其他国家首先通过民族主义热情来加速他们的现代化，这种热情经常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他们加紧发展经济，扩展海外市场等等。但是韩国的现代化基础还未奠定就成了远东列强的猎物，她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

### 附庸的地位——缺乏独立精神

在探究李朝的有害遗产之前，我们也必须考虑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特征，它迫使李朝的缔造者太祖对中国采取事大主义政策作为国家的准则。

健康和独立的外交能在国内培养健康和独立的民族精神。太祖起初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采取这种外交方式，但通过引进中国的儒家哲学，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这种对中国的一切东西的盲目崇拜影响到一切社会制度的根基和日常生活，使李朝形成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他们的判断标准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文化。他们作出的决定是消极的。他们不顾民族的

传统和现实。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

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遭到破坏，每个人都想穿上“现成的服装”和采纳外国的文化与思想。这导致了韩国在光复以后象进口“救济品”那样进口“民主”。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这种对中国的奴颜卑膝的原因列为以下几条：

1. 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2. 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

3. 高丽王朝以后，在照抄中国这种普遍情绪的鼓励之下，我国倾向于以牺牲我们固有的文化为代价，引进诸如儒家学说之类的外国文化。

4. 新罗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了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将来我们必须清除奴性和依附的习惯，建立起一个独立外交的传统。

### **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

李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使得诸如农业和劳动之类的生产性活动萎缩了。如前所述，懒惰是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韩国的懒惰方式来源于两班观念（这一观念在我们的历史上始终盘踞在贵族的头脑中）、特权思想和不劳而获的欲望。地主只对收租感兴趣，对管理农庄不感兴趣。我们传统的经济思想不是节俭，而是炫耀自己和无忧无虑地生活。这就培养了挥霍浪费的叫化子，他们“花钱如流水，与妓女鬼混”。这里

包括虚荣的炫耀和繁文缛节。由于没有财产，他们容易挥金如土而最后以一贫如洗告终。在这种社会气氛下，节俭受到了阻碍，每个人都现挣现吃地过日子，天天如此。官僚专制渗透到了土地制度中，农民的财产和土地易遭敲诈和没收，土地属国家所有，私人所有权的现代观念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对“微弱财产”的依恋是不会强烈的。

这种情形在《饮酒歌》，《秋之心》，《阳山道小调》等民歌和小调中有充分的反映，它们的主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人们变得只热衷于“鞭笞穷人和敲诈勒索”。整个民族自然变得更懒了。但最懒的阶层是上流阶层，他们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有保证的。在乡村住宅的客房中举行聚会，占主导地位的清谈、两班的仪式和虚荣，这一切都是这种心理的例证。出身高贵的人围坐在火炉旁，尽情地高谈阔论和胡说八道，一边吹嘘他们出色的血统，一边捋着胡须，这就是两班的清闲生活。

于是任何健全的职业观念都没有发展起来。在德语中职业称为Beruf，意为上帝的召唤或天职。西欧近代史上的宗教改革，教导人民发现个人的天职，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以此来侍奉上帝。在今天我们韩国甚至还有人认为，真正美好的生活不会是某种世俗的生活，而应该是某种出世的生活。但是德国人相信通过忠实于个人世俗的天职Beruf，就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俗的工作、商业活动和挣钱，是上帝委派给个人的任务，这些不是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是生活的目的本身。于是他们就忠于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本分尽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莱茵河奇迹”的西德人，在这种健康的职业观念的激励下，

一直在勤奋而努力地工作着。另一个例子是，欧洲人的姓在许多情况下来自一些手艺或其他职业。“史密斯”意为铁匠，那个人的祖先是个铁匠，但他们热爱这个姓。在东方，日本也有许多姓同某些生意或职业有关。

与此相对照，我们的姓大都是金、李或朴，没有表明同“下贱的职业”有任何牵连。它生动地表明我们的天职观念是淡薄的。自李朝以来，每个人都想成为受控制的农业经济供养的官员。甚至在今天，农民希望通过辛勤劳动，将他们的孩子送进学校受教育以后求得一官半职（如法律、政治等），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干很多活，不用象他们的父母那样被泥土弄脏双手了。

### **附庸地位——缺乏开创精神**

外国人说韩国人全都喜欢悲哀、伤感和悲剧性，我们大多数民歌中的歌词对悲哀的情绪不表示任何抵制。人们变得沮丧和顺从。“顺其自然吧”，“让他们去庆贺，我愿做一个旁观者”，“对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这些就是他们的信念，一种消极的自觉的失败主义。

韩国的悲剧与西欧的悲剧是根本不同的。西欧的悲剧与命运抗争，死也死得光荣，它显示了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否定消极无为。但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伤感，却不是这种高昂的悲剧。它只是一种悲哀的失败，一种比纯粹忍耐还要糟糕的奴隶般的顺从。

我们不具备西方那种勇敢的悲剧意识。我们需要廉价的眼泪和同情。这种渴望得到同情的脆弱的愿望不可能在人民心中培养出真正的人类勇气，也不可能造就一种真正的开拓

精神。

从一首典型的韩国歌曲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顺从是多么根深蒂固。这首名为《阿里郎》的歌曲非常出名，许多外国人把它作为韩国人的标志。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抛弃我的情人，你走不了十浪(furlong，一浪等于1/8英里)就会脚痛。”而不是对情人说：“不要离开我”，而只是说：“但愿你走后会出现麻烦，然后再想起我”。这是一种悲哀的格调。西欧的女孩会搂住她的情人的脖子不让他走。她们不会软弱地希望情人脚痛。她们不是那么脆弱或顺从。另外一首歌《密阳阿里郎》唱道：“我亲爱的主人(编者按：朝鲜妇女对丈夫的惯称)过来了，但我不能公开向他致意，我咬住围裙，只是向他微笑。”这显得多么消极和呆板。

我们国家消极的顺从可以从新罗王朝一首古代歌谣中看出《处容歌》最后唱道：“她原属于吾，今如之奈何？！”处容离家出走回来时，看见另一个男人偎在他妻子身边。他唱道：“她原属于吾，妻室今已被掠，奈何奈何！”这又一次显示了我们国民的怀疑主义和宿命主义的顺从。在那种情况下一个西方男子会拿手枪把他们两人都打死。我们的祖先难道就如此软弱和温顺？

这种宿命主义的顺从没有一点斗争的精神，这是一种对命运的屈从态度，而没有摆脱自己命运的愿望。因此民间流行各种迷信活动，如算命，相面，看手相，选吉日等。他们没有勇气去改变那些似乎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去使每一件事都变得可能。贫困持续不断，重建生活的愿望从未有机会萌发。

这种顺从是对现实的消极逃避。对泥土占卜(编者按：抓

一把泥土撒在地上，根据所成形状占卜吉凶)，特别是对钟干(Chong Kam)记录(一种迷信活动)的普遍信仰，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是为了寻找“世外桃源”。而且，退溪、栗谷的作品，如《淘山十二曲》、《高山九曲歌》等都提倡一种被我们的知识分子遵奉的对现实的逃避，在深山中过与世隔绝的生活，消极地赏花观月。

我们的歌曲是悲伤的，令人落泪的，是由叹息声组成的。当任何事情出现困难时，就说“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死了”。这表明在李朝独裁统治下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困苦。或许这是逃避地方官员和小老板压迫的唯一的办法，但同时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悲观看法。使人觉得精神上对现实的逃避是一种崇高和令人愉快的事情。

### **缺乏进取精神**

进取精神的缺乏正说明没有事业心。虽然我们心中有许多想做的事情，但我们缺乏勇气去实现它们，我们倾向于只考虑会遇到什么困难。在专制统治下，一个人不能独立地工作，而必须在得到官方同意和他们的监督下做各种事情，我们不可能期望会有独立的创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得到官方的合作(或默许)，如果某人想独立作某事，“他就不会成功”。这就产生了一种企图通过与官场勾结而发一笔不义之财的心理。

同样，极度的贫困也产生了进取精神。如果一个人不得不老是担心着自己的肚子，又怎么能考虑和计划做其它任何事情？在韩国，早上打招呼的习惯用语是：“吃过早饭了吗？”这是一种因贫困如此普遍以致吃早饭成了一件大事来打招

呼。西方人都说：“早安”或“好天气”。例如，在英国，由于天气经常不太好，人们自然就时常谈到天气。我们国家的贫穷是如此严重，以致影响到我们的日常招呼用语。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全力帮助，进取精神是无法培养的。

《欠发达国家中的资本形成》一书的作者璫克赛 (Nuxey) 教授曾说，欠发达国家中资本积累的失败是由于缺少思想。这也正指出了缺乏进取精神。

此外，李朝流行的等级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蔑视手工业者和农民，过份尊敬官吏和蔑视平民百姓的情形，也使进取精神的形成受到阻碍。

### 可恶的自私自利

朝鲜人以缺乏团结和喜欢搞宗派而臭名远扬。李朝时的派系斗争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坚持封建的闭关自守政策，李朝社会的内部变得停滞和堕落。分散的土地所有制和一个大家族内个人之间的争吵，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助长了地方派别意识。

《李朝派系斗争史》把派系斗争的恶果列举如下：

1. 派系斗争使社会各阶层疏远。
2. 它破坏了判断谁聪明谁愚蠢的标准，破坏了判断谁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标准。
3. 伦理道德远远地被置诸脑后。

在引进能带来健康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现代民主之前，民族意识是原始的，国家被理解为家族首领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家族制度的恶果之一。

我国的家族制度是根据男子继承制的基本原则运行的。



这种家族利用强烈的氏族意识把氏族成员结合在一起。这种氏族的存在破坏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管理能力。

在氏族制度下，共同血缘关系的意识得到了加强。不管关系是多么远，每个人彼此把对方称为同一氏族的成员，他们想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个想法就是“九代同堂”。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能够住在一起，但是共同血缘的意识导致了氏族的形成，从而把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对立的血缘氏族。这些氏族在国家内部形成小的国家。他们彼此难以容忍，每一氏族都鼓励对其他氏族采取敌意和对抗政策。我们仍然可以在村庄之间看到由于这种原因而发生的矛盾和争吵。

氏族制度不仅使各氏族之间发生冲突，扰乱社会秩序，还毒害了每个公民的思想和行为。氏族制度是与民主进程相抵触的。这种家族结构，助长了狭隘的家族和等级意识、特权意识、阶级意识，以及对家族或氏族头目绝对服从的奴颜卑膝的习惯，从而阻碍了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根据这样一个信仰而生活，即他人的幸福能够保证自己的幸福，应该通过促进他人的幸福寻求自己的幸福。这样的社会合作，首先应该得到发展。

### **荣誉感的缺乏**

当儒家学说的形式主义传入李朝时，礼仪和规矩纠缠住人们，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有益的效果。为了使婚葬办得使人印象深刻，许多家庭弄得一贫如洗。但“荣誉”（欧洲中世纪骑士精神的标志）并未得到发展。在派系斗争中，人们喜欢谈论功与过，但缺少任何真实意义上的个人完整感。他们不是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或选择决斗的方式，而是卑劣地依靠势力

和政治诡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溜须拍马的勇气。我们缺少开诚布公、灵魂高尚、纯洁而又自尊的人。

西欧的“用我的名誉担保”。一词在朝语中翻译成“导致死亡”，“否定自己”等等。如果人死了，根据这一宿命的准则，“名誉”和“责任”便不再存在。换句话说，他们情愿轻易地去死和逃避责任，而不愿维护他们的名誉和承担责任。说谎、欺诈都与荣誉感的缺乏密切相关。

在我们的刑法中，有一种犯罪称为“诽谤罪”或称“玷污他人名誉罪”。这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产物，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不现实的。我国人民只有一种模糊的荣誉感，从而缺乏责任感。他们缺乏关于自己人格尊严的强烈意识。他们只有模糊的“氏族意识”或“家庭意识”。

例如，西方人一般通过用大写字母写出“I”或“Ich”来强调自我，但在我们国家，“I”实际上译成“这个小东西”并且总是用较低的格。也还存在着在谈话中用“我们”来代替“我”的倾向。当问到“你喜欢抽烟吗？”习惯的回答是“我们不抽烟”。而不是“我不抽烟”。这或许是我们语言的错误，在我们的语言中，复数不是一个从单数来的概念，而恰好体现了个人自我和尊严的意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谈话和写作中，“我”的省略几乎是不加思索的，例如说，“那场革命发生的时候，（我）走到外面，（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回到房间，电台说一场革命爆发了。”“我”这个主语在这里三次被省略。由于一个有责任的“我”没有得到发展，所以我们无法期望会形成有道德的人格。

当不存在强烈的个体感时，一种健康的判断力就不可能存在。

## 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判断力是从准备对付现实的积极态度中产生的。它不可能产生于象李朝那样的专制强权之下。

尤其是在东方的思维方式中 判断力从来不受赞赏，而只有传统的继承和传递才是有价值的。孔子总是对的，孔子的话总是被认为是神圣的，能够解决所有的争论。李朝文化除了朱熹的理论外，其他一切学术思想均受到排斥。从事其他研究的人被认为是异端和骗子，人民没有机会发展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他们的批判活动的唯一方式是消极的抱怨和敢怒不敢言。派系斗争并没有给学术讨论和思想交流提供机会，相反却鼓励了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的积累，而这种积累的爆发是以一种扭曲的、病态的方式出现的。

李朝的学者能够成为诗人、散文家，但却没有进行理论和科学研究的才能。他们是非常敏感的，其语言当中也充满了微妙的形容词，但是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却非常贫乏和单调，他们仅仅满足于对中国经典著作的机械抄袭。争论和表达都与贵族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总是绝对和武断的。他们不是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以理服人，而是采取教条主义和高压政策。

李朝社会的文化可以与希腊的诡辩学派相比拟。他们所关心的是获得地位，而把知识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强大的谬误压制弱小的真理就很自然了。

这种“劣币排挤良币”的奇怪现象损害了李朝社会中一批健康的领导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 第六节 有价值的传统

我们之所以认为李朝的历史是可耻的，是因为它的四派斗争、对中国奴隶般的顺从以及贵族的自鸣得意。我们把目前的贫困和困难归咎于从李朝继承下来的有害的遗产。今天的年轻一代带着愤怒和蔑视回顾历史和他们祖先的劣迹。这也许是有利于年轻一代的很重要的一点，因为韩国新的光明前途的创造有赖于对我们过去历史的批判和现实的评价。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忘了我们立足的根基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外国的文化和思想是不能过多依赖的。

我们光复后17年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就是对尼龙的迷恋，对外国舞蹈和奢侈品的追求。对于外国文化的生吞活剥，不管是否同韩国的生活有实际关系，一概认为“西方是好的”，使我们患了消化不良症。

现在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当雅典的命运处于危险关头时，苏格拉底号召雅典人“了解你自己”。这就是说，“从你们国家苦难的历史中学习和发现力量的源泉。”这正好触动了我们的心弦。

当我们读我们的历史时，我们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从而变得悲观失望。但是我们应该对克服困难和艰苦斗争的历史感到骄傲。未来劳动者的骄傲应该是使过去值得赞扬并创造新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蒙盖着“光荣的伤痕”。然而，我们也能从中找到珠宝和财富。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能够从李朝历史中发现值得赞叹的遗产。李朝的复兴时期是世宗、世祖、英祖三位国王

统治的时期。在这段复兴时期,李朝的文化得到了繁荣。这个时期不仅颁布了“大典(或称一贯法)和“平等法”,而且还发明创造了谚文字母表和统治国家的书《经国大典》。

世宗(1397—1450)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他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出于口头用语与书面用语应该一致的想法,他创造了谚文。这的确是一种真正的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并且为现代韩国带来了一场民族文化革命,在介绍谚文时,世宗说道:“国之语言,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通流……”他认识到了我们的民族特性,想灌输一种民族意识。世宗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的教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

到那时为止所使用的文字是中国的汉字,汉字学起来十分困难,并且被贵族所专用。人民大众在无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但世宗了解普通人民的生活,他想使他们受到教育。他说:百姓“有所欲言,而终不能伸其情,我很怜悯他们,因此创造了二十八个字母,称之为‘适于教给人民的字母’。”他是同情普通人的,并且也尊重他们的愿望。

世宗拒绝了一些奴性十足的学者的反对,决定与成三问、申叔舟、郑麟趾和其他学者一起发展谚文。

世宗也利用《治平要览》进行政治和文化研究。在国王的庇护下,王家学院帮助训练聪明的青年学者,他们出版各种书籍,进行科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和历史研究,并在所擅长的问题上向国王进言。

世宗本人还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李纯之和张永等人的辅助下,他发明了日晷和量水标等仪器,这给农业带来很大好处。1438年(他继位后的第20

年),世宗写了黄道地图和天文历法。1442年,他发明了测雨器,并把它安装在书云观气象中心。并且制作了许多复制品,配发各道观测雨量,1429年,世宗参照中国农业方面的代表作《齐民要术》编写了《农事直说》一书。他还制定了土地制度,实行按肥沃程度将土地划分为6级和将庄稼分为9类的制度,以保证税收的平等。他还决定每20年对土地重新进行测量。

在世宗统治时期,活字印刷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太祖时期,活字是木制的,有时也用铜或铅。太宗时期,建立了一家新的印刷所,铜活字印刷不断得到改进。世宗四次对活字进行了改进,我们国家活字印刷的发展比德国人谷登堡的发明要早许多年(1455)。(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1450年)

在世宗、世祖和成宗等王朝连续统治的时代,写出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包括《治平要览》、《龙飞御天歌》、《高丽史》、《五礼仪》、《国朝宝鉴》、《东国通鉴》、《东国宝鉴》、《东文选》、《东国輿地胜览》、《训民正音》和《经国大典》等。

世宗时代开始的复兴,一直持续到英祖和正祖时代。英祖对所有人实行了“平等对待”,目的是为了根除派别仇恨,并且起用各个地方的能人。同时,还颁布了平等税法,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向贵族拥有的渔业、盐车和船只征税,从而扩大了财政收入。在他之后的国王正祖具有强烈的改革热情,鼓励文学的发展。他建立了奎章阁,并且招请了新的学者。为了消除腐朽影响和削弱王族的权力,他鼓励进行大规模的学习,并且编辑了许多篇幅庞大的书,如《太宗汇通》、《武艺图谱通志》和《奎章全韵》。

在英祖时代,朝鲜文学得到了高度发展。金天泽写了《青

丘永言》。一个地方低级官员金寿长编撰的名著《海东歌谣》就是那时出现的。还有金弘道等，完成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绘画。自瓷器出现，手工艺品也得到高度发展。

上面我说明了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文化传统。但也有来自人民的高尚传统。

### **地方自治的发展——地方会议与合作俱乐部**

民主的基础是地方自治。如果我们忽视地方自治而只强调中央政府，那我们就还是抱住过去遗留下来的集权和专制不放。这是为什么民主没有在我国发展的另一个原因。（从这里联想到人们对地方政府选举的漠然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地方自治（地方共同体乡约）的蓓蕾虽没有开出艳丽的花朵，但还是值得研究。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复兴运动能得到成功，我们必须在这个本国古代的乡约模式中找到它的历史基础。那么这个运动才能成为人民的中心，并且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运动。

与信奉儒学的李朝的许多罪恶相比，乡约是一种有益的发展。它们是在村庄之间和各郡之内，为组成独立和自治的政府而达成的协议。乡约起源于中国宋朝的姚姓家族，有四个主要原则、鼓励行善、互相纠正错误、相互优待和互相帮助解决困难。

于是就提供了地方自治的原则。姚家族会议被朱熹采纳，因此也很自然地在朝鲜被人们所知。它们的正式实施是由于赵光祖领导的改革派的提议，但是这些外国的做法不久就失败了，而一种有民族特色的习惯形式开始出现并盛行起来，其典型的创造者是李退溪和李栗谷。

由赵光祖提议的协议也称为地方法规，它们被用来作为加强地方自治政府的工具。在世宗时代全国各地都有乡约，以此作为纠正地方官员的不义行为以及用受人尊重的地方习俗来激励人民的途径。中宗之后(1517年)，颁布了普遍适用的地方法规《吕氏乡约》，但却没有取得什么好的结果。从那以后在人民中间自发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法规，它把中国的惯例加以修改，并对制度进行修正以适应我们自己的条件。

这种朝鲜式的地方自治起源于李退溪的隐居乡约，后来相继出现了牌骨乡约、核骨乡约、书院乡约等。它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李朝结束时期。但由于受到儒家狭隘思想的限制，这些惯例被改造成为支持地方恶霸的工具，而从未成功地成为一种健康的受欢迎的民主的社会力量。由于依附于受到儒家支配的地方书院，各地方法规只不过是在保护美好的民间风俗的名义下受到鼓励的一种排场和仪式。再者，他们热衷于压制女性，因此普遍实行女性离家外出时戴上面纱的做法。因此这种制度不能摆脱儒家思想对它的限制。贵族和统治阶级的自治并没有发展成为人民自觉的独立性。因此，在接近19世纪末期，这些地方组织同政府雇佣军联合起来与东学起义的造反者交战，特别是在忠清道交战。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合作俱乐部的发展。

起初，合作俱乐部或“契”(按：“契”是一种私人间相互提供资金的组织，其成员每月轮流收集捐助物品。这种作法在妇女中广为流行。)是一个促进双方友好和善意的合作组织。“契”在高丽时代就已存在，到了李朝“契”扩展到各地，并且发展成经济互助的组织。但这些组织不是公开的。它们大都是秘密的，只限于封建或血缘关系。我们下面把“契”组织的



结构分成以下几种：

1. 一些专门从事秘密集会和策划的“契”。

一个例子是宣祖手下的郑汝立所组织的大同契。郑在东、西人两派斗争开始以后离开了朝廷，回到他的家乡，组织了一个协会，并招募了儒家学者、士兵和僧侣，对他们进行说教。他为发动反对国王的叛乱，训练士兵并且散发传单，为他的叛乱提供思想基础（《郑氏录》和其他传单说，“木子亡，奠邑兴”）。他扩展了他的组织，他并提出了一种与国王所崇拜的儒学相反的令人惊讶的革命理论：“暴君应被处死，不义之人应除掉，他企图实现他的理论并组织了一个团体。但被人察觉了，于是他本人和全家被诛。他所有的代表作被焚毁。我们应该重新评价郑汝立的反叛。另一个例子是李梦学的同甲契（编者按：同龄人组织）。

2. 一些意在谋求善意、友好的契，如村落契、姓氏契、年龄契等。

3. 一些专门从事互济互助的契，婚礼、葬礼契，侍奉双亲契，劳动和水利契等。

4. 一些贸易合作的契，如人参契、牛契、金契、银契和纸张契。

5. 农民当中的一些契，比如兵役布区契、户契、洞（编者按：即里弄）契、农业契、松树契等是为了保证相互的安全及稳固邻里关系的。这些契团结了乡村和地方无权的农民，反对统治他们的贵族。契的这种形式常常导致农民与强大的统治者结成联盟，并加剧了氏族间的派别和敌意。这些组织不承认成员之间的平等，我们可以大致将它们看作是以陈腐的忠诚和同情连结起来的封建实体。但它们却是地方自治的开端，

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以作为我们未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基础。

除此之外，农耕劳力互助和乡村中其他令人钦佩的风俗习惯纯粹是为了促进团结和互助。

## 克服国内危机的爱国传统——李将军、志愿兵和东学农民起义

崇尚儒学的李朝破坏了以“知行合一”原则为代表的领袖的形象，这一原则是新罗时期“花郎”的主要精神，这种精神是奉献给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一度由高句丽广开土王所坚持的民族尊严消失了，国家不断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但每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的威胁时，尽管统治者是软弱无力的，花郎精神却会从人民中间焕发出来。一个光辉的例子就是李舜臣将军在抵抗外侮时所取得的成就。学者李晬光是李将军的同代人，他亲身经历了丰臣秀吉的入侵，看到了花郎精神的复苏。在一本题为《芝峰类说》的书中，李晬光指出，花郎是民族的英雄，他们团结一致，纪律严明，人们通常称他们为花徒或芬芳的信徒。在丰臣秀吉入侵期间，爱国青年组成花徒，在李将军的激励下，恢复了花郎精神。

研究花郎的专家丹斋认为，平壤的妙清起义和金富轼的著作《三国史记》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民族的传统即花郎精神那时已消失了。

李晬光认为，不管怎样，花徒出现了并在所有村镇组成了契团体，从事保卫国家的工作。在日寇入侵期间，僧军非常出名，尤其是在西山和四明堂法师领导之下的僧军更是闻

---

• 指李舜臣、义兵和东学农民的起义——编者。

名四方。他们的教诲是新罗的花郎所传的五项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僧军也属于花徒之列。

民族英雄的伟大典型当推李将军——东方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他的英勇的海战和他的高贵尚武精神，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帮助我们建立起了爱国传统。

自己卯士兵叛乱之后，义兵运动遍及全国，其规模和交战次数都是惊人的。尤其是全琫准将军领导的东学党运动或称向东方学习的革命，提出了这样的箴言，“反对西学，反对日本”、“拯救人民，除掉暴君”。这是农民的起义，其潜在的精神就是花郎精神。东学党的缔造者，崔济愚出身于庆州花郎信徒的诞生地。他建立了一个基于三大宗教之上的国家宗教，使儒教、佛教、道教融为一体。他寻求国家安全，使人民摆脱痛苦和在地上建设乐园。这同样要建立在花郎精神的基础之上的，他试图复活在人们心中的古老传统。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崔济愚剑法娴熟，而且他用一支尚武的歌曲来鼓励舞剑，歌中体现了从前花郎信徒的尚武精神，伟人的实际形象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为了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献身沙场的爱国战士。

### 世态文学的繁荣

世宗创造了谚文以后，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以后，用谚文写作的真正的民族文学比中国文学发展得更快。成俔的散文和尹善道的民歌受到后人的高度赞美。尤其是许筠的《洪吉童传》是艺术之珍品，因为它是纯粹的朝鲜作品，不象《九云梦》和金迈重的《谢氏南征记》那样模仿中国的作品。许筠在《洪吉童传》中试图批评儒家的逻辑，鼓吹消除阶级的差别，并预言

了人民力量的兴起。

李朝中叶以后，以大众生活为基础的世态文学出现了，从贵族和平民的后裔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文学家。英祖时代居于中下层的金天泽写了《青丘永言》一书，金寿长写了《海东歌谣》一书。此外，妇女们也开始让人感到她们的存在，她们通过以谚文写成的诗作来反抗屈从的地位。

### 退溪和实用主义者

儒家的教条主义在李朝通过李退溪和李栗谷这样的大学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乡校的发展，他们隐退到遥远的山区，传播深奥和抽象的哲学思想。从而伟大学者都卷入到“四一七”学术之争中去了（关于理智的四个方面和感情的七种表达之间的争论）。退溪的学问传到日本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了日本人的思想。

栗谷同样对社会与政治问题感兴趣，并主张进步与进化。是他伟大的预见要求我们在丰臣秀吉入侵之前训练10万士兵。

16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列强开始入侵东方，朝鲜这个隐遁国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朱熹的教诲。受西方思想和商品的刺激，实用主义出现了。

实用主义(实学)反对朱熹的理论——后者着重于诡辩和空洞的强词夺理，而实学却提倡实用知识和科学，其基本精神在“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一标题中体现出来。根据金钟熙，在《实事求是论》一书中的定义，“实事”一词意味着避免无意义的争辩。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丁若鏞(笔名茶山)写了《经世遗

表》治国之书和《牧民心书》，在书中他分别批评了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坚持朱熹派哲学的两班阶层的生活。他强调了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宣称“没有人能超过尧舜（传说中的古代中国君主）。他在关于勤勉方面，进一步对趋炎附势的特权阶层浪费他们的生命表示痛惜。

回顾以往的哲学著作，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果实学的改良哲学或实用主义能够战胜朱熹派哲学，战胜助长宗派斗争的儒家思想及其它的分支理论，那么朝鲜就能更快地摆脱落后状态。

## 第七节 对李朝衰败的反思

### 人民起义和外国殖民主义

李朝社会由于受到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及英祖统治时期契丹入侵的双重侵略，陷入了内部的大动荡。在前几章里，我曾回顾了李朝自身陷入大混乱的时期，在此期间，宗派之间的权力冲突在三个不同的统治时期约进行了60年左右，即纯祖时期、显宗时期和哲宗时期。王后的金氏家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权力斗争的局势，控制着不义之财和舆论工具，使得地方官只能成为其氏族派系中的一员。他们残酷地榨取农民的血汗并强迫他们服劳役，至少可以这样说，农民所受的苦是前所未有的。

权力斗争是政治腐败的表现，王后家族的亲信形成了一个宗派以维护这一氏族的宗派利益和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由于宗派主义和外国的侵略，当时人民受到所谓的权力政治的利用。人民不仅受到中央两班阶层的残酷剥削，而且

还要受地方官员和“权力政治家”下属的残酷剥削，国王的检查官暗行御使经常被派到乡村调查情况，对做了坏事的官吏或官僚予以必要的惩罚。但李朝的贪污与违法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些王室的检查官也被收买了。

许多自然因素促使李朝的崩溃：旱灾、水灾、蝗灾持续不断，流行病广为传播，乞丐遍地，饿死人的现象很普遍。1671年，显宗统治的第12年，由于庄稼欠收，疾病流行，死亡人数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时被杀死的人还要多），以致穷人掘开坟墓，剥去死人身上的衣服，小孩和婴儿被任意抛弃。情况变得如此惊人，使得政府不得不公布保护和照顾弃婴的法律。1812年，纯祖统治的第12年，平安道的饥民总数达90万，黄海道饥民达51.2万，江原道有12万，庆尚道有92万，忠清道有18万，汉城有69万。面对众多的饥民，政府束手无策。一句古老的谚语这样说道：“甚至政府对贫困也束手无策。”

这句谚语用在上述时期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农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氓和乞丐，有些人成为匪徒，流窜于山区之间，焚烧树林、村寨和地方行政机关。他们经常骑着马，扛着枪，抢劫和火烧城镇，因而被称为“纵火匪帮”。与此同时，海盗则聚集在沿海地区和大江沿岸活动。

那时李朝受到了无数农民起义的威胁，其中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是纯祖统治的第11年，1811年爆发的洪景来起义。当时洪利用政府对平安道人民采取的歧视政策和农民的悲惨生活而领导了这场起义。

尽管有人声称洪是个满腹牢骚的官吏，有改朝换代的野心，但如此规模的起义只有在当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因

为农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起义者完全控制了清川江以北的地区，王朝受到了完全被推翻的威胁，它的根基已经动摇了。但半年后，起义者的堡垒定州要塞受到猛烈攻击，起义以失败告终。然而农民们不再驯服了，他们象蜜蜂一样到处起义，不久，庆尚、全罗和忠清各道都爆发了农民起义。然而这些起义最终还是被镇压了。

19世纪60年代哲宗统治期间经历了“大众起义”的时代，它以著名的晋州人民起义为开端。1862年2月，晋州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庆尚右道兵马使白乐莘的残暴和贪婪而发动了起义，他们用竹茅武装自己，头上围着白毛巾。他们攻打国家机构，杀死贪官，驱逐头目，焚烧官邸和政府机构，这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称为“东学起义”——朝鲜进入近代之前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那么在农民中爆发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历史学家说，起义的爆发应归咎于“三个行政机构的混乱”，即土地、军事和税务机构的混乱。由于这一混乱，国家财政枯竭，地方官吏的苛政更加残酷。农业经济由于极度的剥削而完全崩溃。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之上的李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已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乘三个机构处于混乱之际，地方官吏通过中间方式剥削农民，因为缺乏精确登记土地的制度，在实际收获与纳税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尽管通过各种阴谋诡计增加农民赋税负担，但全国各地的免税土地也在增加，所以国库几乎空空如也。为弥补开支，政府向农民征收各种各样的附加税，这最终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游民。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吏没有薪俸，于是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军事管理意味着要交付织物以免服兵役。无助

的农民受害最深。根据“还谷”(粮食交换)条件,国家应该为沦为贫民的农民利益着想,在春天用低息贷款给他们,待秋收后还款。这在以后却也变成了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全国规模的高利贷形式。农业经济受到的破坏,最后达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太院君在晋州人民起义后的第二年,即哲宗统治的第14年执掌政权。他在国内实行彻底的改革,同时贯彻所谓的“锁国”政策以抵御西欧殖民主义的势力。他采取行动抑制外戚家族的“权道政治”,在4个不同的派别中平均分配权力,并且废除了地方教育机构书院。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挽救已经腐败的李王朝。他愚蠢地发起了一项重建景福宫的大型工程,为此而向人民征收重税,从而重新引起人民的不满。

在对外方面,太院君统治时期引入了天主教,列强企图使朝鲜半岛殖民化。日本、中国清朝和沙俄竞相控制朝鲜,西方帝国主义者鸦片战争中侵入中国以后,贪婪地窥视着朝鲜。结果导致了丙寅(年)大屠杀和乙未(年)大屠杀。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势力强大的殖民主义者控制中国和朝鲜的企图加剧了远东局势的紧张。由于成功地击退了外国人的两次大屠杀,太院君得意洋洋,他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甚至建立了纪念碑以纪念这两件事。但统治了10年之后,1874年,他被迫将权力交给了闵妃家族。

以后闵妃家族在统治期间同样采取“锁国”政策,但在高宗国王统治的第12年,由于所谓的“云扬号”事件,王朝不得不对日本实行“开放”政策。根据1876年签订的“江华条约”,政府同意除开放釜山作为外贸港口外,还开放了另外两个港口。协议达成后,长期怀有征服朝鲜野心的日本武士开始将日本



商品聚集到朝鲜 这次是一种“无形的经济侵略”。日本外相宫本小一来到朝鲜签订了一项贸易与商品协定。4年后，花房义质来到朝鲜，为日本驻朝鲜首任代理公使。同时，一位名叫金安集的朝鲜人被派往日本。

根据协议，除浦山港外还向日本人开放元山和仁川两港。但是日本人却趁此机会对朝鲜作了彻底的调查。不久来自日本的廉价棉制品便垄断了朝鲜市场，而朝鲜则沦为以廉价向日本出口大米的地步。尤其是日本商人在将欧洲商品引入朝鲜市场的过程中起着中间人的作用。进口的西方商品都是靠日本的船只运输的，它占了日本向朝鲜出口的80%。换言之，日商发展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并且成为促使朝鲜殖民化的帮凶。

鲜朝社会的大门被打开了，各种新的文化和制度象潮水般地流进来了。为促进朝鲜的现代化，一批“绅士旅游者”被派往日本，而国内却为此引起了麻烦。国内的民意分为二派：一派赞成现代化、改革和独立；另一派坚持保守、奴隶主义和亲清路线。这一政治纷争导致了主张革新的闵派和主张保守的太院君派之间的宗派斗争。日本、中国和沙俄也卷入了这场激烈的宗派斗争。

但是当1873年太院君引退时，领导权转移到革新派的闵派手中，于是他们就努力按照日本模式改革国内政治体制。在军事方面，购进新式武器，邀请日本军官按日本模式重组朝鲜军队。

闵派的革新运动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痛苦的认识之上的，即要使朝鲜实现现代化，但却不能触动李朝的官僚统治和它的土地制度。革新运动并未扎根并形成一个新的领导阶层来

代替腐败没落的两班阶层，它只是以表面上的变化而告终，且仅仅局限于介绍国外新的制度和文化的。

革新以惨败而告终，因改革中没有产生能使国家现代化的新的领导精英。闵派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体制，拥有新技术的军队形成了。但是这个体制招致了旧军人阶层和大院君派的怨恨。旧军队中的成员以迟发薪俸为由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企图推翻闵派。政变的支持者捣毁了闵派成员的家宅，杀死了日本军事顾问，捣毁了日本使团。这就是所谓壬午兵变。

政变使大院君再次执政。他迅速控制了叛乱，改革了政府结构，清除了闵派成员，部署了自己的爪牙。同时日本、中国向一片混乱的朝鲜伸出了侵略之手。例如，日本迫使朝鲜在1882年签订了利物浦条约，根据条约，日本获得了50万日元的赔款，并取得了在日本驻朝鲜使团的四周驻扎军队的权力。

清朝急切地想重新控制朝鲜半岛，因此在预防朝鲜军队叛乱的借口下派遣了5千名军队，劫持了大院君（清朝不赞成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并建立了一个由闵派组成的政府。清朝进而命令这一傀儡政府同欧洲国家签订贸易协定。1882年它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1883年与英国和德国，1884年与意大利和沙俄签订了贸易协定。

正当西方努力向东方推进，中国成了欧洲帝国主义侵略目标的时候，日本、中国和俄国公然企图吞并朝鲜。乙未兵变以后清朝军队进入朝鲜是对日本的有力打击。从内部讲，这些斗争是形成主张现代化的亲日派和奴才相的亲华派并最终将闵派本身分成亲日分子和亲华分子的原因。金玉均、朴泳孝

和徐光弼领导的现代化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于1884年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控制了王宫，组成了一个新政府，并颁布了朝鲜改革和现代化的通告。

但是这个所谓的开化政府，政变3天后就以失败而告终。而朝鲜则由于日本、中国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为在朝鲜争夺支配地位进行的斗争而沦为殖民地国家，李朝官僚之间的宗派斗争愈演愈烈，地方官员对人民的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剥削，在哲宗统治期间，大众起义发展成为伟大的农民革命，称为“东学起义”。由于全罗道知事赵秉甲要农民交纳水利税的荒唐要求，激怒了农民，1894年农民革命扩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全琫准将军至少统帅了一百万东学起义军。全琫准这位东学起义组织者发动了朝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大众起义。革命者倡言：

“人类是上帝”主张建立“地上乐园”，把人民从无情的压迫中拯救出来。这些是东学信条的基础。

全琫准不久在击退日本和西方势力、清除暴政拯救人民的崇高口号下，发动了一场反对外国殖民主义和压迫人民的专制统治的民族革命。东学党军队胜利地攻破了全州要塞，而这是湖南(现在的全罗道)的中心。大米免费分发给饱受贫困之苦的农民，残暴的两班和官吏即被消灭。全琫准和金开男统治全罗道达三个月之久，他们待机进入首都。

但到了5月，日本和中国军队干涉了朝鲜内战，从而全琫准被迫放弃全州要塞。但是他仍在各道、郡建立了东学自治管理组织执纲所并提出了12点改革方案。12点改革方案不仅要惩罚贪官污吏，而且还烧毁男女仆人的档案册(一旦其名

字被登记造册，本人及其后代将永处于半奴隶的地位)，废除各种税收，取消官方和私人债务，甚至主张平分土地，这是现代化的本质：土地改革。尽管在甲申改革期间这些主张得到了忠实的实现，但东学革命的目的只实现了一半。

诚然，东学革命并未推翻李朝的官僚统治，但重要的是，这是首次民主革命，并且成为朝鲜实现现代化的开端。它的历史意义是：

1. 它是朝鲜近代之前的大众革命的开始，同时又代表了反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朝鲜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建立在“保卫祖国，为民除害，救民于水火”的大众化口号基础之上的。

2. 从农民中产生了一个建设新社会的新的领导阶层，而李朝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在崩溃。末落的李朝社会孕育了农民革命。

3. 建设新社会的原则和革命的原则包括流行的东学哲学“人类就是上帝”，这是民主的朝鲜化的开始。这些原则不是直接从西方哲学中引进的。

4. 作为一种象花郎一样的独特思想，在东学哲学之后，通过3月1日的独立运动、4月的学生革命和5月的军事革命传给了后代。

但是，东学革命为中日战争提供了基础和借口。尽管朝鲜政府要求两国的军队都撤走，但日本军队却战胜了清朝军队，为日本的统治朝鲜提供了坚实的根基。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颠覆了由闵氏家族掌管的政府，组成了所谓的金弘集内阁。日本通过金（金本人是个赞成现代化的亲日派），对于1894年按日本模式进行的甲申改革施加了影响。由于是

日本侵略军作后盾，引入朝鲜的改革，所以这是一个建立在日本现代化思想基础上的舶来品。

这项改革包括实现两班和平民之间的平等关系，销毁男女仆人的登记册——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禁止买卖奴隶，废除较低的等级，禁止早婚，不准将惩罚性措施扩展到罪犯的家属身上，颁布新的官吏聘任法，以货币支付税款，不准对士兵歧视，派遣学生出国，邀请外国顾问。

但是原想彻底实行的改革并未取得有效的成果。

简而言之，只是李朝的统治者被日本的殖民主义者所取代了，东学革命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烟消云散了。问题的中心不是现代化的规划，而是形成能够实现规划的国家领导。尽管国王在1895年，由亲日派朴泳孝内阁起草的14条声明中声称“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但这不过是为日本完全统治朝鲜扫清了道路。

日本在中日战争中获胜以后，俄国、法国和德国对日本统治朝鲜和满洲反应强烈。俄国一直渴望南进满洲和朝鲜，所以爆发了日俄战争。从外交上讲，朝鲜是日本和沙俄利益的焦点，有人甚至建议使朝鲜中立化或按北纬39°线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但是在1905年，沙俄最终被新兴的世界强国——日本击败。

在日俄战争期间，韩国（按：朝鲜于1897年后改国号大韩）试图于1904年声明中立，但失败了，并且被迫签署了乙巳保护条约，该条约几乎剥夺了韩国的主权。1910年8月，日本通过签订韩日合并条约，终于吞并了韩国。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的悲剧就从那一天开始了。直到1945年8月15日，韩国获得光复之前，“韩国”一词消失了，而民族的苦难史是用痛苦

的眼泪写成的。韩国人没有可以声称是自己的国家。

日本的经济侵略结合它的军国主义是破坏韩国主权的基础。经济侵略是通过下述措施实现的：（1）对韩国货币进行的纸币改革；（2）建立东方开发公司；（3）通过1910年的土地测量来加强殖民剥削；（4）学校制度的“日本化”；（5）日本文化渗透。

韩国的现代化在日本的强制下按日本模式进行改革，因而是残缺畸形的。韩国成了经济侵略的牺牲品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基地。殖民主义的余毒一直残留到1945年韩国光复，这阻碍了所有韩国人为祖国的重建作出努力。

## 第八节 从崩溃到重建

### **李朝的垮台、韩国战争、4月19日革命和5月16日革命**

李朝垮台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在此期间我们的祖国拖着沉重的步伐从废墟走向重建。

在现代的黎明时分，当现代化和西欧大国开始在东方出现时，以“隐遁王国”和“早晨宁静的土地”而为人所知的朝鲜从世界上消失了，进入了被征服的黑暗历史。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我国种族也许会完全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留下的只是象南美的印加帝国一样的传说。

我国在现代史上的苦难、国家毁灭的耻辱，共同导致了3月1日的独立运动，1945年8月15日的光复、1960年4月19日的学生起义和1961年5月16日的武装革命，这些是我国走向重建的基本步骤。我们的国家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独立运动，勉强保持了民族精神，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的

光复，不料遇到了国土的分裂，接着又在同胞自相残杀的韩战中发生了同室操戈的悲剧。金日成的红色专政欢迎苏联的红色殖民主义和红色中国的帝国主义，从此开始了对北韩人民的残暴统治。

在南韩，在李承晚及其自由党的12年独裁统治下，农村由于奢侈的消费者——外援经济而变得贫困，外援经济甚至不能解决电力生产这一工业发展的基础问题。

城市的畸形发展以牺牲农民的血汗为代价，腐败和不公平是如此普遍以致韩国最终被认为是“远东病态和封闭的半岛”。甚至在我们年轻的一代为恢复民族意识，征服贫困，重建民主而举行了4月19日学生起义之后，民主党，那伙光复后出生的地方地主和贵族(他们并不比自由党好)重复过去的弊政达9个月，这最终导致了5月16日的武装革命。

5月16日的武装革命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现代史上的民族使命——为取得经济独立而进行民主革命的真正起点，这种经济独立开始于1945年，并在4月19日学生起义中得到加强。它也是我国社会历史的强大链条中最新的一环，它在东学革命、1919年3月1日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在建立大韩民国的思想中贯穿始终。

过去的半个世纪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点。1910年，我们国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韩日“友好条约”签订后，我国民族蒙受了36年的耻辱。

过去的半个世纪同样也是世界历史中亚洲民族觉醒的时代，同时也成为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所谓的落后民族取得了独立，打碎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并试图使国家走向现代化。在这一重要时期，我们的现代化在日本的束缚下是不可能实

现的，所以我们所受的日本统治之害延续了许多年，并阻碍了我国的重建。

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是惨无人道的，他们通过具有野蛮无情的武士性格的军事和便衣警察压迫我国人民。日本的侵略，尤其是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剥削，使韩国在其现代化的早期就受到折磨，遭到掠夺的韩国农民——他们在李朝统治下同样受尽了苦难，更为贫困了。为了谋生，成千上万的韩国人被迫离乡背井，移居满洲和西伯利亚。

因为日本将韩国作为它的市场和原料基地，所以在经济上进行无情的殖民掠夺，而李朝末期的经济是建立在封建的和入不敷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处于甘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畸形的殖民地地位。

日本对韩国的兼并是在1909年8月29日公布的，随后日本立即开始进行土地测量以建立现代私人土地所有制，从而巩固和加强殖民统治。用九年时间和大量资金测量土地使韩国总督府，即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指挥部成为大片土地的主人，大量移居韩国的日本人攫取了土地，垄断了矿产和商业权利。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进而阻止了韩国民族资本的形成并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18年土地测量完成以后，现代私人土地所有制首先在韩国建立起来了。土地测量和买卖或日本人擅自占有的行径引起了很大混乱，因那时旧的土地所有制仍然保持着。在韩国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下（亚洲的封建集权），现代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意识尚未得到发展。韩国的现代化没有作为农民和公众力量壮大的结果而实现，它只不过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殖民



统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强加于我们的舶来品。

虽然韩国的资本主义始于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建立，但它却被扭曲和收缩了，因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朝鲜的货色。

从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时起，李朝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开始崩溃，并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在朝鲜投资，日本在朝鲜建立了新的货币制度，将我们的度量衡改为同日本相一致，并在朝鲜设立了金融机构和公司，建立了东方开发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日本翻版），建造铁路垄断朝鲜市场。同时日本企图使朝鲜成为它的粮食供应地。1918年完成的土地测量成为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从外国引进的“土地改革”。结果土地被拥有征税权的贵族和官吏私人占有，日本的在韩国的总督府通过没收土地成为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而所有的农民都成了佃户。

尽管所谓“土地改革”是现代所有制的基础，但它不是根本结构上的改革，而只是佃农与类似官吏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延伸。我们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更加贫困了。尽管进行了土地改革，韩国的农业经济，仍无法避免半封建的曲折的性质，因为农民必须支付高昂的实物地租。

通过1949年6月的土地改革，土地分配给了无地的农民。但是由于韩国战争和其他因素，重新分配的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并出现了以高利贷盘剥农民这样的恶劣现象。这类贷款的年利率常常超过80%。土地改革没有为农业经济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通过土地的进一步细分，产生了许多土地又少又贫穷的农民。这加剧了农户的贫困，农户必须连续5

年以实物形式交纳30%的年收获,作为分配土地的购买价格。

土地所有者不能将收到的地契转变为工业资本,因为官员们和政治捐客往往操纵着既得企业,这些企业落在新生的所谓“光复后所产生的贵族”手中,土地所有者失去了通过土地改革形成民族资本的机会,虽然“光复后所产生的贵族”在与掌权的政党和政府当局的冲突中变得富裕了,但他们也没有形成健全的冒险资本,因为他们完全受政治变动的支配。

换言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土地政策和光复后实施的土地改革都没有带来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管理的合理化,而是通过国民经济不景气和农民离开土地造成了我国农村的凋敝。

土地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阶级没落了,我国的村庄在人员和物质两方面几乎都荒芜了。

因此农民不仅失去了他们先前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的命脉,而且失去了取得资金的财源。结果,农民被迫转向与当地社会没有联系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并受高利贷剥削而最终成为无情盘剥的对象。农户的债务日益增长,加剧了我国经济中“贫穷的恶性循环”。

汉城的日本总督府无情地压制韩国人民的独立。政治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从“早晨宁静的土地”上消失了。然而,我国的独立精神却在人民中完全保存了下来。

在韩国归属日本以前,由流放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的爱国者所组织的反日义兵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活动,他们经常越过鸭绿江,突袭日本军事和警察设施。文化人、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也发扬着民族独立精神。出版物(独立新闻等)渐渐出现了,私人教育机构,例如培才、汇文和阳春学院以及寿福、湖

南等学院也建立起来了。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得到了发展,并推动了民族的自我觉醒。

韩国人民独立精神的自我觉醒和成长,在1919年3月1日的独立运动中爆发出来。虽然这次全国性革命运动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独立运动的意义在于所有的人民,包括男女老幼;通过为独立、自由而举行的示威。显示了民族的团结。它在民族起义中显示了现代的自我觉醒,消除了封建阶级的意识。东学起义以来,人民第一次发现了自决的民族意识。

可以说,它是我国健康的民族起义大爆发,因为它是人民反对外国军事独裁的自我觉醒。在3月1日运动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斗争,一直持续到全国光复。

3月1日独立运动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在韩国的统治方法。1920年后15年,日本发动了稻谷增产运动,并采用了统一栽培稻谷的农业政策——一种殖民地经济结构,结果,韩国经济由于没有企图进行多元发展而萎缩,这导致了不能自立的经济结构,直到今天它还影响着我国的经济。

由于1931年满洲事件的契机,日本工业资本主要投资在韩国北部,朝鲜水电公司和兴南氮肥公司建立起来了。矿产、纺织和食品工业出现了。因此,南韩今天主要生产稻米,而北韩却已经工业化了。

从满洲事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国成了日本侵略大陆的基地,韩国的经济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韩国人甚至没有鞋穿,也没有大米吃。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终使韩国人民“皇民化”,并试图通过强制使用日语,使韩国人姓名日本化以及在日本神道庙里

作礼拜活动等措施来剥夺韩国人民的语言和文化。然而对我国的专制压迫，终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了。我国获得了光复。

1945年8月15日！

这是我们的光复之日，但这光复不是我们自己赢来的，而是由盟国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这个事实造成了以后16年的混乱。我国以38度线划分成两半，这同样是外国的“礼物”。苏军在韩国北部建立了共产主义傀儡政权，而南韩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

在我国分成二部分以后，金日成作为傀儡的赤色帝国主义的新殖民政策，导致了1950年6月25日的韩国战争，可怕的3年冲突使我国成了一片焦土，这是民族的大悲剧，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联合国军司令和共产主义者在1953年6月27日（编者按：原文误，应为7月27日），违背韩国人民的意愿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这次战争结束了。

在金日成独裁统治下，北韩人民被剥夺了自由，傀儡政权在停战以后强制推行“千里马运动”，人民成了傀儡政权的奴隶。

在这些年里，大韩民国的形势如何呢？

在自由党独裁的12年期间，农业经济破产，官员道德败坏，非法财富的积聚，使我国成了腐败和不公平的温床，他们并不关心使国民经济健康地增长。由于年迈的李承晚的愚昧和独裁以及“光复后崛起的贵族”的发展——自由党鼓励这种发展，使我国的前途越来越暗淡无光。直接引进而未经消化的议会民主制失败了。30亿美元的外援大部分浪费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上，甚至连电力和肥料生产问题都没有解决。

受外国商品广告的引诱，奢侈浪费的倾向发展起来了，而农村却保持着原始的生产方式，于是社会发生了病态。1959年提出的康伦（Conlon）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韩民国竟能保存了民主的外壳，这是一个奇迹。民主制似乎不适合大韩民国，一个温和的专制政府可能更适合他们的国情。”最后，4月19日的学生革命推翻了李承晚的独裁。

在学生革命后接管权力的民主党，在9个月间只是重复了弊政和腐败，并使韩国变成了一个没有法纪到处是示威游行和海盗的国家。

一直保卫着国家的爱国武装力量，终于舍命起义了。5月16日凌晨，革命军事力量开进了城市，组织革命委员会，勇敢地开始清除一切旧的恶习（包括对农民和渔民的高利贷），许诺恢复文人政府，现在正朝气蓬勃地实现革命的目标。

起源于1945年的韩国民主革命，必须通过新的领导力量的革命思想和由战士、学生及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一代才能完成。虽然为时已晚，但重建国家的步伐已经迈出，这预示着民族的复兴。社会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始。一个民主的福利国家必须建立起来，它将使人民摆脱贫困。

## 第九节 为了现代化的韩国——我国国民革命的任务

我们的近代史是一部失败、国家毁灭和混乱的记录。我们的大众——历史的创造者，缺乏自主并以奴隶主义和屈从于外国列强的控制为特征。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曾谈起“韩国的他治史”，当我们认真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时，我们不能否认这

一措词的贴切。

我们历史的主人——人民，长期处于冬眠之中。新罗王朝的贵族、高丽王朝和李朝的两班及官僚阶级沉缅于自私享受和特权，他们阻止人民中出现新的领导力量。在封建和中央集权的土地所有制下的朝鲜人民是半农奴，封建阶级制度设置的障碍使解放成为不可能。因此，我国的历史是王朝的历史，不可能产生以人民为基础的真正历史。

人民反抗的历史，例如农民大起义，郑汝立、洪景来起义和东学起义又都被视为盗匪活动，不是作为历史运动而记载的，因此，难以发现我国历史的真实性。

一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个国家的火炬，也是一面镜子。过去，我们不具备观察我国历史的眼光，甚至连我国的未来也没有设想。我们的历史是人民不断在黑暗中摸索的记录。现在是我们采用新观点来看待韩国历史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握韩国民族的主观能动性，恢复韩国历史的精神支柱，对外国文化的引进采取批判但又加以接受的态度。

我国现在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从西欧列强开始向东方推进的时代起，这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成。如果5月16日军事革命要成功地成为一次国民革命，那么它必须解决我国所面临的这个历史性问题。

为了完成韩国现代化的任务，我们首先必须把民众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欠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今天贫穷世界的呼声，是它们生存愿望的表达。它们现在在国际外交领域中为生存和安全而战斗着。

虽然我们通过1945年的光复，赢得了独立，但为自立和民族自尊的斗争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每个人必须

抛弃个人私心，为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一致。过去，当许多国家通过抛弃传统的落后性来建立现代社会时，民族主义的热诚总是起作用的。我们必须首先形成现代化的精神状态。

其次，我们必须帮助人民摆脱贫困，并建立自立的经济。因为他们被贫穷弄得疲惫不堪了，所以我们中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改变的。人民从未见过民族资本的形成，政治掮客在国内猖獗，有害的政府经济是根深蒂固的，阻碍了现代化。健全的经济概念还未产生。甚至于不劳而获的两班阶层的观念形成了懒惰的民族特点，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光复后的16年间，只有城市得到了畸形发展。由于长期的疲惫不堪，人民处于呆板、消极和顺从的半奴隶状态。在土地国有制度和政府当局的压迫下，私有农业的所有权思想消失了，人民被剥夺了一切重建的愿望。人民发现在专制统治下，改革或重建是不可能的，于是就自暴自弃，求助于非科学的迷信和占卜。民众的这种宿命论阻碍了开拓精神和改革愿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冻民众僵化的思想，帮助他们恢复重建的愿望，对生活采取积极态度，并成为珍视个性而又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人。

第三是建设健全的民主。当我们反思过去16年中民主的历史时，我们发现韩国的民主失败了，因为它是从外国照搬过来的，没有植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没有反映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李朝社会的集权和封建的性质，在好几代人中有害地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因此光复后的16年间，看重亲属关系的家族社会的“封闭道德”依然存在，地区、家庭和宗族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自我觉醒的个性受到了妨碍。出现了类似李朝时的小集团，而不是现代的政党。在李承晚大权独揽

的统治下，国家停止了发展。这种大权独揽和非制度化的政党——以个人为中心的贪婪的集团所起的作用，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失败。

我们可以引进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根基。我们很晚才认识到建立“韩国式的民主”的必要性。因为民主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而是自主的自由，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实行民主，就必须涌现出领导人。

韩国民主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在企图建立民主的同时仍保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领导力量（光复后产生的贵族、地主、两班等，他们组成了自由党和民主党），新的现代领导力量的出现是韩国的现代化所不可少的。

在基层启发农民并在上层培育新的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民主领导力量，都是不可少的。

肩负着韩国现代化的人们！

必须发现和培育韩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 第三章 朝鲜人民历代苦难记事

### 民族的苦难史

我们民族的历史一直是一部苦难史，这并不是武断的臆说。从我国的特点和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一直是一部国内贫困化和内外交困的历史。我在前面详细分析了我们的内部条件，即民族独立精神的缺乏是怎样延误了这个国家从内部克服不发达状态的，它是怎样阻碍这个国家如同现代国家那样来发展的。下面我们可以追溯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同周围国家的关系，来揭示这个民族的苦难史，以及我们是怎样丧失独立精神的。

如果我们的历史是一部受难和外国入侵的历史，那么这是由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的。当我们思考我们的历史和仔细研究地图的时候，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是由我们的地理位置和内部衰弱造成的。用地缘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是很明显的，朝鲜半岛被三大力量所围困。西面是中国，北面是苏联和满洲，最后，东面有日本。

它虽然受到围困，但如果有一个能驾驭局势的敢作敢为的人，它可被作为一个基地，最后成为一个对抗三大势力的堡垒。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民族被贫困所压垮，缺乏民族精神，不愿意奋起自强，因而未能形成一股力量。所以我

们的民族一直遭受苦难和压迫，这个国家一直是侵略者的乐园。

以中国大陆为例。每当一个强大的朝代兴起的时候，它的势力就蔓延到整个朝鲜半岛。在中国强大时，它发现有好几个地区可以扩张：向北扩张到蒙古，向南扩张到柬埔寨，向东由山东半岛通过大海扩张到朝鲜半岛，或越过长城扩张到辽东半岛和满洲。在强大和繁荣的时期，中国就利用这些通道，于是朝鲜半岛就不断遭到汉族的入侵，从扶余时代到李朝，朝鲜不断遭到入侵。

在满洲形成的、取得胜利的部落往往进入这个半岛。确实，满洲现在被认为是个聚宝盆，受到许多国家的觊觎，但是在古文化时期，由于气候严寒，这个地方不适合于人类居住。所以，对于满洲人来说，向南入侵是自然的，我认为，檀君(传说中的古朝鲜缔造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将首都南迁的。我以为金、清和蒙古的类似的入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统治小小的朝鲜，而是入侵中国大陆。然而朝鲜总是首当其冲。

由于在入侵大陆时，朝鲜几乎从未因战术或战略的原因而免于触动，她始终是兴起于满洲的王国发动入侵的牺牲品。

由于同样的原因，俄国人企图统治朝鲜的主要目的是想把朝鲜作为桥梁来征服整个东北亚和日本。我认为苏联在韩战高潮中，通过把共产党中国的所谓“志愿军”拉入战争的方法，企图为达到上述目的而保住北韩领土。我们的邻居日本一有扩张机会也要侵略朝鲜。从疆域和地形来说，日本既难以同满洲相比，也难以同大陆中国相比。同朝鲜半岛相比，日本显然享有较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她是个孤岛。在强大和

繁荣的时期，日本也企图寻找通向朝鲜的通道。她的最终目的也是统治满洲和大陆中国。

据历史记载，早在新罗王朝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确实一直是朝鲜的历史背景。为了阻止侵略，它必须强大。但是古代朝鲜的领导阶层陷于惰性之中，被世代的纷争扯得四分五裂，缺乏团结人民和唤醒他们的民族精神所需要的使命感。出于一种舒适的利己主义，他们未能纠正民族精神，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只有他们个人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在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都爆发了爱国民众的自发起义，领导阶层和领袖们却忙于世代的纷争，只考虑自己的幸福而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民族的悲剧在于，尽管由于这些起义而丧失了许多宝贵的生命，使国库几乎空空如也，文化遗产遭到了蹂躏，世代的纷争却仍在继续，甚至更为激烈了。除了上述事实之外，外国占领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缺乏民族团结或繁荣，这种团结和繁荣本来是可以抵消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的。

### **奴仆外交和对日外交契约的民族悲剧**

在包围朝鲜半岛的国家当中，中国的清朝和日本是二十世纪初两个正在觉醒的国家。朝鲜除了外国入侵的历史因素之外，加上地缘政治环境，它仍然是唯一的未曾现代化的国家，尽管所有其他国家都向西方文明的冲击打开了大门。就文明而言，当然是指西方式的文明。

在这些条件下，国家的独立取决于它们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和效率。这也成了衡量东方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中国是第一个，日本是第二个，在

远东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国家。然而当这些国家由于西方文明正在用现代武器代替弓、箭和长矛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封闭在这个半岛之上，固执地挽着顶髻，在温暖的热炕上悠然自得，直到为时已晚。我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向现代化迈进之时，我们仍落在后面呢？

对于这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从我们内部来说，我们的领袖们过于消极规避，对世界的变化方式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着眼于地缘政治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当中国和日本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时候，韩国被抛在后面。

许多西方国家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通过陆路打开同远东的关系的。西方人向东方和北方不断地航行，最后登上了中国大陆，然后登上了日本。向远东航行的船只必然沿着中国南岸航行，然后到达日本的西海。广东立即成了中国大陆的交通中心，而长崎则成了日本的交通中心。从这条路线来看，西方船只到达朝鲜西岸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她的位置更靠北部，还因为路线从华北或南满被关闭了。

根据当时普遍的情形，西方同这个地区联系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从经济上说，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价值。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朝鲜，那是在他们从广东驶向长崎途中，船只被风暴吹偏了航向，在我们的海岸边失事的时候。于是朝鲜人就成了一个落后的民族，因为它同外界的联系被延误了，而且联系又较少。

我们刚同西方文明接触，朝鲜就遭到了日本的侵略。我们悲剧性的历史甚至可以从1876年的江华条约中看出来。朝鲜周围的国家在强大的时候企图将朝鲜半岛作为跳板向大陆

推进,将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纳入“势力范围”。日本这个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大踏步跃进的国家也不例外。于是朝鲜人民就为日本的发展作出了牺牲。

日本的维新需要有民族威望和力量的增进,由于内部革新的不彻底,它未能得到这些东西。某些转移内部骚乱的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高森崎吾集团提出的建议就泄露出了明显的证据,即日本必须征服朝鲜。作为缓和内部骚乱,向海外扩张和将她的势力植根于半岛的第一步,日本捏造了所谓的“云扬号”事件。这被认为是使朝鲜脱离清朝势力范围的必要措施。

在勘察朝鲜海岸的借口之下,日本在1875年派遣了一艘云扬号军舰,它在江华岛隘口遭到朝鲜当局的炮击。为了进行报复,这艘军舰占领了草芝镇。按照当时西方的国际法概念,日本很清楚这些行为侵犯了另一个国家的主权。但她仍用这种海盗行为威胁这个国家。日本认为未经清朝的允许或同意,朝鲜是不会屈服于她的要求的,于是就派遣使节森有礼去拜访中国政府的李鸿章。

所以,虽然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事务的决定却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协定或愿望。我们已成了一个承受着衰落国家命运的民族。

由于当时朝鲜一直是一个藩属国,朝鲜的君主确实不得使用清朝君主所使用的皇帝头衔。条约将要由“日本天皇”和“朝鲜国王”签订。但这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日本被看作是朝鲜的野蛮敌人。所以最后条约以这样的签名结束,即“朝鲜政府和日本政府。”

随着清朝,日本和俄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在李朝的后期,

国家的形势按照冲突的动向而来回摇摆。甚至在对日谈判完成以后，朝鲜的朝廷还不得不向清廷报告这件事。

我们现在了解了朝鲜政府对清朝的依赖。我国内部的政治形势对我们不利，它妨碍我们处理自己的问题，于是朝鲜与日本缔结条约这一行为的国际合法性是令人怀疑的。在国际法中，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日本争辩说，既然朝鲜具有同外国缔结外交条约的资格，她必须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要求得到清政府的明确认可。于是日本就企图通过阐明第一条“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国持有平等之权”来澄清朝鲜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这一姿态的根本动机不仅是澄清这个国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而且是要使日本免遭传统性的歧视。当时虽然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但它仍然歧视日本。这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威望和力量正在上升的时期，常使日本人觉得受不了。所以日本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取得和朝鲜同等的权利，第二是使朝鲜脱离中国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准备好向大陆推进的跳板了。

### **俄国的“南下”方针和美朝关系的意义**

1845年美国第一次企图开展同朝鲜的贸易。那一年，为达到这一目的，议案提交到了美国国会，议案建议同朝鲜缔结贸易条约，但这一企图以失败而告终并且被遗忘了。然而美国海军当局却一直注视着英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进展。

1878年秋，美国船在舒菲尔德将军 (Admiral Shufeldt) 的指挥下，向非洲西海岸开始了环球航行。舒菲尔德在1880年春经由波斯湾和香港到达了长崎。

舒菲尔德的使命之一是“打开”朝鲜。因为他以前曾企图打开朝鲜(他曾于1867年,即舍门将军号在大同江被摧毁后的那一年,乘坐“瓦舒赛特号”(Wachusett访问了黄海道海岸),这次他再作一下尝试是很自然的。美国海军部对他发出的命令是这样的:

“访问某个朝鲜港口,尝试通过和平手段与这个国家的政府进行协商。由于需要对美国罗杰斯司令在1871年对江华岛发动的入侵进行冗长的解释,在接近这个国家的政府时必须采取适当的和外交的手段;这样的接近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为美国的贸易开放港口,所以,要求你们作出特殊的努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海军部发出的命令当然得到国务院的赞同。然而,国务院企图通过日本来促进对朝外交关系的建立,它同前者已保有外交关系。于是国务院就指示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汉说服日本外交大臣向朝鲜政府递交一封私人或官方信件,让他们对舒菲尔德的使命提供方便。然而,日本的中间人角色演得并不成功。

于是自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朝鲜和美国建立起关系。当时朝鲜不希望同西方国家有外交关系,并在以下条件下同日本建立了关系,即朝鲜同它的外交关系不会成为可能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先例;所以日本的努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他们对朝鲜作了许诺,更不用说朝鲜政府的反对态度了。

日本政府也并不渴望朝鲜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首先,日本已把朝鲜从中国分离出来,不希望第三方介入这个半岛。慑于美国的力量,日本没有阻挠这种企图,但她也没有试图帮

助美国。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舒菲尔德前往中国，要求李鸿章作出同样的安排。舒菲尔德在寄回美国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日本的国策是以垄断在朝鲜的商业活动为目的。日本通过治外法权来统治朝鲜。尽管日本正企图将外国人的垄断性活动赶出自己的领土，并同时企图将这种情形彻底强加于她的软弱的邻国，她却正在企图将这种行为瞒过外国人。”这封信生动地解释了如同舒菲尔德海军上将所说的日本对于朝美建交的消极态度。

李鸿章从中国驻长崎领事俞如（译音）的来信中得知舒菲尔德要同朝鲜建交的意图之后大为震动，他邀请舒菲尔德到天津商谈。按照这项邀请，舒菲尔德于1880年8月26日在天津会见了李鸿章。

为什么李鸿章对舒菲尔德表示出这种友善的态度呢？首先，他正在训练和组织中国海军来对抗俄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其次，他正企图利用美国来防止日本独占朝鲜，美国的地理位置遥远并被认为没有领土野心。

现在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下列事实，（1）舒菲尔德同李的会谈是在没有有关国家直接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2）在会谈中讨论的所谓协定草案，实际上是由中国加以适当修改过的义城备忘录，它是由内阁秘书处大臣李同殷（译音）和中国大臣黄村森（译音）共同起草的，（3）在为朝美建交进行准备时，企图在国际官方文件中肯定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

起初，在商讨由朝鲜提出的协定草案时，中国竭力在第一条中插入这样的措词，“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然而，舒菲尔德反对这一企图，指出“藩属国”恰好与1876年朝鲜同日



本缔结的《江华条约》不相一致，该条约在第一条中规定“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从那以后，这件事变得极为复杂。李鸿章想到他要在条约中宣称朝鲜是个藩属国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为在条约的补充文件中宣称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而努力到最后一刻。

同一年的5月7日，（中国的）马建忠到达仁川，根据舒菲尔德和李鸿章的命令为同朝鲜政府缔约作准备（实际上他本人签署了这个条约）。朝鲜政府任命内阁秘书处的申櫨为首席代表，金宏集为他的副手。会议一开始，马建忠告诉申櫨，李鸿章说朝鲜和中国在它们之间宗藩关系的用词上不能疏忽大意。申櫨回答说，由于这件事不在他的权限之内，他必须同国王进行商议，但他接着又说，朝鲜从属于中国已有三百年了。马建忠利用申櫨所说的这句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参考备忘录”，并告诉申櫨让朝鲜国王将它送交美国总统。也就是说，他要求朝鲜宣称它是中国的藩属国，但独立地实行国内外政策。

于是，包括14个条款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于1882年5月22日在济物浦（现称仁川）签订，条约未将中国对草案的修改和关于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条款包括在内，但是“参考备忘录”却按中文原文复制，并以朝鲜国王的名义送交美国总统。于是，尽管通过间接的方式，中国在宣称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这是它在朝日条约中未能做到的。

然而，这个问题并未到此结束。为了按照修好条约互派常驻的外交使节，朝鲜国王任命朴定阳为朝鲜首任驻美公使。朴携带着国王的国书在赴美途中就由于中国的抗议而被迫返

回汉城。抗议的理由在于朝鲜未能就向美国派遣使节一事同中国政府商议。以此为开端，在朴公使滞留美国的一年期间，中国充当了一个主子国家，进行种种干涉。中国的这种行为可能是因为她认为必须根据历史的原因牢牢地控制住朝鲜，因为朝鲜不再是一块隐蔽的土地，而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而暴露于各国的贪欲之下，并且受到这种贪欲之害。

1882年朝美修好条约签订以后，欧洲各国也先后同朝鲜签订了“友好”条约，当时朝鲜的情形就象一块肥肉被一群饿狼盯着。从1882年到中日战争爆发，远东的局势是相对平静的，但是朝鲜的政治局势在平静的掩盖之下正经历着一场费力的斗争。

而且，当时的平静是很不稳定的。当有谣言说朝鲜的亲俄派(当时他们控制着政府)将在元山向俄国海军提供煤炭补给站时，英国突然在1885年4月占领了巨济岛(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巨文岛)。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英国一直将这个岛占领到1887年2月。当时朝鲜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就这个问题进行调解，但遭到拒绝。

从这些历史事实来判断，可以很容易了解当时由于朝鲜局势而产生的国际政治的紧张并认清世界列强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莫吉托(译音)教授的这句话也许是对的，“只有当朝鲜半岛处于一国的压倒性优势势力之下，远东的平静才得以维持”。

然而，当时我们的使命是向世界表明，只有朝鲜的完全独立才能保持远东的平静。虽然赶走日本、俄国和中国需要民族团结和领袖们的自我觉醒，但是朝鲜却受到了相互竞争的世界列强和新出现的邻国的压力，这些邻国渴望扩大自己

的力量和影响。如果当时我们的领袖们懂得他们发展国家的使命，在能够得到人民支持的内部社会改革方面富有勇气，就不会播下我们今天所遭到的民族悲剧的种子了。

实际上，当时的国内形势不允许我们实行独立的外交。此外，这个国家要抵抗不可抗拒的外国强权政治的压力是不可能的。当时，远东上空的乌云预示着战争；由于领袖们感到了俄国南下方针的威胁，他们懂得俄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朝鲜半岛，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坚持认为，朝鲜必须寻求同中国、日本或美国结盟来对付俄国的野心。既然侵略性的强国正企图侵犯我们，我们当初应该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如果这确实被认为是对国家最为有利的，我们为什么对同中国、日本或美国结盟犹豫不决呢？

然而，有一件事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独立的观念，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我们自己为朝鲜民族的发展承担责任。尽管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一个遭受苦难的地方，尽管国际形势使它成了外国强权的战场，朝鲜并非必然或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是由人的主观努力和愿望铸成的。不管国家是受到保护还是被灭亡，不管民族文化是得到提高还是遭到贬黜，除了朝鲜人民之外没有别人要在过去和现在为朝鲜历史的发展承担责任。

有些人认为，特别是最近有人认为，人只是受环境的影响，只是外部条件的产物，于是就只提倡一种强调环境因素的历史观。这是一种混淆因果关系的错觉。李朝的统治者必须为我国主权的丧失，我们民族不断遭受外国侵略之苦和我们对外国强权势力的依赖承担最终责任。如果他们坚持对民族负责的观念和独立的观念，这个国家就不会经历这种悲剧。

这并不能替无视我们的独立并企图将这个国家据为己有的侵略性外国强权辩护，但它确实强调了这一事实，即我们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它的责任必须由我们来承担。

### **日本在各国的默许下侵略朝鲜**

朝鲜半岛的命运是由第一次和第二次英日同盟以及在朴茨茅斯签订的日俄和平条约决定的。这个把朝鲜半岛置于日本的控制和侵略之下的国际协定，是在没有朝鲜政府参加，或者是在朝鲜政府（包括高宗本人）或朝鲜人民不知道的情况下签订的。这是根据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1892年1月30日）（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1902年1月30日）的第一条，和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1905年8月12日）的第三条，以及后来的日俄和平条约实现的。其中最后的那个条约是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在朴茨茅斯签订的。不了解远东的政治形势，就难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孤弱无援的处境。

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是怎样的呢？美国正坚定地维护门罗主义，并且正企图（虽然比其他国家晚了一些）根据“门户开放”政策来打开中国市场。世界霸权仍掌握在大英帝国的手中。所以，远东的形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的政策。然而，俄国却向英国在中东和远东的势力和利益挑战。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向中国逼近，法国和德国随后跟上。与此同时，俄国开始从北方向南推进。

日本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突然出现极大地影响了这种形势。在日本打赢了中日战争以后，英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但是日本在俄、法、德的压力下，不得不在取得中日战争的胜利

之后不久归还辽东半岛，当俄、法、德企图瓜分这个半岛的时候，曾倡导不介入政策的英国不得不在远东寻找一个同盟者。俄、法、德三方协定意味着远东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虽然日本被迫放弃从血战中得来的辽东半岛，但是在中日战争中显示了它的真实力量之后，它看来会成为英国的一个强大的同盟者。而且，英国和日本会结成同盟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们共同反对俄、法、德。

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主要是因为中国无力在远东对抗俄国。英国对俄、法、德协定感到意外，不得不为保住日本这个同盟者而付出代价。为了结成同盟或在国际政治中避免冲突而牺牲软弱的第三国，这在现在和过去都是强国的惯用手段。英国的意图是用牺牲朝鲜半岛同日本结盟的方法来阻止俄国的南下方针。

这样缔结的英日同盟是建立在英国和日本共同利益之上的，于是朝鲜半岛就成了它的牺牲品。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中这样写道：

“有关双方应承认中国的独立，不应承认任何第三国的侵略势力存在于上述两国（编者按：指中朝两国）。考虑到英国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殊利益，双方共同承认，日本除了在中国所享有的利益之外，在某一特定的程度上在朝鲜拥有政治利益，以及商业和工业利益，在中国和朝鲜发生骚乱时，日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这些利益。”

如同条约的这一条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但是日本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的权利也得到了承认。让别的国家来讨论我国的独立性，这在朝鲜人听来是不舒服的，而且，在承认我们独立的同时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这是一个

明显的矛盾。两个强国在未取得我国人民或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签订这样一个协定，这件事具有重大意义。

英国和日本结成同盟对俄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俄国在几年以前同法、德共同取得了辽东半岛并将它的势力扩张到满洲以后，又试图用三方同盟来对抗这两个海洋国家。然而德国退出了同盟，尔后俄国和法国在1902年3月16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对英国和日本的行动提出抗议。然而日本不顾俄法的抗议，它利用同英国这个当时世界最强国的同盟，并准备用美国的财政援助来同俄国进行一场战争。

与此同时，俄国以迫使日本从辽东半岛撤军为借口在满洲驻军，以后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七点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下列条件，即满洲的任何部分都不得出租、转让或出卖给其他国家，不得开放更多的满洲港口和城市。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坚决支持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不能对此袖手旁观。于是，英、日、美向俄国提出抗议。俄国对此置之不理，并在1902年4月通知大韩政府（编者按：李朝高宗1897年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它将强行实施在1892年取得的森林租借权，并在同年5月初占领靠近鸭绿江口的龙岩浦的附近地区。俄国采取这种激烈的行动是因为俄国的好战集团获得了权力，于是就加速了沙俄帝国的最后垮台。

最强烈地反对俄国南下方针的国家是日本，它已使朝鲜半岛处于它的势力之下。另一个有关的国家是英国，它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并试图保住它在那里的市场。同时，由于美国在发展国外市场方面落在了后面，正试图将它的势力扩展到满洲。于是，英国和美国出于共同的利益让日本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对俄国作战。

日俄战争具有重大意义。从韩国的角度来看，日本赢得这场战争以后，韩国完全为日本所统治。

而且，随着俄国的战败，长期与亲日派斗争的朝鲜亲俄派被赶走了。另一方面，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力量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她得以同英国结成第二次同盟，于是就为日本建立一个更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这就与中日战争形成了对比，尽管日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接着却被国际外交压力所挫败。但是，日本却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而上升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同时，英国就此完全达到了两年以前的英日同盟所预期的目的。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在日俄战争中向日本提供财政援助，企图以此来阻止俄国的南下，并以此推动向国外进行资本投资。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它能让日本为它火中取栗，而美国仍然能吃到烤熟的栗子。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用美国的财政援助）在满洲为美国作战。

日俄战争在罗斯福总统的调停下，以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而告终。然而在此之前，英国想同日本这个胜利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日本通过同英国结盟而取得了胜利，俄国可能企图报复，所以，就象她在缔结第一次同盟时所提出的那样，英国将第二次同盟条约的范围扩展到了印度这条英国的生命线。此外，英国给予日本全权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权力。虽然日本同俄国作战的表面的目的是保持韩国的独立，但当时日本要求控制韩国，以及英国将韩国作为牺牲品献给日本，企图以此来利用日本日益增长的力量为它的反俄方针服务是自然的。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其中的第三条规定，

“有鉴于日本对在韩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利益拥有绝对的权利，英国承认日本在它认为对于维持和增进它在韩国的利益必须和适当的时候，可以采取指导、控制和保护措施。”于是，英国甚至在乙巳保护条约签订之前就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当然，韩国在日俄战争期间迫于压力同日本结成了同盟，并为日本的胜利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这个软弱的同盟的“补偿”却采取了建立保护国的形式，它剥夺了韩国的独立。

日本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得到了它的英国同盟的同意，它在经罗斯福总统调停而召开的朴茨茅斯和会上，如同在它和英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坚持对韩国的保护权，美国对此表示支持。所以，日俄和约中的第二条按原样照搬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中的第二条。于是就缔结了1905年的所谓乙巳保护条约。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为什么罗斯福总统在俄国和日本之间进行调停？因为他试图向已同英国结成同盟的日本表示好意，他生怕日俄之间的战争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利益。于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他企图防止俄国和日本直接进行谈判，就充当了它们之间的中间人。罗斯福总统致塔夫脱陆军部长的电报表明了这一点，“美国不得不心照不宣地承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这可以解释为是美国发展它在韩国和满洲的市场的一种努力。美国的这一方针可以从和约签订以后立即就要求取得满洲铁路的建设权，和以后在1909年由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的使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中看出。

然而，在满洲问题上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这



最后导致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征服韩国以后并不满足，并且进一步将侵略扩展到亚洲大陆。日本的这种侵略行径，终于遭到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世界列强的谴责，最后导致了日本在其中遭到失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 **万恶的38度线和朝鲜之命运**

有人认为，三八线是按照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2日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9月7日发布的关于韩国人民的公告）建立起来的，其根据是美国副国务卿韦布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证词。然而，美国和苏联军队的占领，实际上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建立三八线作为占领的边界线是以后在波茨坦会议上决定的。这一结论是以雅尔塔会议的幕后真相为根据的。

让我们根据1945年公布的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外交文件来考虑这个问题（这里使用的参考材料是由共同社的研究室所翻译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在（美国）总统秘书办公室所保存和以后公布的文件中，一项由国务院决定的、作为美国在会议上对韩国问题所持立场的试探性建议是这样透露的：

盟国就韩国问题进行磋商的议程：

1. 参加军事占领韩国的国家。
2. 在对临时国际行政组织或韩国的托管作出决定以前参加的国家。

讨论：

由于以下原因，为取得韩国的独立而采取的联合行动是必需和重要的：

1. 中国和苏联不但邻近韩国，而且在关于韩国的问题上

拥有传统的利益。

2. 在开罗宣言中，美国、英国和中国允诺通过适当的程序让韩国独立。

3. 任何一个国家对韩国的军事占领都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苏联不允许中国对韩国的军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也不允许苏联这样做。因而，我们(美国)持以下观点。

根据行政集中化的原则，一俟在韩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同盟国的代表参加占领和参加军政府。此外，必须使来自各盟国的代表数目保持不变，以免影响美国行使它的权力。

(1)(作者)略；(2)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导致苏联将军队驻扎在韩国，并将在决定韩国占领军的比例时起重大作用；(3)苏联所表示的对韩国的传统性的关注表明，它可能企图参加对韩国的占领，尽管它没有参加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其次，假如在韩国建立托管制度或临时政府，美、英、中、苏自然将在临时政府中起积极的作用。从苏联对远东的立场来判断，让苏联代表参加上述临时性国际行政当局(托管制度)是有益的，不管苏联是否参加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这是美国政府在雅尔塔秘密会议上态度的概要。现对此加以详细阐述。首先，罗斯福政府认为如果苏联参加了对日作战，它在战后参加对韩国的占领将是自然的，所以预料它在战后的托管制度中起积极的作用。其次，美国政府认识到，由于苏联对韩国的传统性关注，它将企图参加对韩国的军事占领，并且认为让苏联代表参加托管将是很有益的。看来罗斯福总统在战争前夕考虑世界形势时犯了错误，并可能过高

估计了在对日作战中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考虑到美国的态度，甚至连一个小孩也不得不怀疑，有美国参加的雅尔塔秘密会谈讨论了，并且就同三八线相联系的对朝鲜半岛的占领达成了协议。

然而，有些人可能仍然怀疑在这次会谈中是否明确建立了三八线。三八线可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作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以后占领的分界线而确定的，因为苏联正拿难以在两个相距遥远的战场上同时展开军事行动和日俄中立协定为借口，迟迟不加入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史家德罗赛尔(Derossel 译音)说，只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以下协议，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北韩就必须被苏联占领，关于将三八线作为占领韩国的分界线的最后决定肯定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显然讨论了苏联的实际参战。

从政治角度来看，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曾讨论过“三八线”。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沙俄帝国和日本曾举行谈判，要在38度线或39度线标明边界，将处于两国势力之下的两个地区分开。这个历史上的先例显然在波茨坦被考虑到了。

如果三八线仅仅是为了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占领而选定，和作为美国和苏联在远东（包括中国、满洲和韩国）的军事行动的明确分界线而选定的，这条线的性质只能表明是“军事的”。考虑到三八线的军事性质，可以说美国对韩国的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战后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从美国军政府时期到韩战的爆发，包括大韩民国政府的宣誓就职。

所以，决定韩国在1945年光复以后命运的美国对韩政策，就它的性质而言是“军事的”。于是，基于军事考虑的政策将继续下去，除非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半岛或整个远东的军事利

益变得一致起来。从战后的历史来判断，自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和美国对韩国的政策从属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领域。

也就是说，三八线作为一条军事边界为苏联（它从沙俄帝国时代起就实行南下方针）将远东共产主义化提供了一块跳板。苏联在朝鲜半岛上的地位不受威胁，它将它作为一个展开军事行动的地区，它通过在北方建立共产主义傀儡政权来从事意识形态的侵略。

与此同时，美国正忙于对日作战和战后的占领措施，无暇对抗苏联的经过伪装的侵略。作为一个证据，与韩国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未被允许参加讨论韩国问题的莫斯科三方部长会谈，以及在同一次会谈中建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以组成两国驻韩军队的指挥官这一事实，可以看作同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有关，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了在考虑了韩国的独立对美苏两国局势的影响之后，不影响军事方面的事宜。此外，美国和中国显然感到很担心，因为苏联如同雅尔塔秘密协定所同意的那样，将阿瑟港（Port Arthur）用作一个军港。

即使这意味着让苏联控制满洲，（美国）也至少必须保住中国大陆和它的沿海地区以阻止苏联的推进。因此，当在中国和满洲尚未建立明确的力量关系的时候，三八线起到了基本的作用。甚至从美国政府强调援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它在中国沿海地区消灭了共产党中国的军队）这一事实来判断，可明显看出美国通过保住南韩来控制黄海和维持太平洋安全的意图。然而，问题似乎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将处于占领之下的日本看作是远东民主的堤防，而认为韩国和满洲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另一方面，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保住北韩这个前哨基地对于苏联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保卫苏联通

向南满和黄海的通道。所以，美国和苏联对朝鲜半岛所作的考虑，其性质是军事性的；特别是对苏联来说，在准备向远东进行军事和政治扩张时，它是极为重要的。此外，美国在中国倡导的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排除，如有必要就通过军事行动来排除中国落入任何一国的完全控制，特别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可能性。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共产主义化的可能性及其产生的影响在它远东政策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不得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考虑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政策。而且，从朝鲜半岛的角度来看，美、苏采取有关三八线的行动对苏联有利。对苏联来说，最初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即在北韩，在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于是为它向太平洋地区的推进取得一块跳板。考虑到美国将精力过于集中于对日本的占领引起了5年以后韩战的爆发这一事实，我们从在取得光复的同时，共产主义侵略的道路也就准备好了这一意义上，更深切地感受到朝鲜的命运，并将它看作是激励我们民族自我觉醒的重大历史事件。

### **韩国战争和16个联合国成员的加入**

领土的分裂很快就导致了内战这一民族悲剧。共产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企图以军事力量来推翻大韩民国，利用领土的分裂作为立足点，从这里不仅将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到南韩，而且扩张到整个远东。如前所述，至少在早期，美国不把三八线看作是一条政治分界线，而把它看作是军事分界线。甚至从规定日本投降的法令来判断，三八线被看作是军事分界线，而不是永久分裂朝鲜半岛的政治分界线。这就是为什么

驻北韩的苏军司令转而将这条只是为了便于日军投降而指定的分界线看作既是分裂南北韩的政治分界线，也是一条军事分界线。它分裂韩国正常的社会和行政机构，不断地企图在政治上使整个朝鲜半岛共产主义化，尽管美国本来并不打算用三八线在政治上永久分裂朝鲜半岛。

显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为建立一个南北韩的统一政府而同野心勃勃和缺乏道德的苏联进行的任何谈判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意建立单一的韩国政府。以后中国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设立了两个美苏联合机构。于是，就形成了由美国和苏联的军事指挥官代表组成的美苏联合委员会，这是为了考虑有关南北韩的各种紧急问题，考虑在两军指挥官之间进行长期调解的办法。但是，由于从一开始就抱有完全相反的目的，苏联自然不会同意美国的意见。美国代表作了种种努力使分裂的领土统一起来，但苏联将朝鲜问题看作是两个地区的简单交换和妥协的问题，而这两个地区在行政上是完全分开的。

由于双方持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会谈只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诸如通邮、无线电广播的波长配置，军事联络等等。以后的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以僵局而告终，没有为我国带来统一，这个委员会原来是为建立朝鲜民主临时政府而工作的。而且，为了反对莫斯科协定所包含的国际托管朝鲜的条款，朝鲜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北韩）抗议运动，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条款无视朝鲜的自决和自治。我们仍清楚地记得，起先反对和抗议托管条款的左派，在接到苏联国际共

产主义当局的命令以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苏联不顾大多数朝鲜人民的主张，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完全支持莫斯科协定的朝鲜政党和社会组织才能参加该委员会的讨论，这个协定要为朝鲜提供一个临时政府。这一战略意在排除大多数朝鲜人民，特别是曾反对托管的民主力量。如果这一战略取得成功，将使那些不反对托管的少数共产主义者处于统治地位。

纵然美国起先同意莫斯科协定中的托管条款，它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朝鲜人民有权在该协定中（它只对朝鲜和她的人民产生影响）表示他们自己的看法，接受苏联的立场是同民主程序和原则相违背的。然而苏联不愿考虑除了保证朝鲜南部共产主义化以外的统一朝鲜的任何办法。由于苏联这种意在使朝鲜南部人民共产主义化，而不管他们喜欢与否的顽固战略，甚至在有关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的联合报告这一问题上也未取得一致意见。由于美国确信在联合委员会这一水平上举行的谈判不能达到建立民主独立的朝鲜政府这一目标，于是就提出签署协定的四个国家（美、英、中、苏）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早日履行莫斯科协定的办法，但苏联拒绝了 this 建议，宣称这样一次会议不在莫斯科协定的条款范围之内。

由于美国意识到根据莫斯科协定同苏联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都将是徒劳无益的，并且因为朝鲜人民要求独立这一正义和急迫的要求再也不能由于两个大国未能达成协议而拖延下去了，美国就在1947年9月17日将有关朝鲜独立的所有问题提交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同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朝鲜取得独立的程序，其主要条款如下：

1. 必须邀请朝鲜人民选出的代表参加建立政府的讨论。为了鼓励他们的参加和保证朝鲜人民的代表实际上由朝鲜人民适当地选出，而不是简单地由驻在朝鲜的外国军事当局任命，由九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必须派往朝鲜，并具有在全朝鲜进行监督和协商的权威。

2. 为了选出该委员会与之就朝鲜人民早日取得自由和独立进行协商的代表，和为了通过设立国民代表大会来建立朝鲜政府，将于1948年3月31日之前在朝鲜举行选举。

3. 在举行选举和建立政府以后，将尽早召开国民大会，这一切将向委员会报告。

4. 在政府建立起来以后，该政府将通过与委员会的磋商组织它自己的国防军；解散不在此范围内的所有军事和半军事组织；从南北朝鲜的军事指挥员和非军事当局手中接管政府的各种职能；以及与占领国进行磋商，以使他们尽早地，如有可能，在90天之内撤走占领当局的军队。

5. 根据形势的变化，该委员会可以同少数派委员会进行磋商。

6. 有关的会员国必须为完成委员会的职责而提供一切必要的合作与方便。

联合国为实现这些建议尽了一切努力，大多数建议都得到了实现。

不管怎样，在建立统一政府的企图遭到拒绝时，委员会按照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建立了通向被苏联占领的北朝鲜的通道。然而，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不可能为建立一个全朝鲜的政府而在南北朝鲜举行普选；联合国大会仍决定只在南朝鲜举行选举。根据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2



月26日通过的决议，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决定为监督在全朝鲜进行的选举作准备，在这一点不可能做到的情况下，为监督在对委员会开放的那一部分朝鲜进行的选举作准备。

于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建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选举不得不只在朝鲜南部举行，1948年12月12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承认大韩民国是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的决议写道，“一个合法政府（大韩民国）建立起来了，它在临时委员会能够进行监督和磋商的地区之内实施有效的控制和司法权，该政府被宣布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此，包括美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承认大韩民国是合法政府。为了竭力摧毁大韩民国，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北韩傀儡政权在1950年6月25日清晨对大韩民国发动了全面的军事侵略，为了企图用军事力量非法地将整个朝鲜半岛共产主义化而挑起了血腥的内战。

对大韩民国发动的这次进攻被诬蔑为是联合国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共产党军队停止挑战并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大会强烈要求它的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供一切援助，不要向北韩傀儡政权提供任何援助。所有可得到的证据都证明，北韩傀儡政权的侵略是经过长期的计划和组织，精心和秘密地准备的。很显然，为企图将南朝鲜共产主义化而发动了侵略的北韩傀儡政权是不会遵守联合国决议的。于是，按照联合国决议，包括美国在内的16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军队加入了韩战，以对抗北韩侵略军。

为了有效地利用向大韩民国提供的各种援助以打败共产党军队和统一在韩国进行的防御战，同年7月7日安理会以7票对0票，3票弃权，1票缺席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提供

军队和其他援助的国家服从美国的统一指挥。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成员国立即表示赞成，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美国和其他15个联合国成员国派出军队服从统一指挥，5个国家派出了医疗队，其他许多国家提供了其他援助。

于是，在一个国际和平组织的旗帜之下，为了打败非法的侵略军而展开了联合军事行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就统一国家而言，接着进行的战争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生命的巨大损失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如果当时不建立一条联合防线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发动的侵略，我们确信，共产主义扩张势力将会对另一个热爱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发动侵略，甚至会更肆无忌惮地扰乱世界和平。联合国成员的奉献是坚定和勇敢的，为了保卫这个国家和对抗共产主义的侵略，他们向韩国提供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那些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而同北韩和红色中国的侵略军作战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将永远不会被忘记。那些在“血岭”(Ridge of Blood)上，在“铁三角”，在临津江战役中流血的人们是我们民族的恩人。他们在韩战中战斗并不是为了要钱或者要土地，或者统治我们的人民(如同在以前可能会发生的那样)，他们为和平与自由而参加了战争。

参加韩国战争的联合国成员维护了韩国的独立，并改善了它的国际地位，这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最近对日关系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联合国和美国可能对远东采取的新政策。

### **新日美安全条约和韩国的外交地位**

谈到有关韩、美、日关系的美国的远东政策，我们可将它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1年9月8日旧金山条约缔结之前，从那以后是第二阶段。然而，在这两个阶段中，美国垄断了这一地区的一切活动，即整个远东实际上就是一个“门罗主义”地区。不过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日本在远东政策中的政治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后来以韩战的爆发为转折点，日本作为一个军事供应基地的重要性被突然认识到了。考虑到不首先签订和约而将日本用作一个军事基地可能引起的种种麻烦，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和约。同时，美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防御条约。于是就使日本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正常化了，而且，虽然是被动地，日本被允许加入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反共军事力量一方。因此，这个协定对韩、美、日三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使日本的国际地位合法化了，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合法化，并使这个国家在远东地区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此外，韩战对日本恢复经济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起点。

在历史上，日本经济的改善都需要朝鲜作出牺牲，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战后的恢复仍然需要这种牺牲。日本作为一个以韩国为前哨的军事基地，通过在战事扩大时期扩张它的军事工业，利用韩国发展了它自己。

美国的远东政策是它的世界政策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美国世界政策中的经济形势需要它的盟国积极参与它的世界经济政策，欧洲的德国和远东的日本摆脱了以往的被动状态，被允许参与增强自由世界集团的力量。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接纳德国加入北约和签订新的日美防御条约。

尽管从形式上看，1960年1月19日签订的第二次日美防御条约是1951年签订的第一次条约的修订版，但它是一项从新的角度签订的完全不同的条约。所以，让我们对这两个条约进行比较：

第一个条约包括前言和5个条款，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2)允许美国在日本驻军，(3)承认驻日美军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相反，第二次条约是因为允诺积极的军事合作而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建立了典型的军事同盟体系，提出了远东防御措施和经济合作，而不是保卫日本本身。与前一个条约不同，它的内容不是局限于单方面允许美国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基地。而且内容也扩充到一篇前言和10个条款。

而且，条约的有效期（限于10年）和其他传统的军事同盟条约不同，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这个条约不是局限于军事方面，而是通过美国和日本共同努力，在远东建立强有力的新秩序，从而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达到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条约与第一次条约是截然不同的。

它的重要条款是这样解释的：首先，第三条规定，“缔约国将单独地或通过相互合作，依靠不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来保持和发展它们抵御武装侵略的能力……”其中“不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这一提法，显然是从美国参议员范登伯格在1948年6月参议院商讨美国加入北约时提出的“不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原则”摘录下来的。因此，这一原则通常被称为“范登伯格原则”或“范登伯格决议”。这一原则原来的用意是劝说那些对在和平时期缔结同盟怀有疑虑的国会议员，但此后被美国用作缔结同盟的普遍原则。

根据这项条款，日本承诺为保持和发展它的军事能力和加强两国的军事体系作出努力。军事力量的保持和发展当然带来了军事工业的发展，从而使日本经济军事化。甚至就拿最近日本经济的发展来看，它一直侧重资本产品的生产而忽略消费品的生产，生产资本产品的工业的指数大约三倍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指数，于是日本不得不在军事领域为它庞大的生产寻找出路，除非发现新的国外市场。这一事实，必须引起我们国家的关注，它自己甚至连一颗子弹都不能生产(原文如此)，并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

其次，第三条的最后一项写道，“缔约国必须努力消除国际经济政策中相互间的矛盾，必须加速相互间的经济合作。”

现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为争夺商品和资本的出口市场而展开竞争。最近在日本箱根举行的美日会谈，以及关于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生动集中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事实。市场问题是破坏自由世界作为一股反共力量而联合行动和团结的一个最严重的因素。

那么，美日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据箱根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声称，日本政府要求向美国和其他地区增加出口，以实现日本现政府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保守派就能长期掌握政府权力，或至少能在条约有效期内掌握政权。为了支持这一主张，日本指出，国内舆论呼吁开展同共产主义集团的贸易，特别是同日本主要的传统贸易对象之一中国开展贸易。这样，美国不得不尽量取代中国而向日本提供市场。

谈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及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起草的“远东报告”。这位参议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是

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尤其是剩余农产品的最大市场。他认为，如果美国不为日本打开邻国和东南亚的市场，自由制度，即把美国视为友好国家的政治制度，将难以维持，因为尽管日本对美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美国不能撤除对日本的关税壁垒。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一个同美国结盟并允许美国在日本保持基地的政权，他坚持认为，维持日本现时的繁荣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为日本打开其商品对亚洲邻国的销路。

他还认为，日本同它东南亚邻国的商业往来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不仅是由于日本商品必须同美国和德国在这些地区的商品竞争，而且还由于这些国家倡导排外的民族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是与过去的政策不同的，这是因为他们有反日情绪，还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独立。针对日本在11月初箱根会谈中提出的扩展贸易的要求，美国说它也需要象日本一样扩展贸易，以在自由集团内维持美元的价值，并维持美国向其他自由国家提供援助的能力。由此可以判断，美国似乎已经拒绝解除对日本商品进入美国的限制。因此，箱根会谈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双方显然期待着今后的相互合作。

而且，美国对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态度可能变为通过日本而提供援助。也就是说，美国对外总收支是稳定的，但每年有30或40亿美元的逆差，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向自由国家提供的援助。就象美国所坚持的那样，美元（自由集团内事实上的本位货币）的可能贬值决不是一个仅同美国有关的问题。所以，在美国财政部长狄龙访问德国以后，德国上调了马克的汇率，并允诺向不发达的自由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也向远东的日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如同第2次防御条约的第2条所规定的，两国相互经济合作的意义就在于此。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从我们自己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革命以后的这个时代里，积极地完成作为恢复真正民主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发展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至关重要。然而，谁都知道完成这个经济发展计划需要大量的外汇，这个计划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任务之一。当然，美国、西德、意大利甚至日本的投资对于完成这个经济发展计划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对通过同日本的经济合作和接受日本投资来打开重建经济之路应持什么态度。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可能性，即所谓的对日经济合作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日本侵略。

所以，日本必须严格遵守互利原则，尊重韩国的国家主权，以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并且必须首先在法律上解决过去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新瓶只能装新酒。”所以，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领导人，必须对过去36年中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日本必须将对于它过去侵略行径的悔恨作道德上的反省和法律上的表述，我们才能同日本合作，这是我们民族的一致的情感。

此外，我们这个一直遭受外国侵略的国家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之一，是采取特别措施来防止以这种方式来引进外资，即局限于只是为外国商品委派代理商。实际上，我们需要来自任何地方的资金，包括美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需要这种资金和投资只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发展。这种资金必须用来改善这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决不能用于通过建立买办来出卖这个国家。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不管这种资金的数目多么庞大，如果它们以基本上有害于我国福利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将根本无益于我们国家。

我要强调的是，任何外国企图在“经济援助和引进外资”的动听的借口之下扩大在韩国的政治影响，都将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对我国独立和主权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重视并采取特别措施来控制外国资本和经济援助的引进，以防止在这种借口之下确立外国的政治影响。

### **韩国的统一、共产主义在远东的侵略和北韩傀儡政权**

将目光投向北方，我们可以看见企图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如前所述，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并非始于一两年之前。甚至在李朝的晚期，沙俄帝国就拼命向南扩张。当扩张的希望变得渺茫时，俄国毫不犹豫地利用法国和德国为这一目的服务。同法、德结成三方同盟之后，俄国得到了日本在中日战争以后从中国获得的辽东半岛。而且，以后俄国企图扩大它在满洲的力量，这是它想向南扩张领土的生动表现。沙俄帝国曾要求朝鲜政府允许它在龙岩浦修建一个要塞，作为它向远东进行侵略和获得在这一地区的工业治外法权的立足点。李朝末期，俄国还提出在38度或39度线以北划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俄国扩张主义政策的明证，它为进一步的侵略而寻求不冻港和立足点。

在李朝末期，当朝鲜由于同西方文明的接触而不得不打开大门之时，俄国没有放弃控制远东和一旦有机会就接管朝鲜半岛的企图。然而，朝鲜落在了日本的势力之下，俄国不得不将接管朝鲜半岛的企图推迟到将来某个时候。众所周知，他们寻求不冻港的政策在帝俄政权被推翻以后完全为苏维埃政权所继承。

如前所述，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仍然鼓吹原来沙俄



帝国所坚持的远东政策。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苏俄的扩张政策并不局限于远东，而且还包括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和中东。也不能忘记这一事实，即苏联拼命地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由于它的本性，苏联是不可能忽略雅尔塔会议所提供的机会的。

苏联的扩张，从帝俄统治的时代起就遭到了阻碍，因为一股新的力量——日本出现了，它夺取并保住了北满、华北和朝鲜半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不言自明的是，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抓住机会以最小的牺牲获取最大的成果，是为了进入由于预期日军要撤退而造成的“新真空地带”。所以，日本一投降，行动迅速的苏联立即控制了满洲并在北韩驻军，于是，俄国梦寐以求的向南扩张就要实现了。

尽管苏联承认，三八线仅仅是作为军事分界线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在日本投降以后便于驻朝鲜日军的投降，它却故意利用三八军事分界线作为实现它几十年梦想的最好机会。然而，美国显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领会俄国的行为的政治含义；朝鲜的地理环境使它易受外国的侵略，大国为分裂的、遭到削弱的朝鲜半岛而展开的角逐，最后会变成引起战争的毒瘤。

美国可能只考虑到对日本的占领和战后处置，而没有考虑到对朝鲜半岛的占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将三八线看作是占领军的军事分界线，但它没有一个对整个朝鲜半岛实行持续的政治控制的精确计划。

有一种说法支持这一看法，美国预料可能会爆发韩战，就向它的士兵教授韩国语，但是这些部队被调往西欧去对付那

里的紧张局势了。在这一程度上，美国对韩国问题是不关心的，并对韩国未来的政治意义缺乏预见。当然，这是美国的错误。

另一方面，苏联却没有犯错误。俄国对每一件事都作了仔细的筹划以渗越三八军事分界线。苏联将出生于朝鲜的苏联共产党人派往北韩，企图使全体北韩人民归顺共产主义。苏联拆走了我们所有的工业设施，不断派入经过训练的共产党代理人，以根据共产主义计划来组织全体人民。苏联歪曲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使共产党历史的印刷品充斥这个国家，清除一切民族的因素——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并使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合理化。当苏联认可三八线的时候，不仅着眼于军事上的好处，而且还着眼于向南扩张和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最终目的。苏联在残酷无情地努力着。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以后苏联的扩张政策不只是在朝鲜半岛上取得了成功。苏联还有精力在由于日本在满洲的失败而造成的真空地带插一手。以后苏联还成功地将辽阔的中国大陆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于是远东共产主义大帝国就建立起来了，它包括南中国海、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北韩。共产党人对此并不满足，进而挑起了血腥的韩战，犯下了自相残杀的滔天罪行，企图以此无情地推翻大韩民国。他们厚颜无耻地空谈“热爱和平”、“爱国主义”等等，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的南韩“兄弟”展开了大屠杀。

我们的使命和民族的重任是，拯救大韩民国所象征的自由、和平和民主事业，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下，也要向着我们民族的使命前进。南韩被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所包围——北韩、

苏联的沿海省份西伯利亚、大陆中国等等。所以我们不可能单独地抵抗来自各方面的侵略威胁。只要这种威胁继续存在，我们就必须发展同美国的永久性联系来维护我们的自由和独立。只要这种威胁存在，我们就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同自由世界结盟。只有加强同他们的联系，我们才能保证韩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和最后的统一。

如果不以同自由世界的友好联系为前提来讨论统一问题，就是将国家出卖给苏联共产党。我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在获得光复以后，无辜的北韩人民渴望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但是共产党人剥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并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暴政。自从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以来，共产党人一直企图阻挠确保韩国人民独立和自由的韩国统一的实现。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韩国人会怀疑这一点。

由于共产党人的阻挠战术，美苏联合委员会未能就统一问题制订出一个方案。联合国恢复韩国统一委员会和其他几个特别委员会的存在没有任何效果。

但是我们不能把未能取得统一归咎于无辜的北韩人民。他们与此毫无关系。这完全是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当然我们的敌人在北韩，但不是北韩人民。而是国际共产主义政党，他们只是一小撮。

北韩共产党人一贯坚持这样的宣传方式，说“南朝鲜同美国结成了侵略性的同盟”，“美国必须从南朝鲜撤军”。从地理上说，美国撤军是不可想象的，多亏了他们我们才得以保持国家的完整，尽管在边界的另一边始终存在着苏联的威胁。如果北韩没有共产党分子，如果满洲和华北的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威胁已完全消除（他们加入了韩国战争，践踏了我们的自由

和独立,甚至现在还准备跨过鸭绿江,进入北韓的领土),那么撤走美国在南韓的军事基地也许就不会对维护大韓民国的自由和独立造成任何危险了。然而,只要对我们的军事包围继续存在,自由世界在南韓驻扎常备军是绝对必要的。为了保持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美国有必要在南韓保持军队以作为自由的后盾。这是保证我们国家独立和完整的唯一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增强国家的威望和外交地位呢?只有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自由和民主,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为了保持我们的自由和独立并为国家的统一作出贡献,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强大的军队。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在历史上,我们从未拥有象现在这样强大的军队。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南韓必须比北韓优越,这里的人民应该在自由和独立的国度里享受繁荣昌盛。现在政府正在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国家昌盛,对抗共产主义敌对势力的挑战。同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尽一切可能来消除正在北韓活动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不健康因素。我们甚至还准备同中立国联合起来以孤立北韓。

## 第四章 第二共和国的混乱

### ——党的分裂和“软弱内阁”

#### “四·一九”革命的流产——张政权的浮沉

“四·一九”学生革命并没有在韩国实现民主。韩国好不容易从日本帝国主义36年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并且被李承晚领导的自由党12年的独裁统治搞得筋疲力尽，现在又遇到了领土分裂带来的政治动荡。在接受了不幸遗产的韩国人民的道路上摆着无数的困难。民主党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未完成的四月革命谋取私利，暴露了完全没有领导我国人民的能力。

民主党的竞选口号“让我们变革，否则我们断难生存！”只是在选举中用来反对自由党的竞选伎俩罢了。可是，必须记住，这口号本身却成了大众化的时髦语言，强大的公众舆论显示了对它的支持。民主党作为执政的自由党的反对力量，是强有力的，这不是由于少数几个领导者或党员的努力，而是因为它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和意愿。难道议会民主不是人民通过政党来控制的吗？可是，民主党掌权才几个月，该党的政府就象自由党在四月前的日子里一样，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人民的不满高涨起来了。

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民主党和自由党在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确实，在腐败、

欺诈、软弱和无能方面，它们彼此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政治上，自由党和民主党是一对孪生子，唯一的区别是人们把后者作为一个名叫李承晚的老族长的私生子来对待。就特征和意识形态来说，它们彼此象得不能再象了。“是不是要进行变革？”这种缺乏信心的询问立即遭到自由党直截了当的挖苦：“变革不会有任何好处！”回想起来，这种反驳是多么切中要害，人们对此感到惊奇。

民主党的宗派主义和民主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依靠学生们的理想和宝贵鲜血而完成的四月革命遭到了流产的地步。四月革命期间学生的抱负反映了人民的抱负，重申了韩国历史本身的要求。建立起健全的民主、消除贫困以及建设一个福利社会的希望，被民主党人的“权力分配”、“权力斗争”和“鹤案丑闻”无耻地背叛了。

当“四·一九”学生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临近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对“四月危机”即将来临的传闻深感不安。对于执政党来说，危机意识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即卑鄙而自私地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权力。实际上民主党在构成上几乎是自由党树上的一根枝杈，它们的腐败程度不可能也没有什么两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政权的统治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腐败。尽管民主党在7月29日的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人民的巨大期望却逐渐被置诸脑后了。

人民由于对政治家或党的领导者能为人民做些什么怀着疑问，所以他们对党派政治变得令人吃惊地冷漠。再也没有任何政党可以让人民寄托他们的希望和信任。年轻的一代由此对现有的一代的希望彻底幻灭：“现有的一代已经腐朽了！”“打倒现有的一代！”——这是人民的呼声，是由青年学生表达

的民族呼声。

尽管这个国家的未来是黑暗的并受到即将来临的危机的威胁，韩国年轻的一代和学生中的希望之光正慢慢升起。因此我们把学生的呼声作为新一代的呼声来倾听，尽管这种呼声有时不免粗糙刺耳、激进，甚至出格，但是它们仍然代表了人民的思想。这呼声表达了对老一辈人的不信任，和要求领土统一的观点，但是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对民主党和它的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而且，这些呼声孕育着出现一种真正民主的新改革力量的希望。

民主党以玩世不恭的冷漠回答了人们的期望。持续的示威游行、罢工，民主党的分裂和其他许多争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观察家说，这些动乱代表了自檀君统治以来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自由”。但是这只不过揭露了将自由看作是一阵旋风。将它等同于不负责任、滥用权力和自由放纵，这是错误的。

在现代议会史上有两个丑恶的污渍相当突出：巴基斯坦议会副议长被一位议员谋杀；“四·一九”革命后暴徒袭击韩国国民议会，他们占领议会达21分钟。这是很不光彩的场面！同时，根据老政客迂腐的心理，自由意味着“自由地戴帽”——自由地去从事走私，自由地接受贿赂和自由地积聚不法之财。哪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民主党的旧派和新派在自由党统治时期已经腐败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只是为了报复未能从执政党那儿获得肥缺而加入了反对党。在反对党和执政的自由党之间实际上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两者都是尽其所能地腐化堕落。如果还有差别的话，那唯一可见的差别可能就是：反对党长期受阻的

欲望使得他们在采取违法乱纪行为时更加粗野和贪婪！

自前总统李承晚于1960年4月26日辞职开始，民主党人的政治生活就是一种弄虚作假的伎俩。由于人民激烈反对，3月15日通过被操纵的选举而获得了机会的民主党人没有能力通过合法手段来取得权力，他们试图与垂头丧气、名誉扫地的自由党人一起讨论国家事务，而自己则只是点头称是。

就在这时，民主党第一次播下了弄虚作假的种子，在7月29日的大选即将来临时，民主党人从不法商人那儿索取了令人吃惊的45亿圆（编者按：圆为南朝鲜旧币，1953年2月货币改革100元=1圆，1962年货币改革10圆=1元）。但就在同时，他们却宣称消除这种犯罪行为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政纲。这样，民主党人为了获得权力成功地筹集了巨额的选举资金，同时却成了那些要对过去的罪恶负责的不法商人的奴仆。

受贿、贪污、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自然就接踵而至。当官的不得不向访问汉城的地方选民提供金钱或职位。部长级或局长级的党的领导人被为了谋取好处和官职从各地蜂拥而来的。大批来访者，弄得焦头烂额。他们那里简直成了一个公共市场。大小好处在暗中安排着，各地民主党人的不负责任达到了顶峰。这样民主党施舍了两千多项“特殊”恩惠，但却仍然感到不能满足需要，最后发布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的政府机关都雇佣党内成员。这种情景是受宗派主义支配的腐败的李朝王朝的翻版。

派系分裂、滥用政治资金以及受裙带关系支配的人事管理，使民主党没落了。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受到内阁责任议会制的阻挠，第二共和国的进程表明了议会民主的失败，其原因在于，9个月的张勉内阁的混乱，张勉个人领导能力的



不足，议会的腐败和人民政治意识的不成熟。

民主党人在制订有追溯效力的特殊法律来惩罚违法商人时，以及在指控自由党领导人反对民主和违反法律，并据此而惩罚他们时，缺少固定的原则，并愚蠢地动摇不定。特别是在制订特殊法律时的议而不决的讨论推迟了对“旧的罪恶”所必须进行的彻底改革，这样便使人民对法治原则产生了怀疑。在革命时期运用旧的法律的企图遇到了年轻一代的强烈反对，这种运用旧法律的企图只不过显示了反动保守的倾向。

这样，四月学生革命被唯利是图的风气和职业的分配葬送了。它又退化成混乱。

青年军官的耐心达到了极限。军队在戒严法解除后，确实很快将权力交还给文官当局，军队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他们希望真正的民主最终将得到确立而无需军方的干预。可是，在四月危机的谣言声中，张勉政权和上、下议院一起被卷入了政治上狗咬狗的派系大混战之中。尽管收买了学生使他们不去游行，但是街上每天仍充塞着提出各种要求的人们。军队非常担心靠士兵的牺牲来保护的共和国会崩溃，共产党会随着一次次示威的浪潮乘虚而入。这个政府实际上成了示威暴徒的政府。

军队最后决定根据“靠示威建立将来的国家也会因示威而垮台”这一在4月以后的日子里广泛流传的说法举行了起义。我们军人开进汉城是为共和国而战，我们决心去保卫它的昌盛和自由。1961年5月16日拂晓，革命军队最后开始了他们的“外科手术”来铲除过去累积起来的罪恶。祖国需要“外科手术”——用政治上的万应灵药来治愈致命的癌症已经来不及了。

## **第二共和国——一个有病的胚胎**

短命的第二共和国是在所谓民主党新派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张勉内阁本身虚弱多病，它只不过延续了自由党的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光复后的15年历史无可辩解地说明了自由党的劣迹。

“历史重复着自己”，光复后的日子也是如此。各种党派、派别、集团和组织在“四·一九”革命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历史从不机械地重复自己，因为历史的创造者，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张勉政权统治下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得不到纠正的话，另一场韩国战争的民族悲剧就会重演。军事革命消除了这种可怕事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光复后一段时期内的那种混乱状态，在张勉民主党政府统治的那年间重现了。1945年光复后的一段时期内，韩国民主党(韩民党)和民主国民党(民国党)的成员一度支持过李承晚博士，后来又反对他，这两个党后来都成了民主党。在这期间，自由党也出现了。民主党的建立和成长得益于自由党12年的罪恶统治，自由党的建立是以地方贵族、政治掮客和旧的腐化分子为基础的。这些绰号叫“光复贵族”的腐化分子在政府权力的默许下敲诈勒索。可是，在政治理想方面，民主党与自由党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民主党只是一个半封建和腐败的政治集团。因此第二共和国从其受孕起就是一个有病的胚胎。

## **民主党的家谱和特征——韩国民主党的孪生后代：自由党和民主党**

康伦(Conlon)报告在分析自由党统治下韩国的形式时说

道：“由于反对党受到威胁和压制，韩国实行的是一个半的政党制，而不是两党制。”它把民主党形容为“矮小、残废和不能发展的党”。民主党偷偷地学会了卑鄙地利用唯利是图的势力，没有将自己变成一个健康的、现代的人民政党，它依然是一个不合格的党——一个低能的党。

追溯民主党的家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党是由一群新兴谄媚者组成的。这群谄媚者曾被李承晚的独裁政权驱逐出来，他们曾经是“韩国民主党”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民主党的一部分。

1952年5月25日的政治动乱可以被看作一场旨在巩固李承晚个人独裁统治的政变。从这以后，开始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全面冲突。最后自由党巩固了自己，而全部的反对力量即包括前自由党议员和民主党人的民主党终于崛起了。在1956年5月2日、15日的选举中，执政党和反对党间爆发了激烈的对抗。1960年3月15日这种对抗再次爆发。这些事件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在自由党庇护之下被操纵的选举。

韩民党在1948年5月10日选举期间扮演了主角，它支持李承晚博士建立大韩民国政府。由于屈服于李博士的压力，制宪会议修订了宪法，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选举他为韩国首任总统。可是与一般的预期相反，李博士任命尹谱善为总理并且把内阁职位在其他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进行分配。这就使李博士与韩民党之间出现裂痕。韩民党在1949年2月另行组织成为民主国民党，其他分裂出来的集团和派别增强了它的力量。该党被迫进行改组，因为它在光复后的美国军政府期间是公众猛烈批评的对象。

以后人们深深地感觉到美国军政府期间韩国民主党的影

响。那时大韩民国刚诞生，在光复后的日子里作为最大的保守集团韩国民主党与过去被流放的保守分子一起聚集在第二次大战前的韩国临时流亡政府周围，构成了韩国的政治领导力量。因此，该党的地位在美国军政府期间非常高，并且它在那个局势迅速变动时期在阻止共产党的渗透方面确实对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在其特征和政治哲学方面，韩国民主党只不过是一个保守派，缺少新兴民族所需要的新蓝图，因此没有为发展健全的民主打下基础。相反，它醉心于扮演旧时代的角色，他们是各道地主阶级的代表，并且为将要支配执政党的“旧的罪恶”播下了种子。而且，韩民党得到京畿道和全罗道的大地主、地方富豪和大商人的支持——所有这些人都是半封建和极端保守的“韩民党”的一些领导者一直是日本当局的政府官员，另一些人是接受殖民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是律师、银行家和商人，他们对民主革命的实质和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一无所知。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群迷恋于日本官僚主义方法的不合时宜的旧领导集团。他们毫不关心经济的自给或农业的重要。韩民党的保守分子忘却了民族的重任，不能抛弃他们的小集团本性，不能成功地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打好基础。

这种地主的、贵族的和保守的心理，通过民主国民党(民国党)由民主党继承下来了。如果按表面价值来看当时自由党的口号“农民和工人的党”，自由党的姿态就更象改革者，而民主党人却反而更为保守和不合时宜了。

韩民党的邪恶并不只是被民主党人所继承。当自由党人集团成了执政党时，落后的独裁政治的恶性循环再次出现，

事情就变得更明显了，自由党人也继承了韩民党时代的腐化和保守主义。当自由党人组成了所谓的“光复贵族”时，这些腐败和保守的习气就遗留给了他们。这些“光复贵族”因为在光复后争得了既得财产的收益而欢呼雀跃。（编者注：“既得财产”指“二战”后被美国军政府没收后转让给朝鲜政府的、以前为日本人所拥有的财产）李政权内产生了一大批非法暴发户。

因此，假商人和政府的联合力量形成了这种韩国式腐败的温床，这些人通过贿赂集中在既得财产周围。在美国军政府统治下的韩国民主党没有解决既得财产问题。韩民党不肯放弃寄生于农业经济的地主的地位。他们没有使农业资本现代化并使之转化为工业资本。他们不仅导致了地主阶级的贫困化，而且耽误了韩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李承晚政权下的土地改革没有完成现代化这一民族的使命。政府限制了以天然资本形式（土地）存在的地契的运用，并且按政治上的需要操纵了既得财产的出卖。其结局是分配的农田数量微不足道，而农民则趋于更加贫困化。

问题的症结在于民主党象它的前任一样，既没有蓝图，也没有建设能力使韩国现代化和建立一种健全的民主。作为反对党，民主党的斗争只是为了“得到乌纱帽”。他们也未能使韩民党同他们自己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集团。确实，民主党缺少植根于韩国现实的明确的政治哲学，更缺乏能力、计划以及能影响整个民主改革的政治思想。张政权无可争辩地显示出它的唯一兴趣在于对权力和特权的贪婪。

民主党没有克服它的小集团的特点。任何以个人贪婪为动机的集团在获得利益和权力之前必然要分裂，并且由于他们缺少崇高的抱负或理想，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7月29日大选后，民主党逐渐分裂，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新派和旧派根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之间的争斗就象在泥潭中扑打的杂种狗的丑态。

由政治掮客、从前日本当局的官员、脱离了自由党的不满分子、流氓和失业者组成的有小集团倾向的民主党不可能提出任何固定的原则。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腐败集团。更糟的是，党的领导者赵炳玉博士和张勉先生发生了正面冲突，新派和旧派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后者代表了半封建的、财力雄厚的地方居民和韩民党内系统的两班分子，而前者则代表了新兴的商人、实业家、北韩难民和庆尚地区的普通公民。

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党内重新出现了李朝时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限，同时，属于“平民”的新派也按年龄的“长”“幼”而分裂。这种分裂由于部长的任命而变得明显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即要把这批四分五裂的人凑合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再强调一下，民主党的形成和崩溃要归因于它内在的因素：非现代的小集团特征，固定原则的缺乏，无能和腐败的盛行。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对韩国议会民主制的失败进行检讨的必要性。

### **党的分裂与职位的争夺**

在4月19日和26日李承晚政权崩溃，学生和青年在四月革命中流血的时候，“伟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正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个党未在第一线出现？这样一个不敢支持学生或要求李承晚下台的怯懦的党如何能为第二共和国的发展打下坚固的基础呢？

4月25日，一群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勇敢地面对警察的枪口，举行了反对李承晚政权的示威。但是，甚至在这一榜样面前，立法机关中的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也缺乏勇气加入斗争。

同样是这批胆小、怯懦的民主党人在看守政府(编者按：即许政“看守内阁”)时期生存下来以后，于7月29日的大选即将开始之际展开了血腥的派系斗争。斗争是围绕着提名而进行的。在3月15日总统选举前已明确分裂的党现在提出了属于不同派别的候选人，而那些未获提名的人仍然被各方推为“无党派人士”。

由于涉及职位分配——总统、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人选——的争执，新派和旧派最后分裂。为了获取在总理提名期间收买无党派人士选票的政治资金，两派不顾一切地寻求金钱。后来，每一方都以“揭露”非法政治资金的收入来攻击对方。

进入8月份后，总统和总理的提名即将来临。议员们强烈要求调查一种传闻，即新派通过非法手段强行获取了大约20几亿圆的大笔贷款，分发了1000万圆给每位立法议员作为贿赂，另外有谣传说，旧派唯恐被击败，从以前的自由党人那里寻求资金。双方相互争斗，受害最深的是人民。旧派和新派之间不是在意识形态上争斗，而是在进行一场“榨取金钱的竞赛”，胜利要看哪一方从非法牟取暴利者或商人那里取得更多的金钱而定。企业家由于对双方都持反对态度而陷入了绝望，生产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各种情况下完全停止。

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清除非法投机商。民主党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一方面，他们自己要钱，而另一方面，他们指望刑事诉讼将会减少。这个党最后由于它

所吞下的钱而梗死，当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民主党的分裂。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政治观点上的不同。金钱和权力之争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新、旧派头头之间确实在某种程度中具有不同的色彩，但他们既不明确地分裂也不联合，他们缺乏最后分裂的正当理由。

在李政权的派系斗争中，关于怎样“哀悼死者”这样一个小小的争论，最后竟使Song Si—Yo(译者按：此人原名未查出)掉了脑袋。民主党分裂的理由同样是琐碎和微不足道的。如果分裂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由于权力的分配和成为执政党内的主流派的野心。事实上由于长期的克制，两派都失去了耐心，两派都认为政治权力是可开采的蕴藏丰富的金矿。

派系斗争一直持续到年底，而对国家急待解决的事情却漠不关心——如：失业者不断增加、冬季财政预算的准备、以及共产党的颠覆活动。

党内真正的领导人的缺乏应归咎于长期的派系斗争。申翼熙和赵炳玉博士死后，民主党产生了优柔寡断的张勉领导的新政权。可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领导，民主党象一盘散沙。新派依然作为民主党而存在，旧派则组成了新民党。(编者按：在南朝鲜“国会”中曾使用“民主党旧派同志会”的名称，1961年1月改称新民党)。

人民对由于分裂而衰弱的民主党失去了信心。民主党丑恶的形象表现为：(1)内部不和，派别之间相互揭露对方的不正当行为，使民主党失信于民；(2)由于未能在议会中控制多数；最后用贿赂和官职来安抚对手；(3)由于政治资金的庞大开支而被迫成为非法牟取暴利者的傀儡；(4)不得不以任人唯亲和贿赂来维持自己；(5)为左翼“改良主义”党派的出现开辟



了道路。宗派主义是张勉政权极其虚弱的内阁的先天性疾病。

### “虚弱内阁”与职位的分配

为了庆祝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许多事件被安排在10月。但是第二共和国自诞生的那一时刻起就不是一个受到祝福的既幸福又健康的孩子。准确地说，它是以张政权的“虚弱内阁”的形成为开端的。第二共和国的议会内阁制受到了扰乱。混乱是围绕着因总理的提名所引起的对立而产生的。两派疯狂地争着拉选票。虽然在8月19日约翰·M·张博士(按：即张勉)以两票之差击败了金度演，但是，在韩国内阁制的道路上却充满了不稳定和不安定的因素。

张勉博士接到了旧派提出的要分享5个内阁职位的要求，但是由于旧派想以一个独立的实体参加谈判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张的回答是建立一个完全由新派组成的内阁。这样做几乎是无法持久的，因此在那一年的9月7日提供了一个接纳4名旧派成员进入内阁的机会。几乎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内阁组成15天后，一半以上的部长被撤换，负责国家内部安全的内务部长被随意地任命和撤职。通过分配内阁席位而带来政治稳定这一自欺欺人的梦想被粉碎了。在议会内，相互间的责骂和实际上的争斗是每天的议事日程。不久，张政权就给人一种印象，它是“职位分配机关”或“职位撤换机关”。内阁的虚弱和无能未能打开通向负责任的政治的道路。由于其一开始就腐败而且缺乏主心骨，内阁怎么能够负责任呢？

议员们自己不在议会大厅露面，那里每天都出现骚乱情景，他们的唯一兴趣集中在弄到政府的汽车，增加开支和特

殊津贴以及特权，特别是设法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新近成立的两院立法机构(编者按：指南朝鲜的民议院和参议院)只是在我们这贫穷的国家里增加了吃政治饭的工作。既无知又无情的议员们专横得不可想象，立法机构以“流氓议会”而闻名。国会由于经常不到法定人数而常常休会。然而一旦达到法定人数，主宰着这个国会的就不可避免地是大吵大闹。

因而，在“流氓议会”和“虚弱内阁”大声演奏“暴民二重奏”的同时，缺乏食物的农民增加了，失业的毕业学生、出租车司机、老兵和其他一切不满的人群的游行队伍阻塞交通，物价飞涨，一句话，普通人民的生计逐渐被扼杀了。

此时最活跃的是走私。由外国援助支撑着的产业崩溃了。由产业协调援助基金(ICA)建立的中小企业几乎有80%关了门。由于购买力下降，资本缺乏，以及原料短缺，国内工业的大危机正日益严重。

1961年2月“钨案”丑闻的爆发震动了全国。民主党高级官员因插手东京一公司与韩国钨公司间的4千吨的委托购销合同而接受了3百万美元的贿赂这一消息披露后，民主党内上下的怨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虽然后来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查，但韩国钨公司的经理除了施加政治压力外，还给了国会调查组成员每人2百万到3百万圆的贿赂。这桩可耻交易的贿赂总数最后达到令人吃惊的45亿圆。

任人唯亲事件的总数超过了2千3百起。政府人员的任命通常是以独断的方式进行的。李承晚和自由党政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垮台的。现在民主党当局正在步他们的后尘。用人取决于种族、家庭以及其它个人关系，这些都是民主党人享有的权利。例如某个民主党议员所施加的压力使某个私人企

业至少被迫雇用了200人。非法提升成了老规矩。就“后台”(支持或偏袒)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民主党超过了臭名昭著的自由党,每个民主党议员都被授予推荐两名官员的权力。而且他们还发放所谓“热心成员”证明,那就意味着毫无疑问会受到聘用。

人们无情地运用权力来谋取好处和个人利益。前汉城市长试图通过批准城市屠宰场开业而榨取一千万圆。一些部长和副部长甚至发放经营烟草商店的执照,不用说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报酬。换句话说,民主党人放肆地从政权的额外价值中享受好处,张勉政权的9个月统治是一个“大家能捞就捞”的狂欢聚会。

### **社会动乱达到了顶峰**

张政权的软弱、无能、腐败和违法乱纪导致了全国各城市的示威。示威游行从清晨开始,整个白天连续进行,到晚上变成火炬游行。在大城市,游行队伍抬着“民主的棺材”去举行葬礼。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贫困引起了学生和青年的抱怨。各个“左的”“改良主义”党派利用民主党的无能而迅速发展起来,把已经混乱的局面弄得更糟。失业的增加,农村食物的缺乏,物价的上涨,被贫困所折磨的受压迫人民的悲叹,使得已经受到所谓的改良分子煽动的人民中间产生了绝望情绪。

学生们抛开书本,热衷于有关中立主义理论的政治讨论。罢课爆发了。校长、教师和学校面临着学生们雨点般的谴责。学校开了门,但由于不上课又关上了。由于对民主党政权的失败深感失望,持怀疑态度的学生们再也坐不住了,朦胧地希望领土的统一。除此之外,认为中立化是韩国当时局势的

出路。这种危险的信条在侵袭着学校。天真是一种符合青年学生胃口的乐观主义。北韓的傀儡此时正不失时机地在统一国家的问题上鼓动学生。在这种大动乱中，校园立即笼罩在浓重的紧张气氛之中。

我个人并不认为学生想要在共产主义下统一国家，或他们是亲共分子。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但他们出于单纯的感情而赞同错误的目标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们是未来韩国的领导者。但是局势仍然很危险：情况变化得如此之糟，以致有人提议南北韩学生在板门店举行一次集会。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以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的战士，这种危险的言论，使我大吃一惊。士兵们与学生结成联合阵线来重建祖国，以及在这个国家里为真正的民主打下基础的决心依然未变。但应该记住，这种存在于民主党统治下的恶梦般的社会动乱可能会毁掉这个民族。

迅速壮大的“左倾”“改良主义”政党具有同样的危险性。我们不能忘记：在分界线以北有侵略性的共产党军队存在，这种极端危险的局势不允许在韩国存在极端自由派的或左翼改良主义的政党。我们当然知道，在自由世界中有所畏惧的反共社会党人存在：英国的工党、西德的社会党以及日本的民社党。但那些4月后自称是改革者的政治组织是如此激进和反复无常，以致无法区分谁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谁是亲共分子。

特别是在韩国这个经受了南北战争这一惨痛悲剧的国家里，改良主义政党应该支持国家的政策并明确表明他们的反共立场。在人民眼里，他们看上去都是亲共的。这些组织使用的政治斗争手段包括游行示威和集会，支持南北韩互换学

生和记者。他们当然贴有反共的标签，但他们缺少民主原则和民族良心。他们是徒劳无益的但却具有潜在危险的小集团组织。

改良主义政党的同情者包括那些被怀疑是共产党的人、意识形态不纯分子、盲目追随者、游手好闲者、政治掮客、没有完整人格的人以及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的年轻学生。有良好的辨别能力、健全的意识 and 健康的民族精神的人没有参与这一运动。

同英国的情况一样，这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改良主义政党主要关心国内的各项改革，而对外政策事务则通常留给保守党，这是改良主义者——保守党人的两党制政治的基本常识。在7月29日的大选中，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提出中立化的观点来迷惑人民，但实际上他们的不纯动机引起了怀疑。改良主义政党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来发展自己，在韩国这样一个直接面对着共产主义的国家就更是如此。

实际上，改良主义的力量成了亲共分子的寄生之处。有一种想法一直使我很害怕：如果不制止他们的活动的话，他们可能已经把共和国和人民出卖给共产党了。单纯的学生和未成熟的人们将会被利用作为工具。

和共产党妥协便是失败的开始。应该记住，在社会处于象张勉政权统治之下那样的混乱状态时来提倡国土的统一，就是走上了民族自杀的道路。学生所高声提倡的在中立主义下统一祖国的理论给共产党分子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提供了机会。我们必须为捍卫我们现在享有自己的民主与自由而奋斗到底。

我们并不是断然反对南北统一。相反统一是我们民族最

崇高的任务，是我们所创造的历史赋予我们严峻的重任。但是如果统一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奴役，我们就必须誓死地反对。当在苏联牵着的皮带的另一头跳舞的金日成集团垮台时，当北方人民行使民主的能力成熟时，当通过经济的自足使整个民族的力量发挥出来时，统一在民主制度下的日子就会到来。在那最后的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不能让任何左翼或亲共集团的甜言蜜语来蒙骗自己。

### 领导力量的缺乏

张勉政权的弊政和它软弱的内阁是由于领导力量的缺乏。看到一个成功的军事革命使张政府倒台，人们断定韩国的民主失败了。但是确实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失败应归因于领导力量的缺乏，而不应归因于民主的失败。

要使民主在不发达国家取得成功，外部形式的所谓“直接引进”常常是不够的，它要求有本地严肃认真和改良主义的精英的领导。把西方的传统民主应用于受东方的独裁与封建主义历史传统所支配的韩国社会是不明智的。认为民主自由不需要领导者等于说旋转的陀螺没有支点，因此要完成韩国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革命首先需要在人们的精神上来个革命。请允许我强调一下：人的革命必须通过对领导者进行有效的培养来完成。

由于前面所提到的许多事情，如派系斗争和所谓的“鹤案”丑闻的困扰，张政权未能形成一股领导力量。在缺乏领导的无能状态中，虚度了9个月。此外在4月19日革命后它既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或许甚至没有这样的愿望来反映人民的渴望。在政策方面，张勉以犹豫不决特别为国人所知。他

缺少固定的原则。实际上他甚至从未作为一个新的国家领导人向人民有力而坦率地表达过他的信念。

一家外国报纸记者评论说，张政权是如此地易于向示威学生的要求屈服，以至于张在管理国家方面几乎完全依靠学生。简言之，他不能制定或贯彻确定的政策。这完全应该归咎于民主党领导人的无知和优柔寡断。

其次，民主党人迷恋于以言词来治理国家的观点，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张政权甚至没有完成军事革命政府在头三个月内完成的事情的十分之一。事实上，张政权没有做成任何事情。与此相比较，可以以3个电气公司的合并为例，革命政府很快就完成了这件事。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

第三，民主党未能作为人民的政党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形成健康的关系，它把那种关系蜕变成了涉及候选人、投票人和金钱的商品交易。因此党的领导人成了选票的乞讨者，而选民作为施舍者要求以金钱和好处作为回报。从这种关系出发，健康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形成的。这就解释了张勉博士政府成员为什么一直被从各道来的求职者和牟利者所困扰，他们从来没有能打破这种围困。

张博士和他的官员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勇气，所以他们不能解决党的分裂问题、学生和其他的不计其数的示威问题或其它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既缺少政策又缺乏执行政策的勇气，怎么能够形成领导力量呢？领导者应当站在危机时刻的前面，通过果断对付现存问题来求得生存。这样也才能获得崇高的威望。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这种精神。至于张博士，他被游行队伍乖乖地从马山赶回汉城。所以他怎么能称得上是

国家的领袖呢？

张政权既没有新的政治观点，也没有激烈反共的记录，因此他们未能为自己确立韩国民主领导者的地位。紧接着4月革命，民主党人应该发起全国范围的新生活运动，他们应该清除腐败和旧的罪恶。然而事情却正相反，该党脱离了人民，它在攫取权力的那一刻就孤立起来了。有些民主党人本身就是以前腐败的统治阶级——陶醉于清闲和纵情享受不义之财的旧时代的残余的一部分。他们由于被乞求和收买选票这些低级的政治活动蒙住了眼睛而变得十分愚蠢和麻木，根本不懂启发人民和开展全国性的重建社会运动的迫切性——这是政治的最高职责。

民主党人几乎没有感觉到六十年代席卷不发达国家的革命风暴。他们由于太无知而未能观察到旋风般地横扫亚非大陆的运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发达国家出现革命骚动的时代，是不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始参与竞争的时代。现在，民主党人不顾前面提到的历史与民族的重任而实施的充满派系斗争的恶梦般的政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丝毫不令人惋惜。民主党政权垮台了，因为他从来不想引导人民或成为人民的领导力量来完成不发达国家所必需的革命和社会的改革。

### 张勉政权的垮台

简而言之，短命的第二共和国是一个社会大混乱的时期。它是由种种罪恶所引起的。这些罪恶使人想起自由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以及竟敢显示亲共色彩的意识形态骚乱。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力、职位和财富的不正当欲望以及人民“接下来会怎样呢？”的怀疑态度没有得到纠正。相反，不负责任的陋习



和拜金主义主宰着国家。

除了内部的痼疾之外，第二共和国还由于其虚弱的机体和同样虚弱的内阁而受到外部疾病的传染。其一是亲共和反国家的机会主义，其二是日益增加的政党以及腐败和不负责的所谓报纸，其三是盲目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接受它的最糟糕最庸俗的表现形式。

张政权下的“日本热”麻痹了人民的理智：汉城和釜山这些重要大城市的茶馆，随着廉价的日本音乐而颤动，韩国音乐受到排斥，一百多所教日语的院校迅速出现，色情的日本杂志和文学大量涌入韩国。我们的市场充斥着通过走私进来的以次充好的日本商品。张政权很快面临着被指控为亲日内阁。严肃正直的人们对张政权统治下具有反民族倾向的“日本风”表示不满。

受尽了感染和腐化折磨的第二共和国已经病入膏肓，它需要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以作为孤注一掷的措施。1961年初开始流传有关“迫在眉睫”的谣言。危机意识是政府本身害怕它的弊政已经到了末日而引起的。曾被大肆宣扬的“国家建设队伍”只是起了宣传作用而没有干任何实事。不合理地提高税率只是使得人民对政权更加不信任，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有关危机的谣言就是对一些不得不发生的事情的预言。因而，作为执政党，民主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同时也失去了对它自己处理国家事务能力的信心。军队被迫起来对付危机，并且把眼光重新集中到国家的正确道路上来。

在1960年4月的学生革命之后，明智的年轻军官，希望建立起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希望民主会在韩国真正地重新建

立起来。事实与此正好相反，当张政权毫无目标地东奔西窜时，混乱的政治局势变得更糟了。

我们无法容忍民主党将自由党的腐败延续下去。对民主的外表进行必要的修正要比将已经崩溃的民主框架统统拆毁更为可取。“我不是到这里来呼唤正义，而是呼唤有罪的人来忏悔”，基督对法利赛人这样说。

军事革命并没有毁掉韩国的民主。相反它是拯救民主的一条途径，它是一次目的在于切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恶性肿瘤的外科手术。革命是以仁慈的外科医生的怜悯来进行的。外科医生有时必须为了保全生命和恢复健康而给病人带来痛苦。一旦病人康复，医生就建议他回家疗养，正是这个原因，革命军队才坚决保证要将统治权交还给文官政府。

爱国主义和民族的自我觉醒深深地扎根于那些冒着职业上的和生命的危险来拯救韩国的革命军人心中。战士是祖国的卫士、人民的儿子。当我们的目光看到共产党敌人，然后再转向首都时，我们感到惊骇。换句话说，军队对那些掌权的政客们采取了行动，这些政客甚至在四月革命后国家事务陷入混乱时，仍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在立法机关内的争斗更重要了。我们必须荡涤不光彩的过去，为我们祖国的未来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

## 第五章 被耽误了的民主和韩国 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 一个现代民主落后国家的危机

过去，我们对民主这个问题非常热衷，但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东西。说实话，我们从来既未曾体验过真正的民主，也从来未曾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而现存这一切，都是向别人借来的，换言之，是一些舶来的不适合韩国国情的民主制的复制品。

当然，自光复十多年来，人们为在韩国建立民主体制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缺乏吸收外国民主思想所需要的内在条件。西方诸国今日民主政制的建立，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才得以完成的。

我们的内在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足以承受民主政制。因为，我们的君臣观念决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为某种民主思想所改变，尤其对于西欧议会制政府这种政体形式，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希望象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一下子就成功地把西方传统民主制度照搬过来，这样的要求显然是操之过急了。因为韩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经济条件同西欧是完全不同的。

妨碍在我国实施西欧式的民主体制的原因是：在我们的

农村存在着大量文盲，那里经济落后，传统文化势力很强。在城市，存在着大量失业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从整体来看仍然很低。

即便是在议会制政府的诞生地——英国，它的代议制政府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一起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看，英国的(议会)制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这场工业革命，是以詹姆士·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开端。然而，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中的代议制政府，仅仅是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欧的民主制，即仅仅在其法律的规定方面，而没有获得西欧民主制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全面工业化。所以，这类落后国家的政治党派通常都表现得极为腐败、堕落、胡作非为。这种状况将持续到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党派的诞生。

在这样的国家中，民主和代议制政府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政府中根深蒂固的腐败行为在变了形的民主招牌下畅行无阻；政客们的徇私枉法在议会政府中比比皆是。在自由选举的假面具后面，购买选票成了习以为常的方式，在代议制政府的幌子下面，政府中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的行为愈演愈烈。

虽说我们借来了西欧代议制政府的“外套”，但这件外套并不适合我们穿着。这种生搬硬套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其中包括腐化和枉法。而自上而下的整个组织的政治腐败和枉法已渐渐地侵蚀了我们全部生活，甚至连那些正直的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利，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并追逐起他们的私利。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另行建立起能够激发人们勤奋和诚实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发展人们的正义感，使人们在思想的高度上团结起来？如果那时我们有一个新的权威力量的中心，它足以能够摧毁我

们社会中存在的这个整体组织的政治腐败。那么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在一个新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唯一能够消除腐败现象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能够抵御共产主义渗透入侵的，只能是军人政权。(见“康伦报告”)

在象韩国这样的民主落后的国家中草率匆忙地套用西欧文明，已经导致了社会传统结构的崩溃。此外生搬硬套不仅导致了建立一个持久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失败，而且导致了为适合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进行的重建事业的失败。由于社会重建没有完成，而传统结构瓦解太快，韩国人民只能生活在重重的忧虑和危险中。我们无法奢望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以模仿外国的民主和代议制政府的形式来获得政治上的成熟和经济上的重建，并以此抵御共产主义。这是由于农村地区的大量文盲、极端贫困以及不断升高的失业率、经济的崩溃、社会的不满和恐惧情绪，这一切使我们的奢望无法实现。

过去，政府和人民在发展他们自力更生的民族经济时，都未能很好尽心尽力。此外，政府也未能在人民的思想中很好地灌输积极的爱国主义思想。政府未能带领人民去克尽职守，反之，人民也失去了其民族精神，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花大气力去想出一些办法，以解决现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能堕落为一个毫无主动精神的民族，或者沦为共产主义者任意宰割的对象。

## 危机的实质

象我们一样，其他有些亚洲国家也正面临着亚洲国家所

特有的源于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危机。大多数亚洲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几乎是文盲的贫民百姓的活命要求的压力，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快获得经济的发展。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刻不容缓地加强政府的经济能力，安抚公众由于经济和社会贫困以及不安全而产生的焦虑和不满情绪。

此外，亚洲(不仅是韩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卷入了大国之间的冲突，或者不可避免地卷入美、苏冷战的沉重挤压之中。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政府的经济力量和公众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差距。

民主阵营中落后国家为达到西化或现代化的努力，事实上已经提高了公众的政治意识，但同时也导致人们产生了政府财政能力所无法满足的迅速增长着的消费需求。在西化或现代化的路上我们究竟走了多远，我们只要看看这些事实即可知晓，即我们已经懂得外国香烟中最好的混合型烟，知道最时髦的西装式样和各种类型的外国化妆品。然而，没有经济的发展，落后国家的财力无法满足人们这种高消费的欲望，人们为经济贫困所困扰。政府和社会经济无法满足这种不断上升的消费欲望，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全社会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其结果则是社会压力的持续上升。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是通过同公众的协商取得一致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武断地自行去解决。选择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至关重要，这或许是眼下亚洲落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对于亚洲各国来说，这个问题将成为各个政府何去何从的决定性因素。

至于亚洲未来的政治发展，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从一

开始，自由民主就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这是由于争端结束后需要在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一条是自由民主，获得不附带任何非经济条件的经济援助；另一条路是极权主义，它将使人民生活在残酷的统治之下。我相信，如果我们将去建立一个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我们首先必须是坦率的，敢于承认任何面临的情况，甚至敢于承认目前亚洲社会中，极权主义仍有存在的可能性。

在亚洲，以前几乎没有一个政府是建立在人民赞同这个基础上的，也没有任何事实表明，这些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是建立在人民的需求和向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的社会遗产只是寡头政治。尽管欧洲国家的起点同亚洲国家基本相似，但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有一个适于通过选举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有利社会环境。而维持欧洲政治发展的这一有利环境的经济基础还未形成，即使有也很不完备。

为了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甚至采用非民主的紧急手段也可能是必要的。由于这个原因，亚洲国家不可能象欧洲国家那样建立人民的选举政府。今日亚洲人民害怕饥饿和贫困甚于害怕极权主义对他们的压迫，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事实上所有的亚洲国家政府都必须冒新的风险来避免饥饿和贫困状态的深化。

此外，拥有民主形式政府的亚洲国家不一定具备抗击共产主义政权压力的坚定政策和坚定信心，对此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欧美民主制的成熟是进步发展的成果，而这是经历了许多错误和挫折。当然，这些错误和挫折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西欧式的自由民主在经济繁荣的国度里是可行的。但是，它在亚洲国家则须通过长满荆棘的小路，同时必须立刻解决

无数的难题。

进一步来说，一些亚洲人所提倡的西欧民主形式，一般兴趣所在乃是在自由政治制度之下的自由经济原则和自由企业的制度。但亚洲大部分人则认为，与其说那个自由经济有助于经济发展，还不如说它有碍于发展。一种甚至怀疑自由制度本身的趋势开始在亚洲人中发生，而在这之前，人们则认为这种自由制度无论人们喜欢与否，都必须采纳。这种怀疑的趋势同样扩散到了自由经济的结构领域。

使政治平等原则进入经济领域的趋势，近来甚至开始波及欧美。导致这种趋势的决定性原因是因为欧美在自由民主的原则下取得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这在亚洲似乎并不一定行得通；亚洲人也不一定相信这一套。换言之，亚洲人首先想获得经济上的平等，然后再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在亚洲还没有具备政治民主所必需的经济状况或基础这类先决条件，政治民主所要求的人民的真诚支持也未能得到发展。由于亚洲国家未曾采取这样的经济措施，自由民主制度虽然成了社会结构的形式，但已失去了其真实的本质，在这样徒具形式的“民主结构”中，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要让人民在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旦旦誓言无一兑现，而这一切使民主制度在亚洲威信扫地。根据我们最近十年来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面临饥饿的人来说，选举权是毫无价值的。

在此关键时刻，转向计划经济的观点在亚洲空前盛行起来。民主这颗没有光泽的宝石，对于那些正遭受着饥饿和绝望痛苦的人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那些提倡用系统化的计划经济来对付经济贫困和饥饿的正是那些共产党极权政府。



然而，在左派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经济，由于将大量款项投放在长期计划及长线产品的生产上，又使民众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害。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从贫民百姓中收集来的国民收入，其中大部分投入了长期计划。因此，共产党政权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和压力，人民希望尽快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共产党政权被迫诉诸一些激烈的办法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完全取消了新闻自由，残酷无情地使用了秘密警察。同时，面对公众的反抗和政治上的不满，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把大部分资金用于加强武装力量，用于购买和生产军用品和武器。于是，共产主义的官僚压迫达到了顶点。

因此，落后国家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应当切实可行，以便在实质上提高个人的收入。我们决不能推行那种可能偏离原目标，或者造成机构庞大、投资压力过大而使人民陷入进一步贫困的计划，推行那种计划等于自杀。

因此，我们决不能忘记，在象韩国这样的民主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目标是为了达到作为建立民主的两个先决条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在这样的国家里，应当在怎样使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问题之间保持平衡上花大气力。作者在此重申，这种经济计划的目标应当是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

因此，我们能否在从西方国家承袭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成功地实施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计划，将是韩国乃至整个亚洲能否成功地建立真正的民主之关键。

## 革命时期的民主——行政民主

如前所述，在亚洲地区，除了少数国家，一般来说要使这种从西方舶来的民主真正起到作用，在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下是困难的。而且，为了在将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在不可避免的革命之后这段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选择的不可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国家可能采取何种民主形式提供一些认真严肃的思考。虽然我们决心不惜冒险去消除我们社会中的腐败和罪恶现象（在这方面，采用西欧的民主方式并非完全靠得住的），但是在进行革命时所采取的行为并不完全排除西方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我们认为这些就是我们革命政策的主要特点。

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否定民主的价值，而是为建立真正的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的行动和政策的特点，甚至在革命时期，事实上已是“民主的”，因为没有今天的民主就没有明天的民主，没有现在，哪来的将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必须尽量在公众的心目中灌输并发展民主意识，如今，我们的民族已进入了革命的第二和第三阶段。

由于这些原因，作者认为，我们想在这个革命阶段建立的民主应当适应社会和政治现状，而不是不合我国国情的西欧民主。这个民主的类型可称作“管理民主化”。

如要对为什么在革命时期必须施行管理民主作出解释，我们首先应当回顾一下，革命的目标是消除腐败，加强人民的自治能力，以及建立社会正义。因此，民主的建立在这个革命的过渡时期内应当是通过管理手段，而不应通过政治手段。

作为走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我们建立民主不应当从上

层开始。而是从底下开始，从人民开始，人们应该祛除旧日的坏的习惯势力。

由于过去政党政治学的不正常影响，制度化了的腐败和非正义已深深地渗透在这个国家的机构的每一个毛孔里。事实上，我们不能期望仅仅举行一次“民主”选举在一夜之间抹去以往形成的全部罪恶。然而，正如曾许诺过的，将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选举，以便把政府变为平民大众管理的机构，随之将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联盟。人民大众应当尽早从过去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从无知中解放出来，并改善他们的政治水平，以便能很好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自下而上地发展他们的自治能力。

如前所述，在这个国家中建立民主，提高对民主价值的鉴赏力以及在民主生活中提高我们自己，是一种意识上的需要。事实表明，在这个革命阶段，我们不可能享受到完全的政治自由。然而，民主的原则至少在管理水平上必须得到维持，根据民主的原则，人民的意见和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革命的过渡时期中致力于建立的管理民主，欢迎而不是阻止人民对政府提出的正当批评和意见。这种管理民主必须倡导根据公众意见来评估政府取得的政绩。如果政府有了错误，那么就应该根据人民提出的批评加以纠正。

因此，纠正政府的错误和指出这种错误，并不一定都是革命领导人的责任。人民有权纠正这类错误，有权发牢骚，有权努力提高他们自己的能力。虽然我们处于革命阶段，但行政机构必须遵循民主的程序和原则。作者认为，即便是在革命阶段，如果行政当局的行为是非民主化的，这仍是对革命

意识的亵渎和对革命精神的否定。

虽然我们正处于革命时期，但所有的人们都有同样的责任与平等的权利，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如果人民的权利被非法剥夺，那么这都将归罪于当局，是当局在革命工作的伪装下自觉或不自觉的犯罪。

### **行政改革和人民的自主精神**

韩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起基于自由、平等和正义之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重建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毫无疑问，这场革命旨在尽快消除以往各个领域中存在的阴暗面之后，建立起一个所有人们都生活幸福、平等的福利国家。为此，必须坚决割除腐败这个毒瘤，清除那些必须对在李承晚和张勉政权下整个政府处处可见的不公正和腐败负责的政治风云人物。所有为这些腐败的政治机构所驱使的组织也必须加以取缔。

换言之，一定要产生一种适宜于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民族气氛和全民族的政治环境。我们必须抓住革命为我们提供的良机，为防止甚至在政权归于人民后仍会出现的不公正和不诚实打下基础。

由于不公正和腐败的积习太深，甚至当我们最近已设立了公共官员不轨行为监察委员会之后，仍有人想恢复过去的旧制度。对这些人必须严加惩办，因为他们亵渎了“人民的名义”。惩罚他们，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进一步来说，虽然作为个人，我们怜悯他们，但是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那些在旧政权不公正和腐败的统治下为虎作伥的人，必须对他们的罪行负责。

我们必须开展清除旧时代留下的不公正和腐败的工作，但这必须建立在“惩罚一人，教育多数”的原则上。在革命时期，这项工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但必须申明，这项措施并不会影响人民的情绪，也不会变成压迫公众的暴行。这项割除毒瘤工作的基本宗旨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光明、健康和民主的。

因此，未直接卷入这种不公正和腐败的人民大众不必感到忧虑和恐惧。他们应当正常地生活，思想上不必紧张。

甚至于对那些由于在旧时代的不轨和腐败而触犯刑律者，也将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同人民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将功补过。

如同我一再指出的那样，革命被设想为在这个国家中建立真正的民主。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虽然民族运动本身对人民觉悟的提高是一种推动，但还必须通过社会教育手段对人民大众进行彻底的教育。这种对公众的社会教育应当采用这类课题：即提高每一个人的责任感。通过参加社会发展的公共组织，全民族运动和社会信息交往活动，来改正我们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等等。我们将在整个国家，通过利用一切公共信息传递媒介，来使人民能够懂得并运用民主的生活方式，懂得并使用立宪政府的原则。

通过政治训练，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应懂得他们对公众和国家所负有的职责。由于在人民中存在着许多不负责任者，特别那些不负责任的身居高位者，他们自认为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特别在对待他们的下属时，更是飞扬跋扈。他们如此堕

落，以致有了一点权力，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但是他们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则极其可悲。

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关于权利和义务，维护权利和对社会负责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上，观念还较为模糊。其结果是，民主原则实际上成了一张没有限制的执照，自由民主成了混乱和散漫。侵犯他人利益的“自由”得到了宣扬，而遵纪守法却未能得到加强。因此，在政府逐步转变成为人民政府这段革命时期内，必须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奠定知识和道德的基础。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公众也可以提高他们自身的自主和自助能力。

一切都将由人民自己来加以矫正。而政府则必须坚决而持续地进行行政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中，首要任务应当是尽可能彻底消除曾肆虐一时的官僚主义政治和中央集权主义，并以实现地方自治来使行政机构民主化。“官僚政治”是一些人利用人民对政府的崇拜而形成的，在我国几个世纪以来，政府一向轻视百姓。中央集权则是由腐败而狡狴的高层官员们发展起来的，这些人利用管理权来谋取私利。

尤其必须在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方面尽可能作出努力，其前提是消除高层官员中集权趋向。为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部门中所有层次的官员的创造力和领导能力都必须得到发掘和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在革命中对政府行政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权力回归平民大众，再要去改善和提高行政部门的效率则将是困难的。应当承认，这在牵涉到个人时是不那么舒服的。然而，如果这种改革能够牺牲少数人而拯救多数，能够使3千万韩国人的利益得到保障的话，我们必须实现彻底的行政改革。

进行行政改革并使行政民主化这项紧迫工作的另一部分，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取代官僚机构的组织。这个组织能够合理地发展和合理地接管这架机器。同时，必须有效而持续地在行政组织中强制实施民主管理手段，以防止那些不诚实的官员们再度把办公室变成其私人领地。行政改革和行政机构民主化都需要一个有效的民主管理手段。由于我们的革命原则是旨在建立真正的民主，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即便是在革命时期，我们也将始终如一地遵守行政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更着重于对政府的民主监督管理。对于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忠于职守的必须加以肯定和奖励。另外，民主管理机构必须为官员们建立一个政绩档案，以便能随时对政绩优良者进行奖励支持，并及时制止官员的不当行为以及当局的错误。由于行政机构缺乏这类合理的控制，尤其是缺乏民主监督，在旧时代，国家公职常常由于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遭亵渎。整个机构的制度化了的腐败现象即由此而产生，其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病态。

政府和人民必须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发展地方自治体系，在这个体系内自我管理能力得以培养。在这方面，当5月16日革命后，开始进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时，经中央政府授权，以各种方式迅猛地加强了地方政府。将来，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地方自治，这主要表现为改善公众的自治和自助方面的能力。

我们还必须尽可能早地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其实这项工作早已开始着手进行。由于对政府中公职人员的管理合理化，我们将能消除假公济私、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这些恶习，而正是这些东西，在过去导致了整个政府官员

的层层腐败。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健康的口号，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以使得官员们能够积极而具有创造性地为人民谋利益。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为国家的发展制定严格的纪律，那么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由于那种国家机关的政治腐败是通过政府官员表现出来的(在议会的政党政治中表现出来的)，为此，我们应当首先建立起健康的制度。这里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包括过去官员们和公职人员的工资太低。我们在这个革命阶段必须制定出一些解决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办法。我们不必使这些官员们太富足，但至少给他们以适当的工资待遇，以便使他们能过上象样的生活，进而对国家和社会改革作出他们的贡献。



## 第六章 社会(国家)重建的 观念和哲学

### 和平与自由——人类的希望

我们现在正面对一个人类历史上绝对空前的严重危机和困境。一想到自己发明的原子力量，人们就会发抖；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后，人类却发现自己由于不能在全体人民中间公平地分配生产所得而陷入极端的窘迫之中。尽管人们已经极大地缩短了大陆之间的距离，但是，强大的武力集团仍然使很多人与世隔绝，极权主义制度威胁着很多国家的自由。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面对的现代冲突。

然而，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并不一定仅仅是黑暗和绝望。我们依然有和平的希望。但是，只有当人们能够把这种原子时代不断增长的力量转而用于和平的目的，这个世界才能希望每一个地方的人民都将从不安全、恐惧和贫困中解放出来。当全体人民都憎恶侵略战争，消除人民之间的不信任，加强国际法律秩序，同时尊重人的尊严和国家主权，我们才有希望保障世界和平。在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及和平的国际社会里，我们可以希望，人们将能发展他们的才智，并在消除了贫困与恐惧之后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现在，克服这些现代危机和矛盾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必

须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即确定我们是建设一个光明、灿烂和幸福的未来，还是把人民驱向自我毁灭和黑暗之中。只有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自我发挥，在这种秩序下，可以保障自我发挥的平等机会，我们才能充分地开拓自由的道路。作为世界各民族社会的一个成员，寻求这种新的光明秩序是我们的民族任务和国家重建的指导路线。

### **我们在社会重建中的基本价值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的大众被那些执政者所抛弃。大众在他们的职业中遭受非法的剥削，在国内生活中遭受贫困与饥饿的沉重压迫。而且，他们还是外国压迫的牺牲品，并充当了相互倾轧的外国强权的爪牙：我们在革命以后想要建设的社会应当是所有的人在国家面前都是平等的和能够负责的，都享受着自由，都在每一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与其他人合作而过着和平的社会生活。因此，正义和自由应当是人民生活的最根本条件。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在平等的基础上承担他的责任，承认他的同胞有发展自己和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权利。共同承担在自由、正义、相互联系和合作基础上的民族统一的义务应当是国家重建的基本观念。

我想，通过当前这场革命，我们最终应当取得的目标是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自己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下述根本理想和条件，而这些理想和条件在一个人能够像人那样生活的社会里是必须得以实现的。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在一个统一的和强有力的执行机构领

导下接受和支持国际法律秩序。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应当具有平等的机会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应当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先进国家不能享受垄断利益；在这个社会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出现的一切独立国家都将有同等的机会为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相信，新诞生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都具有要求与其他国家和人民结成平等关系的权利。

所以，民主制度最终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因为，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个人的责任的基础上的。正是出于这个同样的原因，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都应当为了人的自由和为了道德而被摒弃，因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专制制度和极权制度都忽视人的尊严，剥夺了人民的自由，破坏了他们的权力，把天真无辜的人民驱赶进道德堕落之中。然而，在这一点上应当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共产主义者表面上装作是和平、自由和正义的先驱者，提倡一个自由平等的无阶级社会，而实际上正在正义和自由的伪装下，通过使社会分裂更加恶化来力求建立一种新的共产党的世界独裁统治。

甚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民必须承认国家的权威。不过，一切民主国家的权力都服从公众的节制。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高于任何特殊集团的利益。如果任何特殊集团的私利超过了国家利益，那么国家就会沉沦，它的人民就会被毁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允许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完全忽视公共福利和人民幸福的社会或国家能长期地生存下去。

据此，从历史观点出发来考虑，我认为，如果说任何充满不正当地追求利益和权力以及无原则和腐化的那种经济或

社会也能永保繁荣和发展，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极其明白的是，在一个充斥着政治腐败、无原则和肆意追逐利益和权力的社会或经济制度里，民主事业、社会稳定与自由是注定会消亡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国家重建的机会来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教育领域里不能容忍任何特权。仅仅是有钱和有势的人才享有的教育特权，应当彻底消除。教育的大门应当向所有的人才敞开，而不管他们是否有钱，具有何等背景或家庭门第。我确信，民主制度和自由要求人民培养社会意识，并准备承担共同的责任，而这种自我意识应当受到鼓励。

然而，仅有任何一种特殊的制度并不能保障公正和自由。随着每一个生活领域在技术上和系统上的发展，各种对自由的威胁不断出现。只有多方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才能防止人的道德生活的麻痹，激励每一个人的创造能力。

## 国家秩序

我们的国家被38线所分割，我们熟悉的一部分山川大河掌握在共产主义者的魔爪之中。这一现实要求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来实现一个自由和统一的韩国。我们的悲剧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造成的，它阻止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种悲剧不是我们造成的。韩国的分裂威胁着世界和平，也是对世界争取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历史性亵渎。战胜并结束这种分裂是我们人民的最高职责。然而，结束分裂必须在统一于自由的原则下加以实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自由的条件下取得自身的繁荣与强大，应当是高于一切的。

换句话说，我们2500万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努力建立起我们的力量——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战胜分裂，因为只有不断地扩大我们自身的力量，才能实现统一。

所以，最根本的是集中巨大的努力建立一个永恒的自由社会，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否定一个人的价值和他的道德观。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否定人的生活、人的价值和自由的政策都绝不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否定一切人的价值，因而永远不会成功。在这方面，共产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敌人。我们总是能够在我们中间发现类似的敌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他们的高度警惕。一个这样的民族应当尊重它的公民的自由，这个国家应当保护信仰和道德自由，换句话说，国家应当帮助每一个人发展他自己的特长和责任感，它的根本法律不仅应当保护一个人反对国家的自由，而且应当作为民族社会和国家的一种基础而起作用。

国家应当能够让人们过上一种负责任的、独立的生活，而且应当能够保障人民的自由，他们就可以加速自由社会的发展。在一个不赋予人民自由和责任的社会里，个人和人民的自由都永远不可能得到保障。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从法制安全到政治和经济这些最根本的保障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我们国家的民众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由于失业而每天坐在公园长椅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过是绝望的自由。

由于在经济上保障人民的的生活是发展自由社会所必需的，应当最大程度地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理想。所以，我们走向的那个自由和合作的社会应当建立在尊重个人私生活的基础之上。不应当违背这些根本的人权：如新闻自由、宗教自由、

学术研究自由、艺术自由以及由国家保障的集会自由。个人一定不能滥用这些权利，但必须以民族社会的责任感来行使这些权利。我回想起过去的一种习惯行为，那时一些人要求过多地行使他们的权利，但却忽视了他们帮助贫穷和饥饿的人民的职责作为一种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完全无视他人的权利，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是达到自由和合作的社会的一种障碍。

我相信，这种国家没有绝对的道德价值观念，特别是在权力机构方面。如果国家接受任何道德观念，只有在下述条件上才能证明这些道德观念是正当的，即一种健全的社会秩序已经发展起来，它将会鼓励人民的自由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维持法律和秩序，而是应当努力维护和鼓励增长。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国家对于公众幸福不过是聋子和瞎子；它既不为人民工作，供给饥民以食物，也不给干渴者以饮水。普遍的饥饿和贫困、在民主美名下盛行的腐败、共产主义颠覆的罪恶活动，这些都是未曾得到关切的重要事情。今天，我们的国家不能再走老路了。今天的国家必须足以积极的行动来保障人民的经济幸福，帮助促进和保证自由。

在革命的过渡阶段，我们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机器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随着国家重建任务逐步取得成功，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就应当分立，并且对公众幸福承担各自的责任。在民主原则下逐步改善各个系统的结构和组织不仅仅适用于中央政府。即使在下一级的地方政府如道、市、镇或村，公共部门的组织也应当得到改进，以赋予人民参与决策和承担民主责任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最基本的是这些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在财政上提供保障

来尊重、加强、扩大和支持自由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里，让各级组织由来自不同层次的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组成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集团应当遵守民主的法律和秩序。一个集团具有的影响越大，伴随它的责任也就越重。有可能滥用影响的危险总是存在的。国会、政府和法院不应当屈服于压力集团或他们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的不正当的影响。

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社会里，报纸、电台、电视和电影应当为公众的利益服务，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在不偏袒地采集和报道新闻，负责地阐述那些有助于公共利益的编辑部观点上必须是自由的。这绝不是说，我们会容忍那些服务于腐败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公开从事敲诈，故意伪造和歪曲新闻事实以使消息不灵通的公众上当受骗的伪新闻再次登场。像报纸、电台和电视这样的传播媒介应当是热心为公和负责任的。新闻对我们全体居民承担的民主社会责任应当超越一切私人的或政治的派别。

法院应当是独立的，使它能够不偏袒地施行真正的公正原则。过去，有钱或有权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非法目的而破坏法律，而无权的公众则被排除在正当的法律保护之外。从现在起，无论是用钱还是用影响来控制法院和施与公平都是不允许的。同时，一般公众和法官都应当仔细考虑法律的精神实质以及字面含义。

### **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小限度的计划**

在革命后我们确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目标是：促进公众幸福，免受剥削，在人民中间进行收入的公平分配。很明显，

这些目标是不会在一夜之间达到的。然而，它们是我们必须努力达到的那种经济秩序的根本目标。

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使我们贫乏的经济力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停滞之后得到大大的加强，使在此之前萎缩或不发达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必须向经济增长、向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跃进，而这种社会和经济秩序将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不是靠牺牲这个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来自私地追逐私利。为了保持优先考虑公众利益，迫切需要制定一个经济计划或一个长期发展计划，通过这个计划，我们全部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可行的。在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里，革命政府正尽一切可能通过长期发展计划来推行增强生产力和增加就业的政策。

绝不能允许经济计划或长期发展计划抑制私人企业的创造性或自主性。为了做到经济的合理运转，整个国家发展计划对不同工业在地区上的重新配置和投资规划实施一些行政控制，尽管不情愿，可能是必需的。不过，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通常是由自由竞争的价格机制而引导出来的长处，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产生一种垄断系统可能造成的损害。

为计划本身而搞经济计划是不可能也不会存在的。我们搞工业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达到最充分意义上的公众幸福，这样，通过长期发展计划，利用潜在的工业发展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那些事实上存在垄断的工业部门里应当鼓励竞争。

我们必须克服的最大的经济障碍之一是大量长期失业的问题。失业不仅是一种人力经济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引起失业者道德的败坏。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达到充分就业。如果旨在道德上唤醒民众的“国家重建运动”无视失业者大



军，那就不可能成功。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不仅是国家的职责，而且也是帮助公众坚持道德准则所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扩大就业是至关重要的。像韩国这样一个国家，领土狭小，资源匮乏，扩大外贸和发展现代工业是充分就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有计划地在农业地区配置工业，用工业吸收过多的农业人口和逐步减少工作时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过去的政治家和商人中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非法逃税或滥用与大量流入的美援有关的国家财产。这样，大部分财富都被这类叛逆的政治掮客和非法的获利者以不诚实的手段所攫取。今后，我们的政策应当是没收非法所得，通过没有漏洞的税收体制把没收的非法所得回交国库，并把这些增加的国家收入用于教育、社会治安和其他可能的公共服务领域中去。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民主的合作的社会，用现代术语来说，把广大人民提高到中产阶级的地位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理想。

为了抑制大企业不断增长的权力，应当允许雇员在国家的合理支持下平等参与管理，应当制定特别措施以便让技术工人和其他人能够利用他们个人的和集体的创造力为改进工业作出贡献，这样做，国家就能保护雇员的利益，并且有力地汇集工人们对于改善和发展工业生产的自觉支持。

还有急需的一点是，国家应当特别注意某些工业部门可能危害公众利益，这些工业部门由于未遇到竞争，因而无法防止他们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可以同意成立一些某种形式的消费者组织来对工业经营提出一种劝戒性的意见。

在很多地方，无论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认为，大规模工业绝对是最佳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很多工业领域的中小企业能有独立的活动范围。目前这些较小企业

的停滞提示着它们能够通过协调经营、国家帮助和技术改进等的刺激来增加生产率。从而这些企业的收益率将不会比大企业的收益率更低。

一个国家，如果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就能通过在税收、财政、货币和信用等级上的决策，通过关税、贸易、社会生活、农业、住宅、价格等等政策来不断对经济发展施加巨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产品一般来说都是通过公共机构和部门加以引导的。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经济的安排与计划是否在客观上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而是谁来做出安排和计划以及为什么人而做。在这里一定要制定防止经济衰退的政策，但国家不应是一个经济上包治百病的药贩子。国家应当限制自己，运用一些间接影响经济的手段。

鉴于民主的价值观的基本概念和考虑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人民对消费和就业的自由选择不应当受到阻碍，而应当受到保护。自由地选择消费和职业以及自由企业的创造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提供的经济自由可能是一种自由经济政策的要义。雇员和雇主之间在工资上自由商议是自由制度和秩序的一个基本要素。极权主义的经济制度毁坏了自由。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家都赞成走向自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总能有效地保持竞争。然而，一旦市场被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所垄断，就必须立即采取纠正措施。“最大限度的竞争和最小限度的计划”——这就是真正的原则。

### **收入的平等化和经济的公共利益**

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强烈地趋向于中央集权。

巨型企业——在目前被认为是我们国家不可缺少的——不仅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会进一步给社会结构和经济带来变化。拥有巨额财富和一支雇员大军的人不仅仅参与商业活动，而且对其他的人行使巨大的权力和施加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远远地落在经济和物质进步的后边，他们在思想、个性和尊严等意义上的存在可能受到妨碍，甚至完全被毁坏。哪里拥有惊人权力的巨型企业在自己佯称主张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幌子下关心自己的私利，哪里就没有自由竞争。所以，一个人如缺乏抵消这种集中权力的力量，这个人就有可能在发展上受到阻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他的自由。就经济意义而言，人作为一个消费者处于最软弱的地位。

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里，企业领导人很容易进入政府部门和介入政治，并把卡特尔或托拉斯的强大力量渗透进政治和经济领域。就在不久前有一个例子，一些工商界财阀对立法和行政机关施加了不可抗拒的压力，使法律对他们有利，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敢违法以攫取超额利润。这是同自由经济活动的正面冲突，同时，也是对民主原则的一种背叛。国家政策对工商界财阀发慈悲，结果与人民的意愿和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导致他们篡夺了我们的最高主权。这是经济力量向政治力量的一种转变。这是对自由、正义和稳定的一种挑战，是对全体人民平等权利的一种威胁。

因此，自由经济政策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对巨型企业经济力量的调节和监督性指导。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应成为那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私欲的牺牲品。然而，也不应当由此推论我这里所说的是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非但

如此，应当无条件地鼓励生产的私有制，除非是为了刺激国家的发展和保护人民的总体利益而对某些部门实行必要的控制。换句话说，出于自由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私有制必须得到发展，它有权受到保护，除非它的运转有违于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秩序。

我们必须积极地促进中小企业的福利。而且，国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小企业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提高它们的真实价值，而这种价值通过它们的竞争就能够获得。我相信，人们期望促进较小企业的发展证明自由竞争是合理的，通过自由竞争就能保证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平等的机会。

国营竞争性企业的干预对于抵抗私人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可能是必要的。国家利益和公众幸福能够通过国有企业得到保护。

如果一些经济组织建立一个协会只是为了增进了它的成员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利润，它可以作为一个价格装置的杠杆发挥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作用。这种做法值得鼓励和推动。

为了告诉人民经济实力结构和企业管理的水平，应当改进和增加那种积极的公共信息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有可能创造和收集公众反对滥用经济权力的意见，动员公众舆论保护公共利益。出于公心的有效管理能对经济专制主义产生一种威慑力量。有助于防止这些弊病的最佳办法就是对投资实行管理和牵制市场控制力量。

公共化——把一些事物转向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一种公共管理的传统形式，任何现代国家都不能忘记它。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还必须保护公众的自由，免受巨型经济企业的过分权力的压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巨型企业服务于

一些看不见的权力贵族。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生产企业的私有制逐渐丧失了基础。说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力，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只有当对这种经济力的秩序和结构进行公正和合理的协调行动失败了，才能证明公共化是正当的。

即使经济力量集中于国家手中，这种集中本身也可能带来产生多种非民主的缺陷的危险。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总是以自主经营和分权为原则组织国家的财产。公共部分的管理应当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应当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和公众利益。同时，如果我们的发展符合民主的原则，那么主要的原则应当是保证最大程度地为一般公众做出贡献和与一般公众合作，而不是官僚政治。

在自由党和民主党统治下，如同在高丽和李氏王朝一样，收入和财富在人民中间的公平分配得不到实现。对此，不同的人可以引证不同的原因。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这种经济政策帮助和支持少数人成为富豪，而不顾工人和人民大众。在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韩战中所遭受的破坏与损害，以及随之而来造成金融破产的混乱更使得形势每况愈下。现在，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创造一种环境，使人们能增加他们的收入。这种社会必定是这样的，即财富的公平分配要通过不断增加经济和社会生产成果来实现。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显著特点。在韩国，成千上万的农民依然在简陋的小屋里忍饥挨饿，而少数政治统治集团的成员却享受着舒适和奢侈的生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民族耻辱，将阻碍国家的发展。为了加速建设一个自由与合作的社会，为了纠正这种被扭曲的现实，我们必须动

员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建设一个自由和繁荣的福利国家，消除多年积累下的贫困、疾病和无知。我们现在正处于与共产主义者进行经济竞争的、军备竞赛的时代。战胜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在那里，被强制的劳动者集中营和口头上的实惠构成了那种虚假的“劳动者的天堂”——的途径是迅速地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一个没有饥饿和贫困的社会。

### 消除小农和农村的复兴

经济自由的原则也应当应用于我国忍受了几百年贫困的农民。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农民保留了一种僵化和过时的农业结构，人为的和自然的因素恶化了目前农业生产的病态，因此，政府若不采取非常措施和大胆的决策，就无法纠正和改善我们农业的贫穷不堪的局面和日益下降的生产率。

1945年光复以后，通过土地改革，全体农民都有权拥有他们早就应当能获得的自己的土地。但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一种新型的佃户和地主制度产生了，随之而来的是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时，农民的血汗果实得不到应有的价格。经济政策应当更加强调农业的合理发展，使农业对我们的经济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国家应当无保留地积极鼓励农民搞“副业”，应当伸出合作之手来改进农业技术，以便使每一个农民，只要他是勤奋的，都能象城市地区的居民那样过上舒适的生活。革命政府把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作为最迫切的任务。

几百年来，我们的农民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同样陈旧的农业耕种和管理的方法。现在，我们必须探索其它的现代管理方法，一种产出多、能获利的方法以实现农业复兴。有一条向

农民敞开的路是饲养家畜和加工农产品。我们的农民应当自动地消除他们的依赖性，发挥开拓精神。在政府这方面，需要建立市场和价格政策以稳定农业收入，因而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使他们能够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当然，我们不会让注意力脱离消费者的利益或我们的国民经济。这就是说，政府应当推行大胆的政策，在不损害城市居民的消费力的限度内维护和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如果我们能获得友好国家的理解，政府也应当努力逐步减少外国剩余农产品的进口，这些进口农产品对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造成了有害的压力。

为了改善总的经济生活和增加农业收入，人民和政府应当发动一场强有力的支持“农业合作运动”的战役。

我们必须为经济复兴发展农业。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农村地区的自给自足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鼓励农产品出口，努力帮助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个国家里，60%的人口是农民。从根本上讲，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是解决农业问题和把农民从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由于农民构成了一个在经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市场，因此，我相信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极其重要的。在我们为农民努力探索一条通向更好的生活的道路，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时，我们必须提及关于农业建设的一些重要部分。

应当逐步增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稳定和改善农业和渔业经济，同时通过立法来取消农民的高利债务（通常年利率超过80%）。高利债务在“五月革命”前估计约达到800亿圆，这种癌毒削弱了农民的生产欲望，损害了生产，

使农民处于贫困的境地。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金钱的枷锁，把农民从高利贷债务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使他们能独立自主地去工作。革命政府把取消高利债务作为第一位的责任迅速而公正地完成了。然而，政府应当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阻止这种罪恶的负担再次发生，只要有任何复发的迹象，就必须采取严厉的紧急措施。在作出这些努力的同时，也不应当忽视由银行和政府发放充足的农业信贷基金。

为了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来组织和鼓励饲养家畜，应当进口良种家畜，包括优良品种的奶牛，家畜产品应当开拓海外市场。到目前为止，对农民收入的分析表明，90%以上的收入来自未经加工的农产品，几乎全部来自稻米。提高农业收入在于向多种农业经营转变。通过这一转变，就应当根据地理位置着手开展这种家畜饲养和其他特色养殖。市场调查应当紧紧围绕这一多种农业经营进行。应当颁布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法律，以便把价格维持在一个标准水平上。除了支持价格以外，还应当取消高利债务，并由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发放农业贷款基金。

农业合作社的存在一定不能象过去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等级集团的利益。按照其真正的意义，合作社必须成为农民的手和脚，并发挥金融银行和合作商店的作用，这样，就排除了过去那种对农民的中间盘剥。合作社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

应当重新审查以往给予农民的一切形式的信息和教育。过去，多种多样的信息和教育由于缺乏计划，因而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结果，而只是浪费了农民宝贵的时间。这些计划必须加以改进和合理化。这些计划应当在实际上为改善农



民的生活和改进农业技术的目的服务。

现在必须要做的是，集中全部努力，建立一个自立的和丰裕的经济。在千变万化的经济复兴政策中，我们的农业措施将在“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复兴农业获得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计划是否能够成功。

最后，与整个发展计划密切相关的是，应当开始农业地区的电气化和工业化进程。计划吸收农业闲散劳动力重建森林和防洪工程等发展项目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这样，对工业产品需求的边际效益将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将开始走向自给自足。

### **福利社会的合作制度**

一个现代的工业社会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每一位公民，当他年老或生病时，都有权得到保护并由国家保障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例如在英国，每一位公民“从生到死”的社会保障都是有保证的。然而一般说来，在不发达的民主国家里，经济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这些福利。在我们的未来社会里，国家的双重责任应当是给予老年人和伤病者以保护和费用上的保障。当我们的国民经济取得全面增长——要完成这一任务，革命政府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时，我们就能够通过正规的老年保险制度发挥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的职能。

社会保证每一位公民“从生到死”的最低生活，是一个合作的民主社会的职责。所以，我们必须为参战老战士和失业者安排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建立事故、健康、老年退休金制度，通过最低工资立法。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我们将能够让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过上作为人所应有的体面的生

活。做到了这些，我们就能创造条件来动员大韩民国2500万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全体潜力来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

关心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重要职责。国家通过兴建完善医疗设施来消除各种地方疾病的威胁是合乎人民心愿的。我认为，我们的医疗机构和有关当局——它们应对人民的健康负责——并未充分地担负起他们的责任。要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康、幸福和强盛，革命政府已经把改善国民健康标准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无论在城市、农场或是渔场，无论是在工作或是在家里，扩大和改进公共医疗设施都将使全体人民的身心健康向前迈一大步。

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来帮助地方政府推进为全面改善居住地区条件的民办工程项目，如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防烟雾工程，清理贫民区等等。同时，政府将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改善环境卫生和安全工作条件。我坚决认为，国家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政治应当最终为人民的经济利益服务。

在我们未来健康和合作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方面，家庭生活应当与社会发展平行前进。健康的家庭生活是进行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民主社会的根本基础。正如以上所说，国家应当推行一套全面、完整的社会保障计划，以便使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除非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父母与子女间的爱，否则无论是合作的民主福利国家，还是健康的民主社会都不可能产生。我们知道，无人性的共产主义者否定人民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同时，在压迫和对个人生活隐私的侵犯下，共产主义者逐渐趋于死亡。我们已经达到这一阶段，即必须保障每一个人过上幸福和安全的家庭生活，即

使必须通过国家的职能机构来完成这一点也一定要做到。

一种民主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工会和其它劳工组织的健康发展。自从1845(编者按：原文如此)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名义上的工会和劳工组织。然而，这些工会和劳工组织远不是工人的真正利益的倡导者，它们或是特殊的压力集团，或是工人贵族的工具，通过剥削工人的血汗反而来为政治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如果我们想从现在起永远不再重复过去的工会领导人的行径，国家就应当最大程度地运用各种方法和指导原则。我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工会和其它劳工组织的健康发展正是一个健全的合作民主社会的支柱。我们应当与这些组织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使他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干预下处理内部事务，以便劳动者能获得健康的进步与发展。由于独立性是劳工运动的基本因素，因而除非有肯定的证据证明有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渗透，原则就不能允许国家干预工会事务。而且，在这个国家里，政府必须帮助劳工运动，保护和鼓励劳工运动的发展和地位。

保护中小企业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必须特别得到加强。在国家的积极支持下，较小企业的当地工人应当更多地关注全国工会的管理，防止任何可能的独裁领导人的错误行径，而且，要抑制自己，不去追逐有可能损害一个健康的和合作的民主社会发展的过分的特殊利益。

我们高度评价青年的道德观念和理想。青年们对我们当今社会寄予很高的期望，而社会过去常常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因此，不管国家在经济上会是多么贫困，也应当制定措施给予青年人对未来的许诺和希望。

老年人和中年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而青年人却强烈地憧

憬着未来。在过去的政权统治下，青年人在任何方面的梦想几乎都不可能实现，因而，一些急躁的年轻人被驱向犯罪。应当给予青年人适当的指导和引导，使他们怀有希望，参加社会建设工程，克服他们的困难。

同时，年轻人自己这方面也应当考虑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所承担的责任。国家和社会必须注意使家庭向它的成员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必须介入，给予帮助。一般说来，国家对教育和培训的辅助性资助主要用于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设施。

按照社会关系和教育的发展需要，必须保护青少年劳工。应当颁布进步的青年法为青年一代提供帮助和教育。我们必须牢记，必须把青年人的幸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必须给予青年人以教育、指导和保护，使他们能形成自己的性格特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将是今后掌握通向未来的钥匙的人。

国家在特别重视青年人要求的同时，应当以同样的关注对待妇女的权利。实现男女之间在法律、社会和经济方面事实上的平等，这是基本人权的要素，然而，由于数百年来传统，这些权利往往被完全忽视了。如果不保护和扩展妇女的权利，那么；任何试图保持和推动民主制度作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基础的努力都将必然失败。应当尽一切可能通过教育鼓励妇女的智力发展，并让她们自由地选择职业或专业活动。妇女应当得到平等的社会报酬。我们在这里应当告诫的是，妇女的平等权利并不包括较为软弱的性特征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差别。因此，家庭管理应被视为是一种专业劳动。家庭主妇和母亲们需要特别的帮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

那些有孩子在学校读书或呆在家里的母亲们寻找在社会上工作而消除经济上的困难。

### **民主的理想和文化及教育的新秩序**

在东方和西方有一条永恒的真理，即只有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个人的创造能力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的合作的民主社会应当为个人的创造能力提供最充分的机会，为全体人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只有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文化，我们才能取得一种令人满意的文化生活。

我们的政策必须是有助于促进和鼓励一切文化才能。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民一直没有条件来实现他们的文化潜力。这是由于李氏王朝的封建制度，日本占领时期的殖民统治以及自1945年光复以来产生于假民主制度的政治腐败。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有形和无形的文化珍宝被抛弃在仓库和博物馆充满灰尘的地下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有才干有生气的文化志士被隔离在祖国的边远地区，放在一边，等待着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创造力。不仅如此，总起来看，文化似乎多多少少为一小部分专业名人所垄断，脱离了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和渔民。我感到遗憾的是，一些城市居民似乎有一种错误的风气，奢侈浪费和媚上欺下的自命不凡。我们的人民沉溺于一种假文化的虚幻概念之中。他们以为国家的威望是用辉煌的霓虹灯来支撑的。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外国的，就被认为是质量最高的。任何人模仿西方的行为，都被认为是表明这个人有文化！

人民大众必须有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利。文化必须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才能促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为了达

到这一实际的目的，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主观的本质和价值以后，才能消化外来文化。首先，充分地发掘和进一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把它介绍到国外是我们的职责。同时，国际文化交流应当是为了促进相互理解，并独立地吸收那些适宜或适用于我国的外国文化。

文化复兴这个紧迫问题不能过分强调。然而，不提高个人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就不会有民族文化的复兴。尽管热切而又有能力的个人或组织有可能对促进和鼓励文化力量作出贡献，国家还是应当限制一些权力贵族或特殊利益集团，如果他们为了自私的目的去剥夺人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

这也促使我要简要地解释一下宗教或教会的适当地位这个与文化复兴有关的问题。一种宗教只有在相互容忍，承认信仰不同宗教或哲学的人与其他的人具有同等价值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人类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坚实基础。

国家与宗教是不同的两回事。由于宗教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不同，这样，宗教本身应当不受国家的规定或影响的控制。国家应当确实尊重宗教活动，从法律上保护独立的团体和教会本身的独立性。但是，教徒一旦脱离了教会，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因为他进入了社会生活。

思想、宗教、道德和新闻这些方面的自由应当得到严格的实现，但无论是宗教还是新闻，就其一般概念而言，都不允许为了政治的目的而滥用特权，或者颠覆民主制度，或者助长共产主义。

由于人的才干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只有通过教育和启发才能够取得，因而，应当最大限度地给予人民以受教育和启迪的机会。现代的教育和启迪构成了一股抵抗极权主义倾向的

力量，这股力量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保障。独立思考和自由地判断应当是研究我们的文化遗产，使它们适应于形成我们的现代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一代能够通过在学校和学术机构学习来发展责任感和享受独立与自由。如果他们想了解国际问题和民主的实质，那么团体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团体教育对于帮助青年人在这个对价值观念有着形形色色的概念和想法的世界上培养理解、慷慨和友爱的态度是必要的。实践生活和实际享受文化娱乐的教育在知识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和国家有义务通过公共教育和使用教育设施让它的人民熟悉艺术和艺术活动。

由于我们在历史、文化和传统方面的知识有一种被学者所垄断的倾向，人们很少注意体育运动教育。应当强调的是，体育运动不仅对于增进人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而且特别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团结的精神。特别是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外交活动相对来说处于初期阶段，体育运动通过参加国际运动会特别有利于造成友好和理解。即使在我们目前的国民教育政策中还缺乏对发展体育运动的要求，也应当尽可能地鼓励人民更加重视体育运动。我相信，国家有义务鼓励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把它作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初等教育也应当把重点放在实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考虑到在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这一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才能有困难，因此，专业学校或特殊培训学校应当准备一些特别课程，使学生们能够一边上学，一边工作，以取得全部或部分生活费用。高等教育的合格证书应当授予那些合格的学生，至于那些似乎只对颁发毕业证书感兴趣，而

对提供实际教育不重视的高等学府则应清除。所有的教师都必须经过专业学校的学习。优良的教育来自于那些能够引进知识，唤起热情和开发学生们的道德和爱国主义的优秀教师。

实际上，我自己毕业于师范学校，一度是一个教师，我知道教书的痛苦，这使我特别关心教育。确实，我的印象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教学管理，而不是实际教学。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不是提高教育部、省教育厅或学校中主要的政府官员或行政官员的兴趣。教育是严格地为学生利益服务的。当前的教育目标应当是更好地改进教育本身。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过去，教育制度和行政官僚机构比实际教学更为重要，与民主制度中教育得到的公认的必要条件相反，教师反而成了官僚机构的奴仆。

首先，改组学校体制和使它的管理合理化，改革教育税，提供免费的和义务教育，应当建立一元化的教育管理机构 and 优先发展现场教育的管理方式。过去，我们的教育制度堕落为通过管理来追逐利润，成了一个收集家庭财富的联合企业，或堕落到了成为个人成名的跳板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恰当地教育一代年轻人和履行它的真正职责。

鉴于我们的实际情况，仍然陷于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我国脆弱的地位，学校应当强调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并把他们送回原籍地区，以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发展做出贡献。过去，在有关学校的建立和运转的记录中，很少有证据能证实这样的效果，即学校对更好地改善地方状况作出了贡献。

一个穷学生完成了规定的教育课程，为他极为贫困的父母省吃俭用送他上学而感谢上帝，以后就去看城市的霓虹灯，



同别人闲荡游逛，而把需要他的家乡抛在一边。这些就是过去那种教育的效果和结局。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学校的这种注重形式、抛弃家乡的状况，然后采取行动，制订旨在促进地方发展和参与地方的教育活动的政策。

过去的那种教育形式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它对我们的国民经济起了消极的作用，还因为这种教育主要靠的是纸和笔才正式取得高考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强调，在生产能力上的培训教育是绝对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和经济重建的最基本的要素。现在，我们有机会使技术教育充分合理化，通过补充建立技术设施，改革课程设置和扩展训练设施来纠正学校的那种不公正的运转。

真正的民主教育应当为学生指出方向。目前这种肤浅的社会教育课程应当注入实质内容，以培养建设一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基本品质。

最后，我希望表达我对知识和艺术问题的观点。所有的时代都普遍接受这样的信条，对知识的研究和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发展的话。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自由研究并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利害攸关的情况下能为它的文化赢得声望。

而且，艺术和知识的研究结果应当很容易地成为人民大众的东西。这是唯一的方法来保证知识不至于被学者们藏在象牙塔里，艺术不被藏在艺术家们的大脑里。知识和艺术应当对民主社会作出贡献——它们直接与人民连在一起——使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国家对自由研究以及传授知识和艺术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应当限制在国家的财力和实际形势所允许的范围内。

国家应当小心地不让研究结果对人民的利益有所损害或不利。在原则上，国家不应干涉高等学府的自由与独立，然而，也要求这些学府不要脱离国民生活的现实，必须与其他民主组织和成人教育机构充分合作。

艺术创作应当是自由的，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有义务采取措施帮助人们自由地发挥创造力。我相信，任何形式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审查制度，都不允许限制艺术活动的发展。而且，我相信，享受自由，同时对这种自由负有责任的社会是战胜共产主义的真正基础。

我想强调的最后一点是，学者、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应当能够受到社会的尊重，以使他们站在负责我们祖国复兴的前列。

## 英文原本附录：作者简历

康阿(Kum—O音译)俯视着庆尚北道美丽的洛东江，山脚下有一座名叫山末里(Sangmo—ri音译)的小村庄。比起朝鲜其它数百个村庄来，这个小村庄无任何特别之处。小小的房舍，盖着稻草的屋顶，房舍之间是一条狭窄的弄堂——比一条小路略宽些——一阵阵风从这围绕着房屋的粗糙的石墙间吹过。

小村庄的今天与1917年9月30日几乎没什么变化，不同的是，那天，农民朴松平(Park Sung-bin音译)的妻子朴南玉(Park Nam-ui音译)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取名朴正熙，是朴家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随着正熙的成长，他很快就明显地表现出与兄弟姐妹的不同。他更加矮小，而且，即使当上了小学生，也还是一个文静、自制而又很少笑的少年，但在学习上却是全班的佼佼者。

作为全班的尖子从小学毕业后，朴进入大丘师范学校学习，于1937年毕业。

其后，他在庆尚北道的一个小学执教两年，1940年（日本人占领时期），他决定与同年应征士兵一起进入满洲国军官学校，便中止教学生涯。两年后，也就是1942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军校毕业，立即被收入设在东京的“日本陆军

士官学校正规班”，于1944年毕业。

在战时的日本军队服役一年后，朴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离开军队，同年，朝鲜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但很明显，戎马生涯成了他的长处，于是，他在1946年进入韩国陆军士官学校，于同年毕业，并获上尉军衔。1950年12月，在大丘结婚，现有二女一子。

在朝鲜战争中，年轻军官的才干得到迅速发展，到1953年，朴已升为陆军准将——即使在以军官普遍年轻著称的韩国军队里，他也是年轻的（36岁）。

陆军准将朴正熙作为炮兵军官参加了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的福特西尔的美军炮兵学校高级班的学习，返回韩国时被任命为韩国炮兵学校校长。后来他又调任韩国第五步兵师师长，直到1957年，他进入韩国军的“指挥和总参学院”。

在担任了韩国军第六军军长和第七步兵师师长后，1957年他被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韩国陆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此后，他先后出任下述军事职务：

1959年：第六军管区司令。

1960年：韩国军需基地司令。

1960年：第一军管区司令。

1960年：韩国陆军本部作战副参谋长。

1960年：韩国陆军第二集团军副司令。

1961年，在腐败无能的张勉政权统治下的共和国，人民为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所震惊，朴正熙在1961年5月16日发动了军事革命，未经流血便迅速取得了成功。

革命以后，他被提升为“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他又晋升为陆军中将，11月升为上将。当月，他应

邀赴美正式访问，与肯尼迪总统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交换了意见。

1962年，朴正熙成为代总统，一直到12月建立第三共和国为止。1963年，朴辞去军职，作为新组成的民主共和党的一位文职候选人参加竞选获胜，出任总统。

朴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即1964年12月极为成功地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使其声望达到顶点。这也是韩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进行的首次这类访问。

朴正熙的一生值得注意，特别是他的节俭、忠于职守以及杰出的学术成就。后者可以从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对朝鲜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得到证明。